

中国国货运动：  
中国和英属马来亚的比较研究，1912-194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CHINA AND BRITISH MALAYA, 1912- 1941**

庄仁杰  
**CHONG REN JIE HENRY**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中国国货运动：  
中国和英属马来亚的比较研究，1912-194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CHINA AND BRITISH MALAYA, 1912- 1941**

庄仁杰

**CHONG REN JIE HENRY**  
(B.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9**

## **Acknowledgements**

Firs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est gratitude to my supervisor, Associate Professor Wong Sin Kiong, for giving me invaluable advices, instruction and guidance in the last two years when I was writing my thesis.

In addition,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Associate Professor Yung Sai Shing, Dr. Wu Xiao-An and Mr. Lee Chih Hsien for their suggestions and encouragement.

Third, the staff members of NUS Central Library, NUS Chinese Library, Kuo Ting-Yee Library and the Archives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wan, Library of Research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wan, and Academia Historica, Taiwan, were very helpful. They allowed me to get access to valuable resources which were crucial to my thesi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of them sincerely.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people who had given me suggestions, advices, and encouragements in one way or another.

##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in China and in British Malaya from 1912 to 1941. By comparing the aim, method and identity of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it shows that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were on one hand similar, but they were on the other hand different due to their own local context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Regarding their aims,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in China and in British Malaya had the same aim to improve Chinese economy and to boycott foreign products. However, their initial purposes were different because of interests and circumstances. As for the methods applied, although most approaches of propaganda and organizations in Chinese National Product Movements in China had appeared in British Malaya, their effects and impacts were slightly different due to circumstances. As to identities, both of them were affected deeply by Chinese nationalism, but they are also influenced by their own local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which made them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 目录

## 第一章 前言

- 第一节 文献回顾
- 第二节 研究方法、角度与史料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民族主义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

- 第一节 国货运动的背景与起源及其身份认同
- 第二节 国货运动的发展与国货运动团体：国货运动目标的演变
- 第三节 宣传与动员方式
- 第四节 小结

## 第三章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

- 第一节 国货运动的雏型（1912-1927）
- 第二节 国货运动的关键（1928）
- 第三节 国货运动成熟期（1929-1941）
- 第四节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比较

- 第一节 对于国货的定义
- 第二节 国货运动的目标之比较
- 第三节 国货运动在非正式网络上的比较
- 第四节 国货运动中的集体意识与认同之比较
- 第五节 小结

## 第五章 结论

- 第一节 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之间的差异为何？
- 第二节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是否可以视为是社会运动？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国家 / 民族认同

# 中国国货运动： 中国和英属马来亚的比较研究，1912-1941

## 第一章 前言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欧美与日本等国取得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这不但导致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也促使中国人进一步卷入了以机器作为生产工具的现代工业的潮流之中。<sup>1</sup>面对欧美与日本的商品，中国商品在质量与价格上相对处于弱势，因此缺乏市场竞争力。但是从民国建立到中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工业<sup>2</sup>却迅速发展，从仿造外国制品与轻工业等下游工业的层级，逐渐发展至能够制造出盐酸等工业原料的上游工业的层级。<sup>3</sup>在导致如此发展的众多因素之中，中国国货运动以民族与国家情感促使中国国民去购买中国商品，在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发展上有所贡献。

虽然在民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中国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但是在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本土才出现中国国货运动。此外，国货运动风潮也蔓延至海外华人地区，例如菲律宾、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法属支那半岛等地区。在海外华人地区之中，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表现是较为突出的一个。由于新马地区和中国本土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可说是源自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新马国货运动视为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衍伸。但是却由于新马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因此新马华人国货运动在许多地方上显得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不同。以产品国籍作为例子。在中国国货运动之中，产品要尽可能使用中国的原料、劳动力、技术与资本进行生产，但是对生产地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当时的新加坡和马来亚是英国殖民地，并且不少新马华人仍然持有

---

<sup>1</sup> 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辑（1958年），页461-497。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3.

<sup>2</sup> 这里所指的中国工业是指由中国人所掌控的工业，并不包括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所开设的工业与工业制品。

<sup>3</sup> 有关中国工业制造盐酸的过程，见高屋，〈天字号系统产品与外货的斗争〉，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120-121。

中国国籍。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所谓的国货指的是在中国由中国人出资生产的货物，或者在国外却是由中国人自己出资与生产的产品，这其中也包括了許多新马华人商家（其中甚至包括了对中国认识不多的新马本土华人）在新马所生产的产品。虽然新马华人国货运动可说是中国国货运动的衍伸，但由于这种复杂性，使得新马华人国货运动不同于中国国货运动。

从整体来看，中国本土的与海外华人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同属中国国货运动，两者之间应该有不少类似之处。可是由于中国本土本身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都有特殊之处，因此中国各地的中国国货运动也不必然完全相同。<sup>4</sup>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不但与中国本土有所不同，并且各个海外华人地区之间也有所差异。这导致海外华人地区之间，以及海外华人地区与中国本土之间对于中国国货运动也有不同的反应。因此，中国各地与海外华人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共同性质不但需要注意，各地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值得注意。由于中国与海外华人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最为巨大，所以比较中国本土的与海外华人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最能够突显各地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差异性。

由于中国各地之间的中国国货运动不尽然完全相同，以及限于论文篇幅，因此本论文将在谈论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时将主要讨论上海的中国国货运动情况，并辅以天津与济南等地的中国国货运动来阐明当时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情形。以上海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是因为上海在当时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国货运动的中心与发源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模仿对象。<sup>5</sup>因此，本论文将通过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与中国本土（主要是上海）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比较，以显现出中国国货运动的内部差异性。

## 第一节 文献回顾

---

<sup>4</sup> G. William Skinner,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14-278;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59-360

<sup>5</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 71, 358-359.

学界中有关中国国货运动的研究并不多。在英文著作方面，讨论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最主要作品即是前文提到的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sup>6</sup>。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国货运动从民国成立到中日战争之间的发展，以及其中的民族主义和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者 Karl Gerth 把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视为一个整体，从抵制外货运动与国货展览、国货商场和广告等国货运动的日常运作来剖析国货运动。Gerth 虽然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各地的国货运动因地区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各地之间有何不同与其原因，因此本论文正可弥补此一空白。此外，在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sup>7</sup>一书中，作者 Yoji Akashi 在部分章节之中也提到了当时南洋华人在筹赈祖国的时候，在南洋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是整体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作者的焦点在于南洋筹赈总会，并非当时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

在中文著作方面，中国国货运动的研究也不多。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是由潘君祥所编着的《中国近代国货运动》<sup>8</sup>和《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sup>9</sup>。《中国近代国货运动》所收入的文章大多是叙述性的，时间点从 1912 年民国成立开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此书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中国本土的工商业机构的发展、中国本土资本家的奋斗过程以及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情况。此外，这本书也收集了部份与中国国货运动相关的史料，为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提供了许多背景资料与史料。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则以专书形式出现，讨论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但由于过于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论来看国货运动，导致论述不免僵硬与有适履削足之嫌，因此学术价值并不高。可是由于这本书为中国国货运动提供了广泛性描述，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上两本中文书籍虽然对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着墨不多，也没有对比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和海外华人地区的国货运动之间有何不同，但是它们却对于中国本

---

<sup>6</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sup>7</sup> Yoji Akashi,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U.S.A. & Canada: Paragon Book Gallery, 1970).

<sup>8</sup> 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

<sup>9</sup> 潘君祥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土的国货运动描绘了一个轮廓，对于比较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不同提供了基本的要素。

另一方面，有关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中文研究著作不多。王季深曾经写了一篇有关高事恒开发南洋国货市场的经过，<sup>10</sup>同时益丁也曾在文章之中提到南洋华人的国货运动。<sup>11</sup>可是他们的文章只是属于史实叙述，虽然整理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并且收入了一些史料，但并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中文书籍的内容曾略为提及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在《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sup>12</sup>之中，与海外市场的开拓和中国国货运动的海外发展相关的篇章之中有部分提到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这对于研究新马华人国货运动以及它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之间的关系有所帮助。

与中国国货运动相生相随的抵制外货运动因为对于国货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因此抵制外货运动的研究在研究国货运动时也值得关注。抵制外货运动主要是要求全民不购买某国货品，以打击外国商品在中国的销路，通过制造经济压力给外国商人以达到目的。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的发动原因主要与政治与军事有关。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与军事上无法与列强抗衡，因此通过抵制外货所产生的经济压力来表达对于列强的帝国主义的不满，并吸引国际的注意力以改变不利中国自身的政治决定。通常导致抵制运动的产生主要导火线与政治事件有关，例如近代史上第一场抵制美货运动（1905年）与美国排华法案有关、1925年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与五卅惨案相关、193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与九一八事件有关。近年来已有学者留意抵制运动的重要性，并且有相关的研究。例如黄贤强的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sup>13</sup>讲述了1905年因美国排华法案而引发抵制美货运动，指出这场运动对于日后非暴力抗争的影响（这其中也可包括了日后兴起的中国国货运动）。此外，前文所提及的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

<sup>10</sup> 王季深，〈开拓南洋国货市场的高事恒〉，收入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386-390。

<sup>11</sup> 益丁，〈国货运动与南洋市场——南洋侨胞参与国货运动的若干史实〉，收入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376-385。

<sup>12</sup> 潘君祥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

<sup>13</sup>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sup>14</sup>也有部分篇章梳理了中国在民国时期的抵制外货运动的发展，指出抵制外货运动与中国国货运动的关联性。此外，*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sup>15</sup>虽然出版已久，但是却也明确指出中国抵制外货运动作为反抗列强的武器与其经济效果，仍具有参考性。

在新马地区，华人所发动的抵制外货运动的并没有直接相关的研究，但是在一些文章与书籍中却有提及。例如崔贵强的新马华人史入门读物《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sup>16</sup>之中提到新马地区的抗日活动时，有提及抵制日货运动。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sup>17</sup>不只是抵制日货运动，其中也有部份涉及了新马华人国货运动的发展。

## 第二节 研究方法、角度与史料

为了进行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比较，必须要有比较项目。因此，在进行比较的时候，将引用社会运动作为比较的框架，并且以社会运动的主要元素来作为比较项目。

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是来自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词汇与概念，<sup>18</sup>根据社会学的定义，社会运动包括了三个基本元素：集体行动的目标与方向、社会活动团体与宣传和动员方式所构成的非正式网络、以及集体身分认同。<sup>19</sup>社会运动的一大特色是集体行动，并且由于集体行动必须要有方向才能够顺利进行，因此集体行动的前提必须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是为了推动社会或政治改革、反对社会的变动或某个社会议题、又或者是为了某些弱势群体发声。在现今的社会之中有许多的这类型的社会运动，例如马来西亚的反内安法令集会（推动社会与政治

---

<sup>14</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sup>15</sup> C. F. Remer and William B. Pal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sup>16</sup>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

<sup>17</sup> 孙慧荣，〈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1988），页47-50。

<sup>18</sup> Peter Burke,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econd edition, p. 92.

<sup>19</sup>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second edition, pp. 20- 22.

改革）、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反对社会变动）、美国的反同性恋结婚示威（反对某种社会议题）与美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为弱势群体——黑人与女性——发声）等社会运动，都可以见到群众集合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努力。<sup>20</sup>

非正式网络是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元素，它包括了由人群之间通过某个活动（如音乐会或者运动）或者组织（如工会与邻里组织）所构成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各种媒体所构成的通讯网，如报纸、广播、电视和今日可见的网际网路。因此具体而言，非正式网络可分为社会运动团体以及宣传和动员方式两大项。在许多研究之中，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网络比共同的目标更能够动员群众，并且也具有更强的凝聚力。<sup>21</sup>例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部的黑人政治运动就指出推动人们参与这项运动的并非理念，而是之前参与社会运动的经历与人与人之间的所构成的网络。<sup>22</sup>因此也有学者（Florence Passy）进一步推论，认为个人是否决定参加某社会运动，首要条件是此人是否具有认同此社会运动的目标，次而是个人的人际网络之中是否已有人加入，最后则是按照个人是否有意愿以及所处的环境决定加入此社会运动。<sup>23</sup>但是人际网络并非是万灵丹，也有一些社会运动的现象指出并非每个人都会随着周遭的大部分人或群体加入某社会运动而加入。因此，网络的效用必须按照不同的个案来处理。<sup>24</sup>此外，通过媒体所构成的网络在社会运动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今日的社会运动。今天不少的社会运动必须归功于互联网上的公共论坛，因为这些公共论坛塑造了一个公共空间，让人们能够通过此工间塑造共同的目标与认同，并且进而动员为某社会运动献身。<sup>25</sup>

---

<sup>20</sup>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p. 21.

<sup>21</sup> David A. Snow, Louis A. Zurcher, and Sheldon Eklund-Olson,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1980), pp. 787- 801; Rodney Stark and William S. Bainbridge, "Networks of Faith: Interpersonal Bonds and Recruitment to Cults and S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980), pp. 1376- 1395.

<sup>22</sup> Doug Mcadam,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986), pp. 64-90.

<sup>23</sup> Florence Passy,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In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ed.,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 48.

<sup>24</sup> Patrick Mullins, "Community and Urban Movements", *Sociological Review*, 35 (1987), pp 347-369; Pamela Oliver, "'If You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ill': Active and Token Contributors to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984), pp. 601- 610; Roberto Fernandez and Doug Mcadam,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Recruitment to Social Movements", in B. Klandermans ed., *Organization for Change*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9), pp. 315- 344.

<sup>25</sup>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pp. 126- 134.

集体的身分认同在社会运动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能够促成群众为某个目标献身，拥有共同的理念和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网络是不够的，必须有共同的身分认同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促成群众为社会运动努力。集体认同的形成必须先具有你我观念，从中界定出谁是我们（同志或同伴）以及他们（敌人或对手）。促成这种自身与他者观念主要是倚靠共同的理念、人际关系以及共同的记忆。就如前文所提及，共同的理念即指具有同样的理想与目标；人际关系则是指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网络，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相处与碰面也能够产生强大凝聚力与同志情感。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强调群体借由各种媒体共时共同享有同样的过去、语言、文化与习惯等事物，来形塑集体意识与集体认同。<sup>26</sup>在集体认同之中，也包含了多元的身分认同。例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除了认同妇女团体并参加妇女解放运动之外，同时也可能也认同当时更大的为弱势群体发声的社会运动，并且投入其中。<sup>27</sup>

在中国史中，一些学者的研究对于城市中的社会运动已经有所著墨，本论文并非首开先例。巫仁恕在〈前现代的抵制运动——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sup>28</sup>、〈节庆、信仰与抗争——明清城隍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sup>29</sup>、〈明末清初城市手工业工人的集体抗议雄东——以苏州城为探讨中心〉<sup>30</sup>与〈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sup>31</sup>中，虽然都没有提到社会运动，但是文章之中论及的抗争目标、抗争的动员模式与宣传手法以及其中的集体意识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与社会运动所提及的并无二致。黄贤强的 *China's Anti- American Boycott*

---

<sup>26</sup>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1999）。

<sup>27</sup>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Mario Diani,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pp. 89- 113; Zygmunt Bauman 着，朱道凯译，《社会学动动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44-60。

<sup>28</sup> 巫仁恕，〈前现代的抵制运动——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收录于黄贤强编，《文明抗争——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论集》（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5），页 3- 57。

<sup>29</sup> 巫仁恕，〈节庆、信仰与抗争——明清城隍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4 期（民国 89 年 12 月），页 145- 210。

<sup>30</sup> 巫仁恕，〈明末清初城市手工业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以苏州城为探讨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民国 86 年 12 月），页 47- 88。

<sup>31</sup>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收录于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 87 年），页 229-258。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sup>32</sup>除了有关抵制外货运动之外，其中也提到了当时的动员方式，并且在〈新马华人之文明抵制——二十世纪的宣传与抗争〉<sup>33</sup>，黄贤强也提到了清末的新马华人如何通过报纸上的宣传来进行动员。

Wasserstrom 和 Perry 分别为中国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研究大家，并且两者的研究都以上海为中心。Wasserstrom 的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就指出民国时期上海的学生运动常于政治事件有所关联，以及上海学生运动在动员、组织与宣传方面的特色，并且对于当时的政治与其他社群的影响力。<sup>34</sup>此外，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 *Shanghai on Strike* 则针对民国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进行研究。作者指出上海工人虽然因为技术熟练度、地缘祖籍、性别与教育文化等因素而可分化成许多小群体，以及不同的群体对于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并且产生不一样的工人运动。但是，这种这种差异却也同时促成了工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最大因素。<sup>35</sup>前者值得借镜的是，作者强调了学生运动如何组织、动员与宣传，这点在其他的社会运动中也常常看到。并且同国货运动的目的相近，民国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的目标主要是维护国家尊严与利益，这与国货运动的目的宿途同归。后者的著作虽然对于组织、动员与宣传着墨较少，但是指出不同的社群对于社会运动有不同的反应，并且也指出了上海工人在集体行动中集体意识是如何形塑的。

从以上著作中可以发现，群众运动或者抵制外货运动可算是社会运动的一环，并且以上大部分著作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动员与宣传手法上，这点与前面提及的非正式网络具有密切的关系。此外，从这些著作之中可以察觉研究对象的抗争目标主要是反对社会与经济上的变动（特别是对他们不利的变动），或者以制度外的方法来对抗当时的国际政治，借集体行动以得到他者的注意与同情。另外，集体意识

---

<sup>32</sup>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sup>33</sup> 黄贤强，〈新马华人之文明抵制——20 世纪初的宣传与抗争〉，收录于黄贤强编，《文明抗争——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论集》，页 163- 189。

<sup>34</sup>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35</sup>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则较少提及，其中较为明确者只有巫仁恕和裴宜理。在〈前现代的抵制运动——明清程序群众的集体抗议〉和〈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有部份提及当时的群众运动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与集体意识的形成；在 *Shanghai on Strike* 中，则指出地缘血亲与技术程度对工人集体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不论在新马地区或者上海，可以清楚看见两地的中国国货运动具有目标与方向、集体意识与认同、宣传与动员方式等元素，并且也可以看见明清时期的各种动员与宣传方式也在中国国货运动之中出现。但是不论在上海还是在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同其他社会运动不同的是，并没有同其他社会运动一样走上街头，通过示威等抗议活动来达到目的。相反的，国货运动却是通过游行与展览等他们相对平和与不具暴力色彩的手段来宣传与达成其目标。因此在比较中国本土的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差异之外，将探讨中国国货运动是否可被视为是社会运动。

在史料方面，与新马华人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有关的资料和书刊主要包括了《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刊》、《华侨战线》、与《三十年代华侨团体调查报告书》。此外，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相关的资料，如《天津特别市国货一览》、《妇女与国货》、《长沙市提倡国货运动大会专刊》、《国货运动月刊》、《天津国货调查月刊》、《中华国货调查录》、《十年来之机联会》、《广东建设厅国货调查报告》、《经济学报》、《国货与实业》、《国货调查录》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当时新马的报纸也是很重要的史料。其中最主要的是《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与《叻报》。报纸之中有不少与国货有关的广告以及报导，对于了解当时的新马华人国货运动有很大的帮助。此外，中华民国的政府档案，如经济部、外交部、实业部与海关档案，以及新加坡殖民政府档案与其所出版的年鉴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民族主义

由于国货运动常常诉诸于民族情感，并且这也是国货运动的集体意识，因此民族主义与国货运动之间拥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在讨论国货运动时也必须了解民族主义。但由于本论文并非谈论民族主义与国货运动的关系，而是讨论作为中国国货运动中的集体意识的民族主义。因此，将讨论集中在分辨两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民族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上。

中国民族主义吸引了许多人的研究。但是在众多研究之中，*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与本研究最为相关。前者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单元而是多元的。在中国社会之中，虽然官方民族主义是主流，但是却无法否认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地区也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有不同于中央政府的解释。<sup>36</sup>不但中国内部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诠释有所不同，海外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本土的民族主义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新马华人为一独立的社群，不但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华人，也不同于新马当地的其它族群。虽然他们远离了居住于中国的华人中心社群，但是在新马华人社群之中也出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由于新马华社的中国国货运动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必须讨论战前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源起和特质，以进一步了解新马当地的国货运动。

王赓武与颜清湟在他们的文章之中对于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萌芽和发展都有些着墨。在 *The Limit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中，王赓武讨论了从中华民国建立到中日战争爆发这段期间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王氏指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并非自身发展的产物，其萌芽是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来新马宣传的维新和革命活动的话，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也不会产生。在这段时间内，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都仰赖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除了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和中國本土的政治事件息息相关之外，并且许多从中国南来的知识分子也在新马从事教育与新闻媒体的工作，藉由工作之利在新马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中国民族主义在新马两地生根。因此，新马华人的中国民族主义可被视为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华人世界的传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王赓武同时也指出，新马两地的华人可以按照政治认同分为三个派别：认同中国政治者、中间派

---

<sup>36</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以及认同本土政治者。因此，新马华人社群之中并非每一个人都仍同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新马华人民族主义，参与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主要是认同中国政治者以及中间派，认同本土政治的华人则与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距离。<sup>37</sup>

在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一文中，颜清湟则讨论了民国建立以前的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颜氏明确指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延伸，而维系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两大元素是华人文化与政治。颜氏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出发，指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有赖于当时流亡于新马两地的维新派和革命派份子，而非依靠新马当地的华人社群的力量来促使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政治方面，新马华人民族主义受到了维新派和革命派在新马的宣传活动所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新马华人有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在文化教育方面，虽然是因应本地的华人文化危机而产生了文化复兴、创办华校和孔教复兴运动，但由于他们的主导者主要是南来新马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份子，因此仍然可说是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sup>38</sup>

王赓武和颜清湟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除了强调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传播的结果以及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之外，都不约而同地符合了 *Imagined Communities* 和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中所提到的理论。在这两本书中，两书的作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 Ernest Gellner 都认为民族主义的建构与传播都有赖于现代教育机构和传播媒体。现代教育机构和传播媒体都有一定的传播范围。在此接受这些传播的社群范围之内，教育和传播机构为在此社群中的每一个人建构了一种单一文化和共同经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民族的框架得以建立并且民族逐渐成形。<sup>39</sup>

---

<sup>37</sup> Wang Gungwu,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In C.D. Cowan and O.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05-423.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Jul. -Sep., 1970), pp. 1-30.

<sup>38</sup> Yen Ching-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6, No.3.(1982), pp. 397-425.

<sup>39</sup>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因此，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不但有赖于各种传播媒体和教育机构，同时也具有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以及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特质。自 19 世纪末起，新马地区中的老师和新闻工作者大多来自中国，他们也因此带来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并让新马华人产生了中国人认同并且心向中国，这让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同时，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也具备了海外民族主义的性质。当时的新马华人因应当时新马当地的刺激，而开始不断提倡自己所具有的中华性，通过教育和各种媒体不断强调和确定自己和其它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新马地区之中，教育和媒体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创立之前，因为维新派和革命派两者之间的角逐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媒体来进行，因此导致许多小学、中学和夜校的创立，以及刺激了报纸和发行与销量。不论是清政府、维新派还是革命派，他们的注意力和讨论焦点都是中国，这都大力推动了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发展。随着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报纸和学校的数量都没有大幅度减少，成为后来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后继发展的平台。这些证据都一再证明了王赓武与颜清湟两人所提出理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华人居住地的延伸。

Zheng Liren 在他的博士论文——*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 提出了不同于王赓武和颜清湟的看法。他认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并非是中国民族主义在海外的延伸部分，而是由新马地区内部所孕育出来的产物。他认为新马华人在清末时期就已经自称为华侨，显示了他们认为自己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不一样。此外，随着英国殖民政府不按照方言群区分华人以及在新马华人在新马地区扎根，使得新马华人开始产生了本土的华人族群意识。其中 1894 年林文庆等曾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新马华人知识分子开始推动华人社会改革运动，正代表了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雏型的出现。虽然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看起来受到清政府、维新派和革命派所推动的政治运动的影响，并且也大力支持与积极响应，但实际上他们的注意力始终在新马地区，之所以支持中国本土的政治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运动有助于新马地区的发展。<sup>40</sup>

---

<sup>40</sup> Zheng Liren,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但是 Zheng Liren 的说法也有些不足之处。首先，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新马地区中出现的报纸等刊物，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可以知道当时的华人不但自称为华侨，也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新马地区的华人。虽然许多人南来南洋谋生甚至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成家立业，但是仍然有一部分人仍然抱着回归中国故乡的梦想，甚至也不乏落实这个梦想的新马华人。<sup>41</sup>因此，Zheng Liren 的说法不但不足以取代王赓武与颜清湟的论点，并且他的说法也证明了王赓武有关新马两地华人政治中的三个政治认同派别。

虽然王赓武、颜清湟和 Zheng Liren 三人在他们各自的论述之中都提到了清朝政府、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在新马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导致与推动的民族主义，但是他们所着重的是同一事件之中的不同人物和层面，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看法。以支持维新派以及与其相关的儒教复兴运动为例，颜王二人所强调的是康有为等从中国南来的维新派份子，Zheng 则是强调本土的参与者，例如林文庆与伍连德等人。很显然的，这些人虽然同处于同样的运动之中，但是康有为等人主要是为了推广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维新运动，而林文庆等人所要求的则是新马社会的内部改革。此外，他们所强调的是同样的一场运动之中不同的层面。例如在维新派的改革运动之中，王颜二人着重于这场运动与中国南来的维新派之间关系。另一方面，Zheng 则是突出了当时新马华人的社会改革与维新派的改革运动。

在民国建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新马地区中虽然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但是参与国货运动的新马华人大多是认同中国，热烈拥抱中国民族主义的人。他们所隶属的新马华人民族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延伸，他们的认同对象是中国本土而非新马。这股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主要是由革命派在 1900 年之后所推动，主要的支持者为中下层阶级，后来也把不少的华侨名人也纳入其派别中。<sup>42</sup>他们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并也因此把中国放在他们的认同对象与目标的第一位，同时也积极参与中国本土的政治运动。

---

<sup>41</sup> 其中陈嘉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嘉庚于 1948 年回中国定居。另外，也有一些人回中国定居，例如徐统雄。有关徐统雄生平，请参考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檳城：出版社不祥，1922-1941），卷一，页 98；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页 163-164；新加坡茶阳会馆与百年大庆筹委会出版委员会，《新加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加坡茶阳会馆，1959），页 32。

<sup>42</sup>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营出版事业，1982。

同时在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中也有不少是属于王赓武所说的中间派。他们虽然也同认同中国的新马华人一样，认同对象可能是中国本土而非新马，但是他们在国货运动之中却也同时试图兼顾他们的利益，有时候会把个人的利益与好恶排在自己的政治认同之前。例如有些新马华人厂商的产品按照严格的国货标准来看，他们的产品不能算是国货也没有取得国货标准的资格，但是他们仍然标榜自己的产品为国货，又或者因为利益关系而对国货运动保持冷漠态度。<sup>43</sup>

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中的认同中国者与中间派份子对于新马华人民族主义的理念、目标、参与的原因也许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之间非常接近，彼此并不互相排斥，而且之间的界线并不清楚，并且许多华人很有可能同时都符合这两派的定义。因此，在新马地区中的中国国货运动中，无法非常清楚地把国货运动的参与者归类为其中一派，而必须从他们的当时的立场与行为来判别他们当时是因为国家认同而参与，或者是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参与，甚至是两者兼具。

从以上段落可知，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中的民族主义的认同有些复杂，因此本论文也将试图厘清中国国货运动中的集体意识与认同。

#### 第四节 论文结构

本论文可以分成五章。第一章为前言，说明此论文的研究目的、文献回顾、研究方法、角度与史料、以及论文的结构。第二章将以上海、天津与济南等中国城市为例子，说明二战前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概况，并且从社会运动的三项元素来分析。第一节将说明中国国货运动的背景与起源，从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以及民族主义四者来说明国货运动为何在民国时期出现。第二节将通过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中的团体与发展过程，叙述中国国货运动的目标与落实目标的具体方法如何形成与演变。在这过程之中，中国国货运动从最初销售商参与到后来工业界与金融业的加入，以及从私人界的活动到后来政府的加入，目标也从单纯的销售商品与保护中国本土工商业到提倡振兴中国工商业和经济，以及呼吁政府改善中国环

---

<sup>43</sup> 从个人的商业利益来决定对于国货运动的态度现象也在中国本土出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见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1930*, pp. 101-102.

境工商业的经营环境。第三节将根据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主要宣传方式分为六个段落，即：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来阐明中国国货运动是如何进行动员与宣传。

第三章将说明战前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本章将分为五个小节，除了最后一个小节为本章结论之外，其它四节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第一节是说明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的形成期，时间是从 1912 年到 1927 年之间。中国国货运动在 1919 年因五四运动而出现后，很快地就不引人注目，但是民间仍然不时谈论国货问题，并且开始关注中国国货的品质与长期销售等深层问题。第二节将以 1928 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作为这节的焦点。这一年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承先启后的一年，中国国货运动为济南惨案的受难者筹款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并且其中所使用的宣传与动员方法等方式也成为后来的国货运动的模仿对象。第三节的时间是从 1928 年到 1937 年结束，以中日战争作为分界点。这段时期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成熟期，焦点将集中在 1932 年、1935 年和 1936 年在新加坡大世界所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并且通过这三次国货展览会来叙述当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不但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在意识形态、其宣传与动员方法等已经成熟，并且中国政府与商人也大力支持。第四节的时间是从 1937 年开始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由于国货运动已经成熟，因此国货运动并没有太大变化或发展，因此内容则将指出当时国货运动稍微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章将指出与分析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有何不同，以及造成这种不同之处的原因。除了从社会运动的三个元素——集体行动的目标与落实目标的方法、非正式网络（国货运动团体与宣传和动员方式）以及集体意识与认同——进行比较以得出其相似与差异之处外，也将比较国货运动中的团体，以及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对于国货的定义。第五章则为结论，对于本论文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新马地区的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有何差异、中国国货运动是否是社会运动以及中国国货运动中的集体认同这三个问题进行解答。

战前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至今为止没有许多人研究，也没有人对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进行比较并分析中国国货运动的集体认同，并且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对中国国货运动进行研究。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将会弥补这一空缺。

## 第二章 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

在比较新马华人的中国国货运动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之前，必须先叙述它们各自的情况，因此第二章将以上海、天津与济南等地德中国国货运动的情况，叙述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第一个部份说明国货运动的背景与起源，并指出国货运动的身分认同为何。第二部份则将说明国货运动的发展过程与过程中所出现的重要国货运动组织，以说明中国国货运动的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方法两者的演变。第三部份则说明国货运动的宣传与动员方式，并将分为六个部份：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

### 第一节 国货运动的背景与起源及其身份认同

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发轫于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其起源与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对于更替男性服饰的争论有关。在中华民国于 1912 年成立的时候，刚上台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除了下令剪去辫子、禁止缠足、更换历法等社会措施之外，也开始针对男性服饰做出讨论，以制定出恰当的男性服饰规定。<sup>44</sup>有关更易服饰的要求与争论并非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府在成立之初也针对男性服饰做出了详细严格的规定，要求人民的服饰符合政府的要求。但是这种要求不但随着时间而渐渐松弛，并且也不敌明清以来在消费文化上的流行趋势。<sup>45</sup>自明朝中叶以后，服饰的标准不再被人遵守，人们的穿著标准是以当时的流行为准，官方的穿著标准名存实亡。<sup>46</sup>因此，对于是否更替男性服饰的争议不但不是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才出现，而且当时的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制定服装规格也视为是正常的现象。

对于是否更替服饰，以及应该以什么样的服装代替清代政府所制定的服装规格引起很大的争议。支持改变服饰的人认为，从清朝以来的传统男性服饰已经不合

<sup>44</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88-93.

<sup>45</sup>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 218-222.

<sup>46</sup> 巫仁恕, 《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 三民书局, 2005), 页 5-30;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pp. 218-222.

时宜，它们代表着中国的落后。因此应该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废除旧有服饰，并改以西方男性的西装革履以取代旧有的服饰。<sup>47</sup>实际上，以西服代替原有的中国服饰的建议并非突然涌现，易服的风潮与声音在清末就已经出现。自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开始，随着西方势力进入中国，一部分与外国有所接触者，例如外交官、留学生与海外华人，就已经开始穿上西装甚至剪去辫子，并且中国内部就已经开始针对原有的服饰是否适合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随着社会的变动，一些行业也开始穿上西方的服饰，例如当时中国的军队和警察，甚至清政府也开始讨论是否应该开放服饰上的限制，放弃所有男性必须剃发留辫与服饰上的规定。<sup>48</sup>

但同时，以西装服饰取代原有的传统服装的建议却遭到了其它人的反对。一部分反对派人士认为旧有的服饰仍然拥有其文化价值，它们能够突显并代表中国人的特色与传统并且具有强烈的中国性，不应该随着清朝灭亡而被更换。甚至其中部份人士认为，服饰不但应该保留不变，辫子也不应该剪去。<sup>49</sup>另一方面，另一些人（主要是中国的纺织业者）从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更替服饰将对中国经济的主要支柱——纺织业造成很大的破坏，进而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纺织业是中国自明清以来的主要传统工业，其中以江南地区最为兴盛。自明清以来，纺织业为江南地区带来不少利益，不但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支柱并且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之一。此外，中国纺织品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在国内外贸易之中的重要商品。<sup>50</sup>他们也认为，中国的传统服饰多用中国本地生产的丝绸与棉花等传统布料缝制，并且传统的服饰制作方式也于西方服饰不同。因此，如果贸然更替服饰，不但会导致许多纺织与制衣工厂被迫停业，而且将使得许多纺织业与成衣业的工人将会失业，进而导致中国工业受损，打击中国的经济。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本土很少生产西装所需的布料，以及缺乏制作西装革履的师傅与工厂，因此更替服饰将会使得外国纺织业受惠，让其它国家的纺织品可以顺利地倾销至中国，这将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与贸易赤

---

<sup>47</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90- 93.

<sup>48</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83- 85.

<sup>49</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90- 93.

<sup>50</sup> 有关江南的纺织业，见 Lillian M. Li,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字的情况更为严重。<sup>51</sup>在更替服饰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情况下，一些纺织业者团结起来成立了中华国货维持会。除了希望藉由组织来保护他们原有的经济利益之外（如果以西装革履代替原有的服饰，他们的生计将大受影响），也希望促使他们的反对更替服饰的诉求得以被社会与政府所接纳。<sup>52</sup>

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人对于服饰问题的讨论，正好印证了当时的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时也是推动国货运动产生的背景与原因。当时的中国不但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并且在社会与经济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因为列强进入中国而开始有所转变。从十九世纪开始，欧美国家认为中国是解决自身的经济不景气的管道，对中国进行倾销以解决国内的经济景气循环问题，再加上商业、军事与政治组织在旁辅助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得以对中国输出大量的工业制品。<sup>53</sup>

在西方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的过程中，西方的经济力量与生产方法也随之进入中国，并且逐渐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生产方法。此外，西方人在这过程之中也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航运业、金融业与矿业等商业活动，列强逐渐掌握了中国的经济。<sup>54</sup>自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得到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这不但促使了欧美与日本等国在中国开设工厂，并且也促使了中国迅速工业化。此外，许多中国人也从中模仿西方的现代工业生产模式，在中国开设工厂从事工业化的生产。<sup>55</sup>除了新兴工业如火柴厂、面粉厂与化学工厂等利用机器生产之外，一些旧有的工业如丝织工业也开始引入机器来进行生产。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贸易赤字也证明了中国经济正在走下坡。中国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逐渐丧失了海关控制权。在 1860 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后，中国被进一步要求降低海关关税并且丧失了关税税额制订权，使得中国无法通过高关税来

---

<sup>51</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01-104.

<sup>52</sup> 潘君祥，〈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6-7。

<sup>53</sup> James L. Hevia,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2003), pp. 158-162.

<sup>54</sup> 有关中国经济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之间的变化，见 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sup>55</sup>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1930*, pp. 2-3.

阻挡西方商人的倾销政策。自此之后，中国的国际贸易从出超变成入超，贸易赤字不断增长。根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海关报告，中国的入口额已经远远大于出口额，贸易赤字十分惊人。<sup>56</sup>这些情况让当时的中国人认为中国面临重大的经济挫折，这种在经济上的漏呃必须加以修正。修正方法除了通过提高关税以限制入口之外，还必须藉由自行生产中国自己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以取代外国进口的商品，以此来挽回中国在经济上的利益。这些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及挽救方式，成为了日后国货运动的观点与要求。<sup>57</sup>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中国在社会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有如此巨大的转变，是由于中国原有的消费文化。明清时期，商品价格因为商业网络发达而下跌，并且由于商业网络的发达，人们转而从市场中购买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品而不再像以往一般自行生产日常生活所需。<sup>58</sup>另一方面，明清时期身分限制逐渐瓦解，社会的阶级分化开始松动，并且再加上由于以往的贵重商品的价格下跌，使得人人有经济能力去添购能够象征社会地位的贵重商品。虽然明清两代政府都不断颁布禁奢令，以及规定人们必须按照自己的身分进行消费的限制，但是人们因为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生活逐渐富裕，因此许多人不但不理会政府的对于消费的限制，反而按照自己的喜好和社会的潮流来消费。<sup>59</sup>在身份限制瓦解与商品价格下跌的双重作用之下，中国的消费文化逐渐成形，为日后中国人能够接受西方商品提供了基础。

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接触，与外国人的长期来往让许多中国人逐渐能够接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改用西方所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使西方商品在中国开始逐渐占据市场。列强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不少外国人到中国居住与工作。除了从事政府公职的外交官与军人之外，也有民间的商人与传教士等来到中国定居，随着他们而来的还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用具。虽然当时西方人大多居住在当时的租界以内，但是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担任他们的杂役或员

---

<sup>56</sup> 〈中国历年进出口额〉，转引自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表 I-2-a，页 448-449。

<sup>57</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40-43.

<sup>58</sup>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sup>59</sup>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页 5-29。

工等低下层的工作。<sup>60</sup>虽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与中国人大不相同，但是随着两者之间的接触的时间日久，西方的物质文化开始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并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从中学习到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文化。<sup>61</sup>另一方面，当时的租界大多位于中国的城市，即使其它没有替西方人工作的中国人也因为与西方人在多方面有所接触，因此不免受到西方的生活方式与用具的影响，进而使用西方商品。此外，清末中国城市人口逐渐增长，并且接受西方影响的城市人口也对其它地区传播西方的物质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受到影响并且使用西方人的商品。<sup>62</sup>

因此，对西式商品的需求日渐增加导致西方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重大商机。原先由西方人所掌控的西方工业商品工厂以及进口贸易已经无法满足逐渐扩大的市场需求，因此吸引了许多中国商人投入这个市场，以西方的机器进行西式商品的生产。在民国成立之后，由中国人生产的商品与外国商品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sup>63</sup>

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在相对不利的局面，不但在于列强的多场战争之中战败，也因为战败而被迫放弃许多在政治上的权利如领事裁判权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国家主权逐渐丧失并且国家逐渐沉沦，因此中国人必须有所行动以拯救自己的国家，并且也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sup>64</sup>

除了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等层面之外，当时中国在思想上也开始发生转变，现代西方思想如民权、民主、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随着西方人进入中国。自清末起，众多西方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影响甚为深

---

<sup>60</sup> 从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封锁广州夷馆，禁止中国人进入其中为英国人提供服务来看，可以知道当时西方人来中国就有雇用中国人。

<sup>61</sup> 两种不同文化的社群接触的时候会互相影响与交流上。有关文化交流，见 Peter Burke,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201-206.

<sup>62</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38-40.

<sup>63</sup> 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pp. 138-141;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57- 58.

<sup>64</sup> 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自强运动、百日维新、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出现以及清末的新政，都代表着试图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努力。请参考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1994)。

刻，并且可以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革命派与维新派——来分别当时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革命派与维新派在民族主义的成员划分标准上有所不同。革命派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合格成员只有汉族，并且视血统为划分族类的方法。他们抱持这种分类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政治目的是推翻满人所建立的清代政府，因此希望借着汉族民族主义号召占中国人民大多数的汉人支持革命。另一方面，维新派的民族主义者所构想的中国民族主义不同于革命派。他们以文化作为族群的分野，并且其中国民族主义所包含的范围比较大。根据他们的定义，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员包括了在中国境内拥护汉族文化的各个族群，因此除了汉族之外，满族与回族等其它中国少数民族也是中国民族的成员。他们的民族主义也与他们拥护清朝的政治立场有关，因而认为中国民族的范围不应该只限于汉人，也应该包含了满人等其它民族。但是，他们也同时强调中国民族必须以汉族与汉文化为核心，在此前提之下进行民族融合。<sup>65</sup>

虽然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中国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分歧，但是自中华民国于 1912 年建立之后，维新派的民族主义理念胜出。革命派在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由于其政治目的已经达成，因此修改自身的民族主义理念，变成与维新派所推崇的中国民族主义近似，以团结中国境内的全体人民与维持中国统一的局面。在当时，中国开始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民族主体的中国民族主义为概念，把中国形塑成类似西方民族国家的近代国家体制，并且呼吁汉人团结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群，共同抵抗列强的帝国主义侵略。<sup>66</sup>

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建构对国货运动有所影响，促使国货运动参与者的身分认同萌芽。自十九世纪末起，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国际社会以民族国家作为国家的单位，因此中国也把自己逐渐转变成民族国家。<sup>67</sup>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境内出现了把各种与中国相关的事物和民族国家建构进行挂钩，例如把京剧称为国剧，以及把华乐称为国乐。因此，根据这个逻辑，由中国人所生产的商品也被称为

---

<sup>65</sup> 沈松桥，〈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民国 89 年 6 月），页 77- 158。

<sup>66</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p. 139- 144.

<sup>67</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p. 158- 160.

国货。<sup>68</sup>在此背景之下，这时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的竞争也被套上民族国家之间竞争的观念，许多国货运动的支持者以“中国人必须要买中国货”作为口号，认为购买中国国货是一个中国人所应该具备的行为，同时也代表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同时购买国货不但可以维护中国经济，也是爱护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的行为。因此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除了具有身分认同与经济上的较劲意味之外，同时也具有民族国家互相争胜的意味，并且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商品与经济竞争视为战争，即为商战。也因为当时的中国把列强对中国的剥削视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与外国之间的商战同时也具备了反帝国主义的意味。<sup>69</sup>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使得国货运动不但让参与国货运动的中国人产生了身份认同，让中国人民因为购买与使用中国商品而加深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并且在经济上具有与其它国家互相竞争和抵抗帝国主义的成分。

## 第二节 国货运动的发展与国货运动团体：国货运动目标的演变

在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中，有不少与国货运动相关的团体出现并且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并且它们的出现也分别代表着国货运动的目标或者达成目标的方法的演变，以及当时国货运动所面临的难题。以下将通过叙述国货运动在这段时期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之中所出现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货运动团体和机构，这除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等重要团体之外，也包括了在国货运动后期对国货运动影响深远的中国国民政府。

中华国货维持会是第一个出现于中国境内的国货组织，成立于 1911 年。其会员主要是上海的纺织业者、相关工会与地方会馆，如衣业公所、湖绉公所、帽业公所与钱江会馆等组织。它成立的宗旨是“提倡国货，发展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但它的目的主要是要求当时新的中国中央政府不以西服来取代中国原有的服饰并继续采用中国原有的服饰，而且希望能够藉此方法保护中国的纺织业。最终它的要求很快地得到政府的回应，政府最后许诺将不采取西方服饰作为国服，并答应

<sup>68</sup> 许德发，《近代中国之文化国家化与国家意识的形成（1890-1928）》，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

<sup>69</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57-60.

以中国纺织品作为国服的布料。<sup>70</sup>在其最初目的达到之后，中华国货维持会不但没有解散反而继续推广国货，并且通过各种宣传方法，如演讲、陈列展览、发行刊物等方式来宣传国货，甚至开设卖场来促销国货，其中以出版国货刊物《国货调查录》对国货运动最为深远。另一方面，中华国货维持会很快地在中国各地出现分会，其会员人数也急剧上升，并且也有其它仿效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国货组织也随之成立。<sup>71</sup>

从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 1928 年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间之内，中国分别在 1915 年、1919 年、1923 年和 1925 年这四年中爆发了抵制外货运动，并且从中也促进了国货运动的发展。这四次的抵制外货运动都是针对日本而发（除了 1925 年在抵制日货之余也抵制英国商品），并且与中国政治与中日关系息息相关。

1915 年不但爆发了抵制外货运动，并且国货运动在这一年中有所发展。当时日本政府对对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此条文内容保障并扩大日本在华权利，但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的主权和利益受损。此条约内容被人民所闻悉之后，民间于是展开了抵制日货运动，藉由抵制来表达心中的不满。<sup>72</sup>另一方面，当年中国许多城市化比较低的地区先后成立了国货运动组织；中国国货运动也开始踏出中国，在海外华人地区展开国货运动。<sup>73</sup>虽然无法证明说此次抵制日货运动促成了这些发展，但是在这段时间内确实有些国货厂商在这次的抵制日货运动之中趁机扩大自己的市场。例如这次的抵制日货运动之中，三友实业社以三角牌毛巾作为与日货角逐市场的工具。<sup>74</sup>

1919 年，许多中国人因为不满凡尔赛和约中把德国原先在中国享有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中国各地爆发了示威运动，促发了“五四运动”。在当时，抵制日货运动也是五四运动的一环，当时人们也通过抵制日货来宣泄对日本的不满。当时许多

---

<sup>70</sup> 潘君祥，〈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收录于潘君祥编，页 6-7。

<sup>71</sup> 潘君祥，〈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7-9，14-18。

<sup>72</sup> Marius B. Jansen,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p. 21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页 502-507，513-517。

<sup>73</sup> 潘君祥，〈国货运动大事记（1905-1952 年）〉，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536-537。

<sup>74</sup> 李道发，〈全力参与国货运动的三友实业社〉，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66。

厂商在这个时候也借着抵制日货的风潮，纷纷以自己生产的国货商品以抢夺日本原先占有的市场。例如在此时支持抵制日货的五州药房，1920年的利润比1915年增长了将近一倍，总营业额则增长了3.5倍。<sup>75</sup>

此外，1919年之后推动国货运动发展的另一个可能原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有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因此把人力物力集中在欧洲，这导致他们在亚洲的贸易萎缩，提供亚洲市场的商品数量也随之减少。这不但为印度、日本和中国商品的制造商提供了广大市场的机会，并且这三个地区的工业在这段时间之内都有显著的发展。<sup>76</sup>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欧美列强再次回到中国，西方的商品也再度夺回原有的市场。因此，为了与商品质量较佳的西方商品竞争，中国厂商必须诉诸于国货运动，以民族主义为助力与西方厂商较量。

在1919年的抵制外货运动之中，民间也出现了新的国货运动组织——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是因应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发起的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抗日与抵制日货，次要目的则是通过团员的每月定期资助来组织国民储蓄银行与成立实业公司。与中华国货维持会不同的是，救国十人团的发源地在北京而非上海（但在上海发扬光大），并且它的组织方式也非常不同于其它组织。救国十人团是一由下往上的金字塔型组织，每十人为一团并推选一人为代表，每十团中推选一人作为十代表，然后每百团又推选一人作为百代表，以此类推。<sup>77</sup>与其它国货组织相比较，救国十人团显得较为激进，这与其最初成立的目的——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有关。它不但要求人们拒绝购买与使用日货，并且也要求人们不与日本的银行有任何的经济活动往来；同时也通过十人之间互相监督的集体压力，达到尽绝使用日货与积极提倡国货的目的。<sup>78</sup>救国十人团最初非常成功，在中国许多地方皆有十人团的组织与活动，并且对于五四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起与推动有十分大的帮助。但是十

---

<sup>75</sup>项泽南，〈献身国货事业的项松茂〉，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151。

<sup>76</sup>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Present* (Armonk, N.Y.: M.E. Sharpe, Inc., 2006), pp. 241-243.

<sup>77</sup>小野信尔着，殷叙彝，张允侯译，《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页1-9。

<sup>78</sup>同上注。

人团后来因为组织结构松散与财政问题，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逐渐淡出国货运动的行列之中。<sup>79</sup>

另一个自五四运动中崛起的国货组织是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的前身是因应五四运动而成立的对日外交市民大会，在 1921 年改组成为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其成员包括了中国的厂商等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以及上海总商会与绍兴旅沪同乡会等组织，并且其宗旨——“提倡国货，振兴实业，改进工艺，推广贸易”——也与中华国货维持会极为相似。在成立之后，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除了提出“消极的抵制外货，积极的提倡国货”的口号，也成立国货旅行团，在中国各地举行国货展览会，藉此来推广国货。<sup>80</sup>

1925 年的抵制外货运动不但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代表着国货运动的另一次高峰期。同之前的抵制外货运动有所不同，1925 年的抵制外货运动抵制日货的同时也抵制英货，在同一场抵制外货运动中同时抵制两个国家的商品，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次的抵制运动最初是因为一名工人死于日人厂商手中，因此人们认为在华的日本工厂刻薄中国员工，因而发动示威抗议。在抗议过程之中与租界的英国警察起了冲突，结果造成好几名中国平民被租界警察开枪射杀。此事件为“五卅惨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但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同时也发起了抵制英货运动。五卅惨案可视为是这次的抵制外货运动的近因，同时这次的抵制运动也有其远因。在 1895 年的甲午战争、1915 年的二十一条和 1919 年的山东问题之中，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始终没有被中国人所遗忘，这些过去在五卅惨案之前也常常被人提起，无形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sup>81</sup>同之前的抵制外货运动的情形类似，许多国货厂商在此时出来声援抵制外货运动并提倡国货运动，也趁此良机纷纷尽力抢夺市场占有率，并且打响自己和公司厂牌的知名度。例如华成烟公司与五洲药房都藉此出售更多的货物，提升了自己的营业额。<sup>82</sup>

---

<sup>79</sup>小野信尔着，殷叙彝，张允侯译，《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页 92-121。

<sup>80</sup>潘君祥，〈20 年代中国国货运动的蓬勃开展〉，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5-26。

<sup>81</sup>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69-175.

<sup>82</sup>项泽南，〈献身国货事业的项松茂〉；楼德型，〈华成烟公司在国货运动中发展壮大〉；黄汉民，〈国货运动中的荣家企业〉，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154-155；页 214-215；页 55。

从 1911 年到 1925 年之间，国货运动的目标从最初希望通过国货运动保护中国本土的工商业，逐渐演变成振兴中国企业与经济为其目的，并且也发现如果要振兴中国的经济，无法通过抵制外货运动来达成。另一方面，此时期也发生了好几次的抵制外货运动，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后，蓬勃发展的中国工业面临质量较佳的西方商品的挑战。这些问题不但催生了其它国货运动团体，如救国十人团与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等团体，并且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

1925 年之后，国货运动的目标依旧是振兴中国经济，但是达成目标的方法却有所转变。另两个国货团体——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与中华国货产销会——的出现正标榜着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达成目标的方法的两次演变。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立于 1927 年，由项松茂等人所创立，以工厂为会员单位。其宗旨为“谋实业发达，国货进步，挽回外溢利权，增进社会公益”，并希望政府能够取回关税自主权，以及降低关税、改善中国的商业经营环境与保护中国本土的工业，以促进国家利益。<sup>83</sup>另一方面，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的会员工厂也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工业原料，以解决中国制造业过于依赖外国原料的问题，例如化工业者曾联合起来开发硫酸、盐酸与硝酸等化学工业原料。此外，在宣传方面，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也刊登联合广告，以及发行《国货日新录》与《机联会刊》等刊物进行宣传。<sup>84</sup>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成立显示了国货运动从中华国货维持会成立时只注重部分产业的现象转变为注重全体工业活动。它的会员不单单只限于中国的纺织业，还包括了中国的制药业、食品业与化工业等不同的制造工业。此外，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成立显示了当时不单只是强调位于下游的购买与销售，人们也开始把注意力移往上游的生产，国货运动的层面无形中扩大了。<sup>85</sup>这些转变都意味着国货运动达成目标的方法进一步实际化。以往要求中国国民购买、使用与贩卖国货作为优先考虑的要求不但继续存在，并且进一步从更为基本的层面做起。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要求正印证了这一要求，希望能够借着改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环

---

<sup>83</sup>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十年来之机联会》（上海：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民国 26 年），页 3-10。

<sup>84</sup> 潘君祥，〈20 年代中国国货运动的蓬勃开展〉；程守中、周节之，〈国货运动中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7-32；页 458-467。

<sup>85</sup> 潘君祥，〈20 年代中国国货运动的蓬勃开展〉；程守中、周节之，〈国货运动中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7-32；页 458-467。

境，使中国国货在与他国商品竞争的时候具备更佳的竞争力，以达到振兴中国经济的目的。

如果 1927 年的上海机制工厂联合会代表着改善中国的工商业经营环境，1932 年成立的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不但代表着金融从业者加入国货运动的行列之中，并且也代表着希望进一步改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环境。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的发起人为中国金融界巨子张公权，他联合了销售商、制造商与银行三者的力量以推动国货的制造与推销。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设立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通过此机构为生产者与销售者提供了一个管道来贩卖与购买国货，并且在这过程之中，国货公司与厂商可以藉由银行的融资而获得更大的资金运转空间来销售国货，藉此来推动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此外，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与中国国货公司也在各地设立国货介绍所与举办国货展览，有益于国货运动的宣传。<sup>86</sup>

国货运动的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方法在中国国民政府参与国货运动之后又有所变化。国民政府参与国货运动之后，国货运动的目标虽然仍然是以振兴中国经济为主，但同时还必须达成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国国民政府在 1928 年完成北伐统一中国之后开始大量介入国货运动，从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国货广告到国货证明书，都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在幕后积极推动国货运动的发展。国民政府不但对于国货运动的发展不遗余力，并且尽量在其能力范围之内推广国货。例如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公务员上班的时候必须用国产布料制成的衣服，政府部门所使用的对象也必须是中国制造的商品，甚至使用外国商品的政府官员将受到惩罚。<sup>87</sup>另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策也给予当时的国货厂商们一个宣传的机会，在推销自己的商品的同时也推广国家的政策。例如在新生活运动中，有一些商人把自己的商品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相结合。其中中国化学工业社在其广告之中列出了新生活运动

---

<sup>86</sup> 潘君祥，〈三四十年代国货运动的持续发展和严重挫折〉；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章程；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章程，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37-39；页 517-518；页 519-520。

<sup>87</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令朱培德翁文灏通令军政各机关用纸皆使用国货》，1936/04/01-1936/04/01，典藏号：002010200156003；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翁文灏行政院各部会及市政府股科长以上人员须着中山装制服并皆用国货》，1936/03/02，典藏号：002080200419006；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通令军政各机关印刷品纸张须用国货如再购用上等洋纸应由其主管官负责受处》，1936/04/01，典藏号：002080200420003。

对卫生习惯的要求，并藉此向民众推销自己所生产的卫生用品如肥皂、牙刷和牙膏等商品。<sup>88</sup>

另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也把国货运动与中国的外交政策挂钩。1935年中日关系日渐紧张的时候，林耕宇<sup>89</sup>曾经提醒蒋中正日本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的事实，虽然碍于外交政策无法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但是国民政府可藉由支持国货运动来灌输人民爱用国货以及抵制日货的理念，来培养抗日意识。<sup>90</sup>另一方面，国家领导人也大力推动国货运动的发展。在蒋介石所留下的纪录当中，除了前文曾经提到的他为1928年的国货展览会主持开幕之外，他也呼吁周遭的朋友多用国货，不要因不用而被冠上汉奸的恶名。<sup>91</sup>

但是国民政府也并非对于国货运动完全无条件的支持，当国货运动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中央政府将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例如阎锡山的廿一师在1936年曾经在其驻扎地举办国货展览会，但是却因为没有得到军委会与统署核准而擅自主办，所以中央政府断定廿一师主办国货展览是非份与违法的。当时的中国虽然名义上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但是地方上仍有军阀的存在。<sup>92</sup>阎锡山是民国政府时期握有权力的军阀之一，因此这起事件可以推测是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之间的斗争，中央政府借此来打击地方军阀在地方统治上的合法性。<sup>93</sup>这证明了国货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政治利益为国民政府的优先考虑。

### 第三节 宣传与动员方式

---

<sup>88</sup> 《申报》，1934年6月29日。

<sup>89</sup> 国民政府官员，生平不祥。

<sup>90</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林耕宇呈蒋中正请设立推销国货劝导员训练班推销国货及派侦探常驻日本朝鲜台湾刺探各方情形》，1935/01/30，典藏号：002080200203064。

<sup>91</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陈布雷面嘱陈立夫转告上海友人或商会等多用国货》，1936/12/07-1936/12/07，典藏号：002010200170044。

<sup>92</sup>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的军阀，请参考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页671-692；徐中约着，计秋枫与郑会欣译，《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页543-548。

<sup>93</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饬阎锡山廿一师非法办国货展览会师长记大过政训处长革职》，1936/11/11-1936/11/11，典藏号：002010200167049；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电阎锡山第二十一师政训处擅自主办国货展览会殊属非分违法其师长李仙洲即记大过一次政训处长张德容革职严惩展览会勒令停闭》，1936/11/11，典藏号：002080200423033。

在中国国货运动之中，主要有六种宣传与动员方式：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这六种宣传与动员方式的性质虽然相距甚远，但在国货运动之中却互相兼容，并且对于国货运动的推广上有很大的功效。

### 国货展览

国货展览如同一般的商品展览会一样，但是国货展览的目的不同于商品展览会一般着重在商品的价值，而是通过展览向民众推广国货来达到促销国货的目的。<sup>94</sup>此外，国货运动不仅仅只展览商品，参展厂商往往也同时在展览期间在会场内贩卖自己品牌的商品。

国货展览在北洋政府时期就已经出现，但较具规模的一次国货展览是 1928 年在上海举办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这次的展览是由刚上台不久的国民政府的工商部所办，并获得了当时上海各方团体的帮助。这次的国货展览吸引了许多商家参与，除了上海天津等沿海地区之外，甚至新疆与云南等偏远地区也有厂商参与这次的国货展览。<sup>95</sup>这次的国货展览成为了日后多场国货展览的典范，日后在中国各地有以类似的方法进行的国货展览在中国各地举办，甚至国货展览也开始在海外华人地区出现。<sup>96</sup>另一方面，1928 年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是国民政府第一次介入国货运动，并且不少政要人物也为此出一份力，<sup>97</sup>可视为是国民政府正式参与国货运动。

### 国货陈列馆

国货陈列馆的功能与博物馆类似，通过展览特定价值的事物来传达某种理念或知识。虽然国货陈列馆如同博物馆都是展示具有特定价值的事物，但不同的是国货陈列馆所展览的不是古物，而是当时中国国货厂商们所生产的商品，并希望通过

---

<sup>94</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 206.

<sup>95</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257-258.

<sup>96</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276-278.

<sup>97</sup> 这次国货展览的一位开幕嘉宾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见台湾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蒋中正命薛笃弼监誓赵戴文任内政部次长职并筹备成立卫生部另参加上海中央银行及国货展览会开幕典礼致词》，典藏号：002060100015001。

展示的商品来教导民众市面上那些商品是国货与如何分辨国货，以及劝导民众应该尽量购买国货，以达到振兴中国经济的目的。此外，与国货展览所进行的不定期且短暂展览不同的是，国货陈列馆是在一个地区进行长期的展览。

在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就已经出现了国货陈列馆，并且计划在其他中国城市如汉口等地建国货陈列馆。<sup>98</sup>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原先旧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国货陈列馆进行规划。国民政府为国货陈列馆订立了各种规则，不但详细订立了国货陈列馆要如何运作、要求各省与特别市必须设立国货陈列馆以及各地的陈列馆必须以工商部陈列馆作为模仿对象之外，甚至也规定国货陈列馆要如何收集并审查所收集的中国商品是否可被视为国货、国货陈列馆应该如何售卖国货商品以及规定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国货展览等等详细规则。国民政府甚至也要求海外华人地区也应该设立国货陈列馆，并且也为海外地区的国货陈列馆订下了详细规定。<sup>99</sup>

## 国货商场

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展览主要的目的在于展示国货商品，以售卖国货为次要目的。因此，以售卖国货为主要目的，展示国货商品为次要目的的国货商场应运而生。<sup>100</sup>

国货商场除了包括天津国货售品所等大小国货公司这类型的永久性的国货商店与商场之外，也包括了如“九一八”国货商场等暂时性售卖国货的场所。在永久性的国货商场之中，大部分的国货商场与商店只进行售卖国货而没有其它活动，只以贩卖国货作为唯一的功能，其中的代表有天津的国货售品所与济南国货售品所。此外，也有一些特例，例如上海蓬莱市场。它除了拥有多个国货制造商的门市商店之外，里面还有各种娱乐与休闲设施，是一个综合娱乐中心。在其开幕的时候，除了在报章上登广告之外，也邀请当时的著名艺人主持开幕典礼。此外，也在一些庆

---

<sup>98</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 225.

<sup>99</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国货陈列馆改订暨联合营业章程》，1928/05/29-1938/09/17，典藏号：001110020006。

<sup>100</sup> 但是在二战时期，一些位于日本占领区的国货商店为了生存，而也有售卖少量的外国商品，其中天津国货售品所就是一个例子。见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48-249。

典上也通过演讲、游艺节目、群众活动等来宣传国货。<sup>101</sup>暂时性的国货商场则较为少见，大多欲达到某种目的，例如“九一八”国货商场的目的除了推广中国国货之外，也希望藉由“九一八”国货商场来提醒中国人民九一八事件并挑起人们的反日情绪与对日货进行抵制。<sup>102</sup>

此外，也有国货商场在当时也被视为是当地的国货运动的核心组织。例如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在 1919 年之前也是天津地区的国货运动的活动场所与其它国货组织的集合地点，不但常在天津国货售品所举办与国货运动相关的演讲与国货促销活动之外，同时也成为了救国十人团等国货运动组织的出没之地。

### 国货广告

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以及国货商场对国货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广作用，但是它们却因为场地的局限，因此只能把国货的相关讯息传达给曾经参观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以及国货商场的民众。但是国货广告却能够弥补它们的不足，不但能够通过报纸和街头巷尾的广告劝导民众购买国货与通知国货的相关消息，并且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商场也可以藉由广告来吸引更多的人参观这三种与国货运动密切相关的场所。

最早在广告中以中国国货身分出现的商品是中国的卷烟，<sup>103</sup>这种在广告中声称自己的商品为中国国货的趋势自此在厂商之中开始蔓延开来，其中中法大药房的人丹就是在广告之中突出其国货性质的最佳例子。中法大药房的人丹是模仿日本药品仁丹的医药商品，取名为人丹的原因是名字念起来与仁丹相同，希望能够藉此来混淆民众并夺取仁丹的市场。但是人丹在市场上始终无法与仁丹竞争，一直处于下风。后来中法大药房趁抵制日货运动兴起的时候，在当时的广告之中突人仁丹是中国人所生产的商品，希望能够抢夺仁丹原来占有的市场率。<sup>104</sup>

---

<sup>101</sup> 高屋，〈为提倡国货出力的上海蓬莱市场〉，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63-265。

<sup>102</sup> 杨承祈，〈“九·一八”商场〉，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75-278。

<sup>103</sup>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页 270-271。

<sup>104</sup> 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7-49.

在 1928 年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对于国货广告也有所有关注并给予协助。1929 民国政府颁布法令，对于国货广告给予减税甚至免税，使得国货在广告方面的成本得以降低，在与外国货品竞争的时候具有较佳的优势。<sup>105</sup>另一方面，一些国货厂商把自己广告内容与当时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政策相结合，使得在拓展国货商品的销路的同时也推动了国家政策。在新生活运动之中，许多国货厂商在进行广告宣传时把新生活运动的口号与政策加入。例如在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广告把新生活运动中的几个与卫生相关的要求与其商品如牙刷牙膏、肥皂等连在一起，在推销自己的商品的同时也推动国家的政策。<sup>106</sup>

### 宣传刊物

在当时，一些与国货运动相关刊物也具有推广国货的用途。除了各地所出版的《国货调查录》之外，还有其它的国货刊物，例如《国货月报》、《妇女与国货》、《国货与实业》等杂志在当时中国各地出版。这些刊物的内容除了告诉人们何者为国货之外，也鼓励人们积极购买国货，以及灌输当时的中国人民必须购买国货以显示自己的爱国之心，并且为提振中国经济和国力贡献力量以尽身为中国国民的义务。

在众多的宣传刊物之中，以中华国货维持会从 1912 年开始发行的《国货调查录》最具代表性。当时为了推动民众认识并购买国货，但是却也担心民众不懂得如何鉴别国货，因此中华国货维持会觉得有必要出版刊物告诉大众何者为国货，并且也藉此教育民众要购买国货。另一方面，当时许多中国国货为了打开市场而仿冒外国货并加上英文商标，使得中国货品难以与外国商品区分，这同时也导致了抵制外货运动与其它活动在进行的时候难以锁定目标，因此调查那些市面上的货物为国货成为当时国货运动所关注的事情。此外，当时国货运动的支持者们也担心自己所购买的商品并非国货，因此也需要一份国货指南来告诉他们何者为国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华国货维持会把自己对市面上的中国国货商品的调查结果出版成《国货调查录》，其内容按照货物类别与制造商的名字来进行编排，告诉人们当下具备国

---

<sup>105</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215-216.

<sup>106</sup> 《申报》，1934 年 6 月 29 日。

货资格的中国商品。《国货调查录》在出版之后也不断更新其中的内容，并且这也影响了其它地区的国货运动团体也自行出版自己的《国货调查录》。<sup>107</sup>

此外，中华国货维持会不但最早对各个国货厂商进行调查以确定其产品是否为国货并且出版《国货调查录》，也同时颁布证书证明某商品为国货。<sup>108</sup>但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调查国货的事情就落到了国民政府身上。国民政府接手之后把调查国货的步骤程序化。国民政府宣布各个厂商必须自行申报自己为国货，在缴交申请表格、样品以及申请费用之后，政府将进行调查以验证此货品是否为国货。如果证明为国货，政府将会颁发国货证明书予厂商，并且也可公开宣称自己为国货。此外，国民政府也把国货分成七等，依照资本、经营者、员工与原料这四者来决定国货的等级。<sup>109</sup>这样的认证方式不但让厂商可以以此作为广告宣传的噱头，并且也可以省却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商场审查某商品是否为国货的时间与人力物力。

### 抵制外货运动

抵制外货运动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中很重要的一环，抵制外货运动除了指以拒绝购买与使用某国所生产的商品之外，并且是以动员社会全体成员的方式进行。在抵制外货运动进行的时候除了会运用广告与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动员之外，甚至也会以暴力的方式来逼迫不愿参与的社会成员加入抵制外货运动的行列之中。此外，抵制外货运动并非单纯地只是国货运动的动员与宣传的工具之一，它

---

<sup>107</sup> 从笔者所收集的资料之中，浙江省的国货团体（浙江省各界服用国货会和浙江省城中等以上学校劝用国货联合会）就曾经分别在民国9年（1920年）与民国23年（1934年）出版过类似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国货调查录》的刊物来宣传国货。另外也有天津的天津国货调查会也在民国8年（1919年）出版了《天津国货调查月刊》第一期。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85-192.

<sup>108</sup> 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页73-74。

<sup>109</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行政院呈通过修正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及国货暂订标准》，1928/06/06-1937/07/27，典藏号：001114240002；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修正、中国国货暂订标准、国货审查委员会规则、国产检验委员会暂行规程草案及购用国货办法》，1932/03/14-1937/07/08，典藏号：001110020007。

具有自己的发展史，甚至在某些时刻与国货运动的关连并不大，例如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即不与国货运动相连。<sup>110</sup>因此，可以把国货运动的特质归纳成四点。

第一个特点是抵制外货运动大多是因应当下的政治事件而发生，事先并无策划。例如 1915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是因为当时日本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所掀起的外交风暴导致。1915 年日本要求中国北洋政府答应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以保障与扩大日本在华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权利，北洋政府后来答应了这些要求。二十一条的内容公开后在中国社会中引起喧然大波，让许多中国人对日本与北洋政府感到非常不满。一部份的中国人对此以拒绝购买与使用日本商品作为抗议方式以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抵制日货运动因此爆发。<sup>111</sup>

第二个特点是抵制外货运动不但有自己的历史，并且它的出现早于中国国货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抵制外货运动可以追溯到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市民变。明清时期已经有不少的城市人口，在面对政府的施政压力或制定了不利于他们的政策的时候，城市的居民会组织起来进行示威、请愿、罢工等活动来抗议，甚至这些抗议活动会演变成暴动。<sup>112</sup>在宣传与动员方式、参与群众的基础与参与目的等方面，明清的城市民变与清末到民国之间的抵制外货运动非常相似，因此可以合理推测说两者有所相关。但是抵制外货运动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它们的行动背后拥有更强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并且打破了明清时期城市民变的地方性质而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运动。<sup>113</sup>

第三个特点是抵制外货运动常常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并且也有使用暴力的纪录。许多抵制外货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其宣传之中常要求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参与抵制外货的行列。例如在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之中，就动用了各种宣传方式如广告、小故事、演讲和展览等来鼓吹中国人民参与抵制美货运动。<sup>114</sup>此外，抵制

---

<sup>110</sup>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sup>111</sup>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页 502-507, 513-517。

<sup>112</sup>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收录于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 229-258。

<sup>113</sup> 巫仁恕，〈前现代的抵制运动——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收录于黄贤强编，《文明抗争——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论集》，页 47-57。

<sup>114</sup> 有关 1905 年的抵制美货运动的宣传方法与动员方式，请参考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pp. 119-144。

外货运动也具有暴力的成分。抵制外货运动中常常呼吁人们拒绝购买和使用某国货品，虽然这种呼吁是平和的，但是却常常通过集体组织所形成的心理压力，或者以故事等宣传方式做为包装的暴力威胁，促使人们不敢使用某国商品。<sup>115</sup>例如在广告上面呼吁人们拒绝使用某国货品的时候，同时也灌输着使用他国商品就是不爱国或者叛国。<sup>116</sup>这种强烈手段除了针对消费者之外，也用于一般的商人之上。在抵制外货运动之中，一些激进份子也常常以暴力胁迫商人，要求他们不可售卖他国货品，<sup>117</sup>甚至动用私刑处罚他们。<sup>118</sup>同时在一些宣传之中，也把贩卖他国商品者视为不爱国的商人或者奸商。<sup>119</sup>

第四个特点是，抵制外货运动虽看似与国货运动无关，但却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于抵制外货运动只是求不购买某国货物而并非要求购买国货，因此抵制外货运动表面上看似与国货运动并无多大关系。但抵制外货运动发生的同时，常常出现要求购买中国商品的声音，并且也有商家趁此良机打着中国国货的旗号积极开创与扩张自己的事业，抢夺被抵制的外货原先在中国所占有的市场。因此，抵制外货运动在无意之中壮大了中国国货运动。天厨味精是一个能够突显抵制外货运动推动国货事业发展的例子。天厨味精自 1922 年成立以来，就必须面对日本味精——味之素这个强大对手的威胁。当时味之素占有中国大部分的调味料市场，产量远远大于中国本土制造商生产的味精。后来在 1925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之中，味之素因为是日本货而遭到抵制，天厨味精趁着这个机会抢下了味之素原先占有的市场，而成为中国调味料市场中的重要品牌。在抢夺味之素市场的过程之中，天厨味精的制造商吴蕴初除了表态支持抵制日货运动之外，也在过程之中不断强调自己所生产的味精是国货，甚至在 1925 年后继续提升天厨味精的国货成分。例如吴蕴初就开办盐酸等味精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达到“纯粹国货”的目标，使得天厨味精对拥

---

<sup>115</sup> 从十人救国团的组织方式可看出就是以群众压力促使人们放弃使用外国商品，转而使用国货。有关十人救国团的研究，见小野信尔着，殷叙彝，张允侯译，《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另外，有关使用暴力威胁人们不准使用外国商品，见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78-179.

<sup>116</sup> 《国货月报》，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6 月。

<sup>117</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61-163, 177n35.

<sup>118</sup> 例如把那些被列为“奸商”的商人抓去游行示众。见文正宜，〈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宜昌〉，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445。

<sup>119</sup> 在广告之中，就把贩卖外国商品的商人描绘成奸商。《申报》，1934 年 7 月 26 日。

中国民族主义的民众更具有吸引力。<sup>120</sup>其它类似的个案非常多，例如在宜昌商人李开荣就趁 1908 年抵制日货运动的时候，仿制日本的织布机，抢夺日本纺织业在宜昌地区的市场；以及在 1920 年森茂肥皂厂在自己所生产的肥皂的包装上就印有呼吁人们爱国就要使用国货的宣传。<sup>121</sup>

民国时期，许多国货商人借着抵制外货运动来不断拓展自己的商品的销路。其中一些公司把自己的商品或者促销活动与这些政治事件挂钩，在抵制外货的同时推销自己的商品。例如章华毛纺厂就在 1932 年生产了以“九一八”作为商标的商品，<sup>122</sup>以及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也趁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运动提出了“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的口号。<sup>123</sup>甚至也有国货厂商也投入并支持抵制外货运动，例如天津的国货售品所在 1919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之中就涉入甚深。<sup>124</sup>这不但达到抵制日货的效果，同时也推销了国货。

虽然抵制外货运动的发生时间短暂，但是它的动力并没有因为运动结束而消失，而是继续保存到下一轮的抵制外货运动再度爆发。例如 1915 年之后的抵制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往往都会再次提及导致 1915 年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二十一条。<sup>125</sup>这种重复提醒人们过去的国耻，使得抵制外货运动能够很快地升温，并且从过去的基础上出发来加剧人们对抵制外货运动的情绪与反应。

除了抵制外货运动常常再度引发国货问题的讨论，并提醒人们提倡国货的重要性之外，同时国货运动也加剧了抵制外货运动的力度。例如一些厂商和组织在抵制外货运动之后推出一些与抵制外货运动有关的国货商品，例如许多三十年代所出产的一些国货和这时候办的一些促销活动以“五卅”、“五九”、“九一八”作为

---

<sup>120</sup> 高屋，〈天字号系统产品与外货的斗争〉，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118-120。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345-350.

<sup>121</sup> 文正宜，〈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宜昌〉，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444-446。

<sup>122</sup> 杨承祈，〈章华毛纺厂的“九·一八”薄吡叭〉，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91-92。

<sup>123</sup> 马炳荣，〈铅笔谱下的国货颂歌〉，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29。

<sup>124</sup> 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43-244。

<sup>125</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169-175.

名字，都恰好证明了这点。<sup>126</sup>通过这些商品，不但提醒了人们当时的抵制外货运动，以及挑拨起过往对抵制外货运动的情绪。

抵制外货运动不但为国货厂商带来商机，并且同时也促进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在抵制外货的同时，许多抵制外货组织呼吁使用自己本国出产的货物来代替外货。这种以国货取代外货方式也深入人心，许多人也开始认为真正的抵制并非不购买外国商品，而是必须要使用本国生产的商品。这种理念带有了挽回利权等概念，这同时也是国货运动再三呼吁的理念。

#### 第四节 小结

虽然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开始于民国建立之后，但是它的背景与发起原因却可以追溯至民国建立之前。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中国不但在政治与军事上败于列强之手，并且在经济与社会上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西方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生活用品和思想都被引入中国，中国不但在物质方面采用西式的日常用品和模仿西方的机器生产模式，并且也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念。中国国民的身分认同有所变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以及逐步地把中国与其相关事物建构成类似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并且同时也认为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因此中国国民必须团结对外。在社会、经济与思想转变的情景之下，中国的国货运动于焉产生，认为作为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一份子，就必须参与国货运动以振兴中国经济并免于中国在经济上落后于他国。

中国国货运动的目标非常清晰，即是振兴中国经济。可是中国国货运动的最初目标则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纺织业，防止民国初期的国服政策对中国纺织业造成伤害，这个目标完成之后，才演变成振兴中国经济。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最初的方法只是单纯地提倡国货，要求中国人购买、使用与贩卖国货。后来随着国货运动的发展，达成目标的方法进一步实际化，要求中央政府改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环境，除

---

<sup>126</sup> 例如章华毛纺厂的薄哔叽就是以九一八作为商标。见杨承祈，〈章华毛纺厂的“九·一八”薄哔叽〉，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91-93。有关当时以这些国耻日为名的促销活动，见杨承祈，〈“九·一八”商场〉，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275-278。

了要降低关税与给予优惠措施之外，后来金融业也给予融资，让国货厂商的营运资本有更大的使用空间。后来随着国民政府参与国货运动，国货运动的目标不再只是振兴中国经济，还是国民政府达成施政目标的工具，并且国民政府也通过国货运动打压地方军阀。

为了促进国货运动的发展与达成国货运动的目标，必须鼓励中国国民积极参与国货运动，因此各种宣传与动员方法是必要的。在国货运动之中，最常见的动员与宣传手法有国货展览、国货商场、国货陈列馆、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这些方法各有其优点，并且彼此之间也形成互补的作用，其中前面五种是在民国时期的日常生活之中可常常见到的国货运动宣传方法，抵制外货运动则是随机发生的宣传与动员方式。此外，抵制外货运动虽然可视为是国货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它同时具有自己的特色，也不完全隶属于国货运动。

### 第三章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

随着中国国货运动向海外华人地区发展，新马地区也出现了中国国货运动。如同中国各地国货运动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样，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有些地方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不一样，并且拥有自己的特点。

本章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说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起源、变化与原因。大致上，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11年到1927年为第一个时期，在此时期已经有中国国货在新马地区贩卖，可是却只有小部分的人偶尔提倡国货。在这段时期，国货运动并未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甚至可说并没有形成一种运动。第二个时期是新马地区的总过国货运动的关键年份——1928年。1928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举办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宣告成形，并且成为日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日后基础。第三个时期是从1929年到1941年，在此阶段中国货运动在新马成为一股风潮，几乎每一个华人都不免卷入这场运动之中。在此时期，济南惨案与九一八事变等政治事件的发生，以及中国商人开始留意到东南亚华人市场是中国国货的潜在市场，都刺激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再加上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介入并大力推动国货运动，都推动了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此时段末期随着中日战争而在新马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人们在抵制日货之余，也积极提倡国货，推动了国货运动更进一步壮大。

#### 第一节 国货运动的雏型（1912-1927）

虽然在1910年代新马地区就能够买到中国商品，但是新马华人小区并没有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一样，在1911年后就有了自己的中国国货运动。在1915与1916年的新马市场上可以发现有好些商家售卖中国商品，甚至也有些中国商号已经在新马许多城市设有代理处，以及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国货公司，<sup>127</sup>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国货运动已经出现。此外，从当时的报纸上也可以阅读到与中国商品相关

---

<sup>127</sup> 益丁，〈国货运动与南洋市场——南洋侨胞与国货运动的若干史实〉，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377。

的报导，并且新马社会中已经有一些人呼吁使用国货，<sup>128</sup>但是在新马地区之中，国货运动却尚未成形。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新马地区没有出现中国国货运动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新加坡与马来亚等南洋地区并不是中国商品的主要市场，大部分的中国商人的目光仍然停留在中国本土的市场，这种情形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所改变。<sup>129</sup>没有出现国货运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新马华人并没有像中国国内那般感受到外国经济力量所形成的压迫。当时的新马华人虽然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落后于英国商人，但是大体上仍然不受到影响。甚至新马地区的一些英国商业机构之中，新马华人掌握了大部分股权，无形中华人仍然占有优势。<sup>130</sup>

1919年，新马地区也因应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等活动。从这个时候起，新马地区开始出现了提倡国货的声音。1919年在凡尔赛和谈会议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不是由中国收回，因此在中国不但引发了五四运动，也在中国各地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抗议日本的示威活动。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声音不单单只是限于中国本土，它也出现在英属马来亚等海外华人社区之中。虽然从5月4日开始，抵制日货运动与示威抗议活动在中国各地陆续爆发，但是新马地区的抵制日货运动与示威抗议却不是立即在5月4日后发生，直到6月19日后新加坡和檳城才发生反日暴动。<sup>131</sup>暴动在新加坡发生时，中国驻新加坡领事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劝阻人民不要动以暴力，呼吁大众必须保持冷静。<sup>132</sup>

反日暴动的发生并非意外，而是酝酿了好一段时间。在当时的《叻报》上可以阅读到许多与中国地区的反日示威与抵制日货运动的相关报导，以及凡尔赛和谈上对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列强与中国政坛对此问题的见解与意见。综观当时《叻报》上的新闻，笔者发现这些报导中都充满了反日情绪，认为日本为中国最大的敌

---

<sup>128</sup> 《叻报》，1915年5月21日，第二页。

<sup>129</sup> 此改变将在本章下文叙述。

<sup>130</sup>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35-242.

<sup>131</sup> 《叻报》，1919年6月20日，第三页；《叻报》，6月23日，第六页；《叻报》6月26日·第三页。

<sup>132</sup> 《叻报》，1919年6月21日，第九页。

人。因此以抵制日货等方式来抗议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与态度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方法。

当时也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纯然抵制日货并不能振兴中国，因此开始寻找其它的方式。在众多方式之中，购买与使用国货成为众多选项之中一个最为直接的替代品。这样的结果首先是因为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两者都和经济有关。当时持有这种意见者认为，当下抵制日货，是因为日本的举动羞辱了中国。中国之所以被日本等列强所欺凌，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远远逊于列强。因此，要避免被欺凌的方法就是让中国强大。让中国强大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振兴经济，振兴经济则必须要从振兴中国的工商业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和购买中国自己生产的商品则是振兴中国工商业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人们之所以认为购买国货会帮助中国壮大起来，是因为这也是一般百姓能够参与并且帮助中国强大的方法。参与示威的活动虽然能够对他国展现自己的不满与气氛，但是对于大局并没有多大帮助；抵制外货运动虽然能够对于他国造成伤害，但是却不一定有利于中国自身。国货运动则是直接有利于中国本身的工商业发展。由于中国人购买中国货，为原本质量与价格逊于他国的中国商品提供了广大的固定市场，这使得中国国货厂商能够获得盈利，进而进行再投资等活动，使得中国经济能够再进一步发展，并且使得中国得以壮大。

此外，参与国货运动这样的想法能够在新马华人小区之中流行起来，是因为当时的新马华人能够为中国有所贡献的管道并不多。他们远离中国本土，虽然在政治上有参政权，但是实际上能够直接参与政治的新马华人并不多。虽然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中，新马各地的中华总商会可发送电报给中国政府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意见，但是也只是限于表达意见，而远远不足称得上可以改变当下的中国政治局势。因此，国货运动成为另一个能够让新马华人能够尽其身为中国国民义务的管道。

1919年的国货运动主要仍然是限于文字上的谈论，具体的行动并不多。在文字上，国货主要是局限于广告与评论。从当时的广告内容之中除了可以得知1919年国货在新马地区的情形之外，也可以得知在此之前国货在新马地区的情况。在1919年反日运动尚未在新马地区爆发之前，虽然有中国商品的相关广告，但是尚

未突出其为中国国货。以 3 月 1 日为例,《叻报》上只有其中两则与中国商品相关广告(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朱广兰所刊登)要求“爱国侨胞”购买他们的商品。此外,这两则广告中没有出现“国货”的字眼,在朱广兰的广告中也只出现“土货”一词。在同样一天的报纸上,却有三则日本商品的广告(日本仁丹、日本蜜酒与石灰)出现在上面。<sup>133</sup>

当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之后,《叻报》上与中国商品相关的广告仍然只有少部分声称自己是国货或者土货,其中只有一则广告要求新加坡的中国侨民购买,以及两则强调富强中国。<sup>134</sup>即使是六月的反日暴动爆发之前,除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广告在广告内容上出现改变之外,其它大部分中国商品的广告并无多大变化。<sup>135</sup>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广告从最初声明自己为土货,<sup>136</sup>到后来指出购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商品能够振兴国货,并且使得中国富强与挽回国家利权。<sup>137</sup>原先不以国货作为号召的先施公司也从 5 月 23 日一改常态,在广告中声称自己正在贩卖从广东运来的新式铁烫斗以及上海来的“爱国土布”。<sup>138</sup>这两家公司的广告变化无形中显示了当时新马地区对于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反应逐渐热烈,以及商家们发现这是一个商机,能够趁人们爱国之心逐渐加温的时候卖出更多的中国商品。

在 6 月 19 日反日暴动发生之后,许多商家开始有所反应,极力撇清与日货的关系或者断绝与日本商品之间的往来,以避免反日暴动的矛头对准自己。首先是《叻报》从 6 月 20 日起声明自第二天开始不再刊登日本商品的广告。<sup>139</sup>此外,当时也有许多商人在报章上刊登声明,宣称自己已经停止或者没有办理日货以及拒绝运载日货。<sup>140</sup>商人除了拒绝售卖日货之外,许多贩卖国货的商人也趁此机会扩张市场。当时新马大众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出现增长的趋势,这可从当时中华国货公司

---

<sup>133</sup> 《叻报》, 1919 年 3 月 1 日, 第一页。没有办法得知朱广兰所从事的具体生意, 但根据它所贩卖的商品推断, 它是一家专办各种中国杂货的杂货店。

<sup>134</sup> 《叻报》, 1919 年 5 月 12 日, 第一页和第二十页。

<sup>135</sup> 《叻报》, 1919 年 5 月 26 日; 6 月 16 日。

<sup>136</sup> 《叻报》, 1919 年 5 月 7 日, 第一页。

<sup>137</sup> 《叻报》, 1919 年 6 月 13 日, 第一页。

<sup>138</sup> 《叻报》, 1919 年 5 月 24 日, 第三页。

<sup>139</sup> 《叻报》, 1919 年 6 月 20 日, 第二页。

<sup>140</sup> 《叻报》, 1919 年 6 月 23 日, 第二与第三页。

自 6 月 23 日在《叻报》刊登的广告内容中得知。中华国货公司宣称“日来我侨胞爱国热度日高”，因此欢迎对于售卖国货有兴趣者前来洽谈代理事宜。<sup>141</sup>

在一连串与日本断绝经济往来的事件之中，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即中华国货公司在广告中所提及的对中国商品有兴趣的代理商是日本商人。<sup>142</sup>显然，当时在国货运动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商品的国籍，次为商品代理商的国籍。除了中华国货公司的现象之外，也可从当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多日刊登广告澄清自己为中国国货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从 6 月 23 日开始，南洋烟草公司多日连续刊登广告，除了声称自己是国货之外，也呼吁人们不要“误会，至碍实业前程”。<sup>143</sup>从 27 日起，更有一版的版面是有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澄清自己为国货的声明。<sup>144</sup>当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而再地声明自己是国货，与当时它的拥有人简照南被指控为日本人有关。由于一个商品是否为国货与生产的公司的持有人国籍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不得不如此。以上所提的两种现象——不反对日本商人贩卖中国货以及不同意号称生产中国商品的南洋烟草公司的所有人为日本国民——显示了与贩卖者国籍相比较，商品的国籍更被人们所关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叻报》上许多广告与声明并没有公然宣称自己是抵制日货，而是用其它语言代替。如同上面提及的，《叻报》上可以看到许多宣扬抵制日货的声明，但是却以“洋货”和“某国”来取代“日货”和“日本”。其中最好的例子是《叻报》在拒绝刊登日货广告的宣传上以“某国人广告”来取代“日本广告”一词。<sup>145</sup>

除了广告之外，也可从当时报章上的评论看出国货逐渐受到新马华人的关注。当时《叻报》上出现的国货相关的评论与报导，主要是呼吁人们要购买与使用国货。从 6 月中旬开始，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如何振兴中国工业的讨论，希望通过民

---

<sup>141</sup> 《叻报》，1919 年 6 月 23 日，第三页。

<sup>142</sup> 《叻报》，1919 年 6 月 23 日，第三页。

<sup>143</sup> 《叻报》，1919 年 6 月 23 日，第一与第三页。

<sup>144</sup> 《叻报》，1919 年 6 月 27 日，第七页。

<sup>145</sup> 《叻报》，1919 年 6 月 20 日，第二页。

间组织来振兴中国工业。<sup>146</sup>6月19日的反日示威之后，提倡国货成为《叻报》评论中最常出现的话题之一，与国货相关的报导以及讨论如何提倡和推销国货的文章大量出现。当时《叻报》的社论中不时会出现一位笔名为精兵的作者讨论如何振兴中国实业。<sup>147</sup>由于报社的社论代表了一份报纸的立场，因此这显示了当时《叻报》的立场倾向于提倡国货。此外，当时报纸上面出现了许多呼吁支持国货以及详细介绍各个国货厂商现况的文章，从七月末开始在《叻报》连载的文章〈日夜盼望之国货消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它详细列出了当时中国各个大厂商和销售商的名字以及历史，无形中为各个国货商家做了广告。<sup>148</sup>另一方面，也有其它的报导呼吁人们振兴中国要购买和使用国货<sup>149</sup>，或者通过列出日货，通过抵制日货的方法来间接推广国货。<sup>150</sup>

1919年的新马华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新的国货公司的成立以及国货销售额的增加。虽然当时的国货运动大部分限于字面上的讨论，但是甘清泗、黄肖岩、林本道等当地商人却付诸行动，着手组织华货商社（类似合作社的组织），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推广国货。<sup>151</sup>另一方面，由于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的双重作用，使得国货在当时的销路大增。从当时的报章上呼吁商人不要囤积国货以谋取暴利的情况来看，正好印证了这一现象。<sup>152</sup>

虽然国货运动尚未完全成形，但是1919年可以视为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萌芽。这次的国货运动之中许多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出现，意识到自己是中国国民并且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此外，1919年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短期目标很明显是要抗议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危害了中国的权益；长期目标则是以促进中国实业发展，增强中国国力。由于身分认同以及运动目标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1919年已经进入萌芽阶段。

---

<sup>146</sup> 《叻报》，1919年6月12日，第三页。

<sup>147</sup> 精兵，〈救国的呼声〉，《叻报》，1919年6月23日；精兵，〈论吾尚当设立一实业研究会〉，《叻报》，1919年7月4日；精兵，〈振兴实业宜从调查实业开始〉，《叻报》，1919年7月31日。

<sup>148</sup> 《叻报》，1919年7至8月。

<sup>149</sup> 《叻报》，1919年6月24日，第九页。

<sup>150</sup> 《叻报》，1919年7月3日，第九页。

<sup>151</sup> 《叻报》，1919年7月23日·第三页。

<sup>152</sup> 《叻报》，1919年6月23日，第三页。

但是同时要注意的是，虽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当时已经进入萌芽阶段，但是有些地方仍然不够成熟，因此无法说明国货运动已经形成。首先是在宣传方面。根据所收集的史料，当时国货运动的宣传大多仍然限于报纸版面上的广告与报到，尚未发展出传单、演讲等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流行的方式来宣扬国货运动。此外，当时国货展览和国货陈列馆也没有出现在新马地区。

另外一个不成熟的地方是当时的国货运动尚未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网络。当时虽然有一部分本地商人成立了国货商店，以及不少本地华人购买国货，但是这些只是零星活动，并且无法看出其中各个活动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此外，当时的驻新加坡领事馆对于这些事情并没有过问，参与者在当时的中华总商会之中也没有占有重要的职位，这显示了这场国货运动缺少了当时新马地区最重要的机构的背书。其中当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正副会长薛中华<sup>153</sup>与陈若愚<sup>154</sup>两人在这段期间都没有提倡国货的举动，即为最好的证明之一。因此可说，虽然有不少华人支持国货，但是这场运动仍然处在当时华人社会的边缘，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虽然短期内抵制日货运动与国货运动打击了日本商品在新马地区的销售额并且刺激了中国商品销售的增长，但是长期而言，这次的影响并不大。在这波国货运动结束之后，人们很快地再度回到从前以购买其它国家的商品为主的消费方式。<sup>155</sup>

在 1919 年到 1928 年之间，国货运动相对显得沉寂。在这段期间，并没有大规模的国货宣传，有的只是零星讨论如何提倡国货；虽然在广告上可以常常看到中国商品的广告，但却未必一定以中国国货作为号召，大多数以国货作为号召力的公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他们的广告与 1919 年之前的广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这段时期的评论来看，新马华人对于提倡国货的层次逐渐提高了。在这个时期，新马华人不只着眼于国货短期和表面上的销售成绩，而

---

<sup>153</sup> 薛中华（1886- 1940），福建省东山县人。华社领袖，其曾祖父为新加坡福建帮开山始祖薛佛记。幼年就读于新加坡圣约瑟书院，1901 年担任汇丰银行买办助理，1909 年正式担任汇丰银行买办。曾担任英国政府太平局绅、市政议员、海峡殖民地议会议员，并且也曾经担任中华总商会会长与福建会馆主席。见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212。

<sup>154</sup> 陈若愚（1866- 1939），广东省潮安人。南来后接管父亲尘永锡创办的永合成布店于万成顺暹郊，并且另行创设万永源布店与万顺昌汇兑庄。曾经服务与中华总商会，以及瑞蒙学校正副总理与信托人。1932 年回返中国。见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 84。

<sup>155</sup> 见谷，〈国货销路的推广〉，《南洋商报》，1924 年 3 月 22- 25 日。

开始关注更深层的问题。例如开始讨论如何长期提升国货的销售额，以促使人们不只是因为一时的激情而支持国货，以及国货在商品质量、价格与销售方法等涉及实际提升国货素质与销售量的问题。<sup>156</sup>此外，由于新马与中国本土在地理上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因此对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造成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有关中国的工商业讯息传递到新马地区的速度相对缓慢，导致新马华人无法清楚得知中国工商业最新的产品与信息，中国本土的国货厂商也无法得知新马市场的消息。这造成了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发展无法与中国本土的同步，使得想要购买国货的新马华人不得其门而入，以及中国厂商无法制造与贩卖适合新马华人所需的商品。这些问题在当时已经有人开始展开讨论，并且提出了解决之道。<sup>157</sup>

中国国货运动虽从 1919 年在新马地区出现，但在 1928 年之前却未能完全成形，大众对国货运动也不热衷。虽然如此，在 1919 年到 1927 年之间，可以发现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参与群众规模逐渐扩大、以提倡国货来达到抵制日货和振兴中国的目的也越来越清晰，并且在这段期间内可算是达成了部份目标。虽然算不上能够真正的振兴中国经济，但是在这过程之中却达到了抵制日货的基本要求。

## 第二节 国货运动的关键（1928）

1928 年的济南惨案在新马地区掀起了中国国货运动的热潮，并且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这个时期成形。1928 年，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北伐逐渐往北推进，最终抵达山东。但是却在济南一带与进军当地的日军对峙并于 5 月 3 日发生了军事冲突，一些中国军民以及交涉员蔡公时被杀害。<sup>158</sup>济南惨案在中国各地掀起了很大的风波，各地都发动了抗日示威与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国货运动也再次被炒热。新马华人的爱国与民族主义意识也同中国一样，因应济南惨案而被点燃，抗日示威活动以及国货运动等也在当时的新马地区发生。

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和殖民地政府都十分关注新马华人对济南惨案的反应。有鉴于 1919 年因为反日所导致的暴动与戒严，中国驻新

<sup>156</sup> 〈国货销路的推广〉，《南洋商报》，1924 年 3 月 22 日-28 日。

<sup>157</sup> 〈推销国货所应有之设施〉，《南洋商报》，1924 年 4 月 26 日。

<sup>158</sup>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页 666-667。

加坡领事馆在第一时间通过当时各大报章呼吁人们要克制。虽然驻新加坡总领事不反对人们抵制日货，但是要求人们不要采取暴力行动。<sup>159</sup>另一方面，新加坡殖民政府也因为 1919 年的经验，因此对于反日活动多加关注，对于各种潜在的示威与可能涉及煽动的活动都加以禁止。在当时，有及个人在街头公然派发反日的传单而遭到逮捕；<sup>160</sup>甚至有人因为在街头公开朗读报纸上有关济南惨案的内容，被当局以具有煽动的嫌疑逮捕。<sup>161</sup>虽然这些人后来都无罪释放，<sup>162</sup>但是都显示了殖民地政府当局对新马地区的反日活动施予高度的关注。

与 1919 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比较，这次的抵制日货活动显得比较公开。当时不但可以在报纸上阅读到呼吁人们抵制日货或者有关抵制日货的报导，例如当时的报纸上出现了太平杂货商与修齐学校学生不但捐助济南灾民，并且也宣称将抵制日货的新闻。<sup>163</sup>同时也可以在公开场合中看见一些人公然派发宣传抵制日货的传单，例如当时在新加坡有好几个人因为派发宣传抵制日货的传单而遭到逮捕（后来被判无罪释放），<sup>164</sup>以及在怡保发现了来自中国的抵制日货的宣传海报与传单。<sup>165</sup>此外，从当时的新闻报导之中也可以知道这一次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只是单纯的抵制日货，而是扩张到服务业、运输业与银行业。在当时，许多日本人开设的理发店、航运公司的生意都受到影响，许多人也前往日本银行提取自己所储蓄的款项。<sup>166</sup>这些都对在新马地区生活的日本人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虽然这次的抵制日货运动看起来似乎是公开的，但是实际上许多商人采取比较不明显的方式来抵制日货。在当时，由华福公司、永兴隆、长发号等十四家商行所组成，负责引入与买卖日货的水仙门在广告中声称自己“虽为职业所拘而爱国之心岂居人后，五月十一日经发电向日本华侨各办家止办（日货）”。<sup>167</sup>但是，广告

---

<sup>159</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9 日，第三页；《叻报》，1928 年 5 月 9 日，第三页。

<sup>160</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0 日，第三页。

<sup>161</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2 日，第三页。

<sup>162</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三页；5 月 16 日，第三页。

<sup>163</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26 日，第二十页。

<sup>164</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2 日，第三页；5 月 14 日，第三页；5 月 15 日，第三页；5 月 29 日，第三页。

<sup>165</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2 日，第四页。

<sup>166</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三页；5 月 19 日，第四页。

<sup>167</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23 日，第十七页；《叻报》，1928 年 5 月 11 日，第三页。

的大标题上却说“因时势冷淡市面萧条影响本号甚巨刻经一致发电向各办家止办（日货）”。<sup>168</sup>水仙门的商家愿意告诉大家自己是因为爱国之心而停止办理日货，但是在标题中仍然声称自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而停止办理日货，显然仍然不愿意直接公开宣称自己抵制日货。不公然宣称自己抵制日货并非是孤立现象，也有不少其它商家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表面上声称因为经济不好导致日货没有销路而停止进口日货，实际上是因为要抗议日本侵犯山东而抵制日货。<sup>169</sup>当时的新马华人商家之所以采取这种低调的方法来抵制日货，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殖民地政府有鉴于1919年华人抵制日货而导致暴乱发生，而日货的华人代理商的动向更是探知新马华人是否开始抵制日货的风向球，因此对于华人抵制日货的行动非常敏感，并且有可能采取暴力行动来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为了抵制日货，商家们故而采取这种低调且不明显的方式来抵制日货。

与1919年的情形相同，中国国货运动很快地紧随着抵制日货运动在新马地区出现。自5月中旬开始，就有人再度提出提倡国货的概念与口号。在当时的社论与新闻报导之中，许多人认为单单要抵制日货是不足够的，只有振兴国货才是振兴中国与抵御列强的长久之策。<sup>170</sup>此外，人们也同时指出，单单只是推广抵制日货运动将只让其它国家获利，中国最终一无所获。因此，推广国货运动必须要与抵制日货运动同时进行。<sup>171</sup>甚至有部分人士更进一步，认为国货运动不等同于抵制运动，把这两者做出十分清楚的划分。他们指出国货运动是长期进行与以振兴国家为目的的活动，并非短期与为了抵制某国商品而发动的活动。<sup>172</sup>

这次报纸上的言论与报导之中指出了新马华人的中国国货运动三个问题：中国国货在新马地区的市场问题、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持续发展的的问题、以及新马华人分辨国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指出当时新马一带的华人很多，可说是为中国国货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市场。但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虽然新马华人消费许多来自

---

<sup>168</sup> 同上注。

<sup>169</sup> 《南洋商报》，1928年5月23日，第五与第十六页；《叻报》，1928年5月14日，第二页；5月16日，第二页。

<sup>170</sup> 松生，〈怎样提倡国货〉，《南洋商报》，1928年5月16日；王康恩，〈和平爱国〉，《南洋商报》，1928年6月5日。

<sup>171</sup> 子明，〈抵制与提倡〉，《南洋商报》，1928年6月29日。

<sup>172</sup> 松生，〈提倡国货之正确观念〉，《南洋商报》，1928年11月28日。

中国的食品与轻工业制品，但是按照人均消费而言却偏低，新马的贸易额始终偏低。导致如此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商品大多并不切合新马华人的需要、中国因为工商业方面的落后而导致中国商品在价格与质量上始终无法与其它外国商品相比、又或者中国国货商提高国货价格，因此导致了销售情况不好。<sup>173</sup>

第二个问题是国货运动持续发展的的问题。当时有人指出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19 年因应山东问题而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虽然那一次的国货运动非常成功，但是在 1919 年到 1928 年之间国货运动却没有多大进展，因此人们开始讨论如何避免提倡国货的热忱快速消退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认为只有不断向新马华人介绍中国商品，并且把它们引入到新马地区来贩卖，国货运动才能够不断持续发展，达到振兴中国与抵制日货的目标。<sup>174</sup>

当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许多新马华人不知道何为国货，因此无法从众多商品之中分辨出那些商品是国货。在这段时期之中，报纸上常可看见一些公司宣称自己的商品并非日货或者宣称自己是国货，以避免成为被抵制的目标。<sup>175</sup>这显示了当时中国本土与新马地区之间对于国货的消息传递非常慢。即使当时在《叻报》上有出现〈国货指南〉这类型专门介绍国货的专栏，但是人们在面对众多商品之时，常常会发生把国货当成是日货或他国商品，又或者把日货等当成是中国国货。也有人误认为一些中国商品掺有日本原料，因此必须抵制。这些都造成了不少麻烦，无形中增加了成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部分人士认为可以举办国货商品展览。通过展示国货，告诉人们那些货品为国货，并且可以到何处购买国货。<sup>176</sup>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货展览也很快地在新马地区中出现了。

从 1928 年 5 月开始，《叻报》上出现开设国货展览的声音，这项提议很快地就在当时落实。从 5 月中旬开始，报纸上就有一些社论的评论者指出开外国货展览

---

<sup>173</sup> 松生，〈因汕头开土货展览会一谈华侨与国货〉，《南洋商报》，1928 年 11 月 24-27 日。

<sup>174</sup> 松生，〈怎样提倡国货〉，《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6 日；《叻报》，1928 年 5 月 24 日，第二十页；6 月 29 日，第十三页。

<sup>175</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6 月 7 日，第六页；6 月 18 日，第二页；6 月 28 日，第六页；《叻报》，1928 年 7 月 2 日，第二十页。

<sup>176</sup> 《叻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二页。剑平，〈创设国货展览会刍议〉，《叻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十六页；睦，〈推销国货最良的法国货商场〉，《叻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十六页。

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国货认识不深，也缺乏获得国货消息的管道，因此有人倡议开办国货展览来推销国货销路。<sup>177</sup>当时又正逢抵制日货运动，因此寻求能够替代在新马销路很好的日货的商品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其中有不少人指出必须以国货来代替日货，这不但能够达到抵制日货的意图，并且也能够振兴中国，达到积极抵制日货与治（国家积弱之）本的意图。<sup>178</sup>纵观清朝结束以来到中国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期间的新马华人史，要求以国货取代日货的声音总是在抵制运动时期出现，<sup>179</sup>因此一批新马华商在此特别时期站出来宣布在新加坡筹办中国国货展览并不显得突然。

当新马华人通过各种方式如火如荼地为济南灾民积极筹款的时候，一部分的新马华商通过开办中国国货展览的方式为灾民筹款。在 5 月 19 日的《叻报》与《南洋商报》上（当时新加坡主要的华文报纸），刊登了〈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一文，宣布了新马华商将会举办一场国货展览，为济南惨案的灾民筹款与为提振国货运动进一份力。<sup>180</sup>此次中国国货展览是新马地区有纪录的第一次中国国货展览，全名为“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sup>181</sup>。在经过一番筹备之后，在 6 月 6 日宣布了展览日期、地点、参与展览的商号和国货的定义。<sup>182</sup>这次的国货展览的举办地点是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于 1928 年 6 月 15 日开幕并于 24 日闭幕。<sup>183</sup>筹办这次的展览商家一共有 26 家，其中大多为本地商人。他们大多是专门办理中国商品的代理商，或者是中国公司在新马地区的分公司的负责人。<sup>184</sup>

从当时的报导与成绩来看，这次的国货展览十分成功，并且许多人都对此展览会表示支持。根据当时的报导，即使第一天的天气不佳，仍然有大约两千人到场

---

<sup>177</sup> 剑平，〈创设国货展览会刍议〉，《叻报》，1928 年 5 月 15 日，第十六页；剑明，〈我也谈谈国货展览会〉，《叻报》，1928 年 5 月 17 日，第十六页；旭，〈华侨与国货〉，《叻报》，1928 年 5 月 17 日，第十六页。

<sup>178</sup> 同上注。

<sup>179</sup> 在 1919 年的抵制日货与国货运动之中，就有了以中国国货取代日本商品的声音，见精兵，〈救国之呼声〉，《叻报》，1919 年 6 月 23 日，第二页。

<sup>180</sup> 〈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9 日，第五页；〈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叻报》，1928 年 5 月 19 日，第二页。

<sup>181</sup> 查阅相关资料后，可确定这是新马地区第一次有纪录在案的中国国货展览会。

<sup>182</sup> 《叻报》，1928 年 6 月 6 日，第六页；6 月 7 日，第六页。

<sup>183</sup> 《叻报》，1928 年 6 月 15 日，第三页。

<sup>184</sup> 〈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19 日，第五页；〈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叻报》，1928 年 5 月 19 日，第二页。

参观，并且也因为参观人数踊跃而把关门时间从晚上八时延迟到十一时。<sup>185</sup>其中第二与第三天为周末，再加上天气良好，参观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展览会的收入也随之大为提升。<sup>186</sup>展览结束之后，总收入达到叻币 7839.70 元<sup>187</sup>。另一方面，当时也有许多商人想要参加这次的展览，但是因为场地有限因而无法参加。<sup>188</sup>由此可见，当时新马华人对这次的国货展览会都十分支持。

国货展览筹赈济南兵灾大会同时也得到了新马华人中的大商家的支持。<sup>189</sup>根据报纸资料显示，《南洋商报》也是这次国货展览的参与者之一。<sup>190</sup>《南洋商报》当时的拥有者则是当时新加坡的大头家——陈嘉庚。此外，当时另外一个大华商林秉祥所拥有的和丰集团之下的和丰肥皂厂也参与了这次的国货展览，并且其出品在这次的国货展览之中是最畅销的货物之一。<sup>191</sup>这些都一再显示，国货展览得到新马地区的商人支持。

有许多人对于这次的国货展览也抱着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展览会告知人们有关国货的消息，教导新马华人如何分辨从众多的商品之中区分出中国商品。当时《叻报》上的报导指出，希望新马华人能够通过这次的国货展览认识国货，<sup>192</sup>并且国货厂商也能够通过国货展览会认识到新马华人需要哪些商品，进而能够为新马华人量身打造出适合新马华人市场的中国国货。<sup>193</sup>此外，也有人希望日后能够继续举办国货展览，不但希望下一次的国货展览具有更大的规模，更多的公司

---

<sup>185</sup> 《南洋商报》，1928年6月16日，第六页；《叻报》，1928年6月16日，第三页。

<sup>186</sup> 《南洋商报》，1928年6月18日，第三页；6月21日，第六页。

<sup>187</sup> 最终国货展览共捐献了叻币 1868.14 元，其中 1567.94 元为收入，其余为会场内的捐款。按照其收入的十分之二捐助给济南惨案的难民的比例来计算，因此展览会总收入为叻币 7839.70 元。见《南洋商报》，1928年7月11日，第三页。

<sup>188</sup> 《叻报》，1928年6月21日，第三页。

<sup>189</sup> 有关这次的国货展览是否得到新马地区的华人大商家的支持，颜清滢对此有另一番见解。见颜清滢，〈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 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收录于颜清滢，《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1992），页 123- 147。

<sup>190</sup> 《南洋商报》，1928年5月19日，第五页。

<sup>191</sup> 颜清滢，〈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 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收录于颜清滢，《海外华人史研究》，页 136。

<sup>192</sup> 柯予平，〈为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告同侨〉，《叻报》，1928年6月19日，第二十页。

<sup>193</sup> 羨吾，〈勸国货展览会提倡诸君〉，《叻报》，1928年5月31日，第二十页。

来参加，也希望把这次展览中的一些商品放入中华总商会会所，作为长期展览之用。<sup>194</sup>

除此之外，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也激发了新马其它地区开办国货展览或国货陈列所。在国货展览结束之后，檳城随即传出开始筹备设立国货陈列所的消息。<sup>195</sup>此外，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相比，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算是中国国民政府参与之下的第一个国货展览会，比当年年底在上海举办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来得更早。

这次筹办国货展览的目的是为了筹赈济南惨案的灾民与推广国货，但是从其举动与主办者名单来看，推广国货来为自己带来利益似乎大于筹赈灾民。根据颜清湟的研究，这次参与国货展览的商号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国货产业的代理商或本地的分行，因此大力推销国货能够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此外，在之前日本商品充斥的市场之中，他们没有机会打开中国商品的销路。在当时抵制日货运动高涨的情况之下，国货展览能够更进一步的帮助他们推销自己的商品。<sup>196</sup>另一方面，国货展览的收入也只是一小部分捐助给灾民，大部分的收入是落入了展览者的口袋。根据〈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草章〉，国货展览的收入为每日展览结束后结算，并且将把十分之二的收入捐助灾民，其余的则归展览者所有。<sup>197</sup>从这两点来看，这次的国货展览的最大受益者为当时的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商人，为济南灾民筹款似乎只是一个宣传方法与附加价值而已。

在这次的国货运动之中，一部分的商人趁机以救国为名，行赚钱与扩大市场之实。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参与国货展览的商人之外，也有其它商人有如此举动，其中上海正兴美术公司在新加坡的分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在《南洋商报》与《叻报》中的广告宣称自己是“筹款救国，提倡国货”，不但答应把自己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捐助给济南惨案中的灾民，而且也指出上海比日本更加靠近新加坡，以及工资比日本低廉。因此，交由正兴美术公司承办印刷服务不但可以省下更多的成本，而

---

<sup>194</sup> 童子达，〈所希望于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诸君〉，《叻报》，1928年6月28日，第十四页。

<sup>195</sup> 《叻报》，1928年6月28日，第八页；6月29日，第八页。

<sup>196</sup> 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1928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收录于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页134-135。

<sup>197</sup> 〈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通告〉，《南洋商报》，1928年5月28日，第八页；〈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草章〉，《叻报》，1928年5月25日，第六页。

且也可以达到抵制日货以及显示自己的爱国之心。<sup>198</sup>这在无形中不但把印刷事务交由正兴美术公司处理的事情视为是商界之中的交易，同时也把爱国、反日、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事物与商业事物挂钩。

另一个例子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南洋兄弟即刻捐出一批货物，此批货物售出所得将全部捐献给济南惨案的灾民。在其声明之中，鼓励华侨之中“有热心振兴国货与热心助赈者”应该踊跃购买与吸食香烟，“毋负该公司以国货助捐之热枕”。<sup>199</sup>虽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所得都捐助给灾民，但是无形之中它推广自己的香烟，通过鼓励人们购买与吸食来吸引新的消费群，扩大自己原有的市场。

从整体来看，1928年的国货运动的规模比1919年的规模来得大，这点从参与的群体即可得知。1919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并没有对新马华人社群之中积极提倡国货的声音进行声援，也没有表态表示支持新马华人提倡国货的举动。但是在1928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上，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不但主持开幕，而且在开幕典礼上也向中国国旗与前总理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以及宣读总理遗训。<sup>200</sup>1919年与1928年之间有如此大的转变，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完成北伐并统一了中国，因此让中国中央政府有余暇把注意力从内政问题扩大到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社群。再加上中国国民政府自上台以来对于国货运动非常重视，因此这促成了中国国民政府在1928年有能力与时间参与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此外，这次的展览会之中除了来自中国的商号之外，也有不少商人是新马本地的商人。例如销售成绩最为突出的和丰肥皂公司的所有人即是当时新马著名华商林秉祥。<sup>201</sup>同1919年的中国国货运动相比，这显示了这次的国货运动不但不再只是限于报纸上的谈论，而且也显示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马华商与中国商人已经卷入了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

---

<sup>198</sup> 《南洋商报》，1928年5月19日，第五页；《叻报》，1928年5月14日，第二页。

<sup>199</sup> 《南洋商报》，1928年5月22日，第三页；《叻报》，1928年5月22日，第六页。

<sup>200</sup> 《南洋商报》，1928年6月15日，第三页。

<sup>201</sup> 颜清煌，〈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1928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收录于颜清煌，《海外华人史研究》，页134-135；《叻报》，1928年5月9日。

另一方面，这次的国货运动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国货展览济案筹賑会的成功，不但使得国货展览成为国货运动的主要宣传方式，也让人们对于开办国货展览有了一定的信心，呼吁日后应该在新马地区多开办中国国货展览。这为日后三十年代的三次大型国货展览奠定了基础。此外，这一次的国货运动结束之后，中国国货运动在新马地区的动力并没有减退。这点可从 1928 年之后《叻报》上的广告，以及中马与日马贸易额之间的比较之中得知。在 1928 年之后的《叻报》上，日本的广告几乎绝迹，可说达到了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所提出的以提倡国货来抵制日货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当时的贸易额可以得知，1928 年到 1931 年之间，中马贸易额始终大于日马贸易额。以 1929 年为例，中马贸易额达到 41,509,000 元叻币，日马贸易额则为 23,190,000 元叻币，两者差距近乎一倍。<sup>202</sup>因此，1928 年的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不但达到了提倡国货来抵制日货的目的，并且这股力量也持续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虽然这次的国货运动十分成功，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一些问题。由于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人们发动反日示威与抗议活动，因此无法公然宣称国货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制日货。就如同在 1919 年的抵日日货时期的手段一样，当时报纸上大多数时候提到日货的时候都含糊其辞，或者以“劣货”一词或直接以空格来代替。<sup>203</sup>此外，当时仍旧有一些商家需要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宣称自己是国货者，都指出新马地区对国货运动的讯息的掌握并不全，有些时候对于何者为国货会摸不着头绪。<sup>204</sup>

1928 年对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因为济南惨案的关系，新马华人不但组织起有效的反日运动，并且中国国货运动也在这过程中在新马华人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因应济南惨案而发起的中国国货运动具有强大且持久的影响力，并为日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奠定了基础。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中可以看出，1928 年因应济南惨案而发动的国货运动的影子与模式仍然继续存在着，并且从它所提供的基础之上继续发展。

---

<sup>202</sup>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页 446-450；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页 178-179。

<sup>203</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5 月 30 日，第六页；6 月 5 日，第四页；7 月 31 日，第十一页。

<sup>204</sup> 《南洋商报》，1928 年 6 月 18 日，第二页；8 月 1 日，第十五页。

### 第三节 国货运动成熟期（1929-1941）

经历了 1919 年到 1928 年这段时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已经步入成熟的阶段。国货运动的目标、参与群众与动员方式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形式。在讨论这段时期的国货运动的时候，将会以在新加坡大世界举办的三次国货展览为主轴，并且辅以其它重要活动来揭示这段时期的国货运动的发展情形。

1928 年之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对于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段期间内，日本对华侵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国商家开发南洋市场对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影响最为深刻。自二十世纪起，日本始终对中国有很大的野心。自民国成立（1912 年）以来，日本屡次进犯中国以获取土地或者实际上的利益。1915 年的二十一条、1919 年的山东问题、1925 年的五卅惨案、1928 年的济南惨案、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和 1935 到 1936 年之间的华北问题，都引发了抗日风潮。即使政府表面上禁止任何的抵制日本的活动，但是仍然无法停止民间的反日情绪的滋长。这样的情形不只限于中国本土，并且也在海外华人地区发生。山东问题、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变在新马华人社群之中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如前所述，在 1919 年、1928 年和 1931 年新马华人社群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日浪潮，到了 1931 年之后，抗日与抵日成为当时新马地区上一股长期存在的风气。<sup>205</sup>

1928 年之后，中国进入了所谓的黄金十年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国内政治处于相对平静的时期，中国的工商业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在工业方面，虽然没有非常显著的突破性发展，但是民生轻工业在这段时间内却有不错的成绩。在这段时间内成立的工业团体，如上海机制联合会，正好印证了这段时期中国民生工业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在通讯与交通上也有显著的进步，海陆空航线长度都有所增长，通讯网方面也有所扩张，这都有助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此外，中国国民政府通过谈判也重新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并且国家也开始掌握

---

<sup>205</sup>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页 189-201。

了国家货币，打破了以往由民间决定国家通行的货币的局面。<sup>206</sup>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了东北这块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供应地与市场，中国工商业仍然有所进步。在中国国内市场逐渐饱和之后，中国商家开始把目光转向南洋等海外华人聚居地，在这些地方拓展中国商品的市场。

1928年之后另一个对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有影响力的事情是中国商家开始积极开发南洋市场。在三十年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商家们的眼光仍然主要局限在中国本土市场。虽然有好些中国商家在南洋地区已经设立了分行或者有代理商代为销售，但是对于南洋市场的注意力始终不及中国。从二十年代末开始，中国商家开始转变，积极开发南洋市场。其中1930年呼吁中国商人关注南洋市场的声音出现，以及上海机联会派遣代表团到南洋来考察市场，正代表了中国商人的转变。<sup>207</sup>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也开始积极往南洋发展，这也刺激了中国积极往南发展以节制对手的发展。

在以上三件事情——日本对华侵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以及中国商家开发南洋市场——交叉影响之下，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有了不同以往的发展。这些发展可以从当时报纸上的广告获知一二。与1919年到1928年这段期间相比较，1928年到1932年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举办之间，中国国货广告在报纸上更加常常见到。除了原有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永安堂等大公司之外，也有其它刚登陆的中法大药房、张裕葡萄酒等国货商号出现在新马地区，并且一部份的商品广告也开始以国货作为宣传标语。

此外，这段期间内与中国国货相关的新闻报导也增加了许多。例如中国国货的南洋考察团南来新加坡的时候，《星洲日报》就花了不少的篇幅来报到这则新闻。在南洋考察团到来之前就已有刊登考察团的行程和中国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南洋地区的训示，并且在考察团滞留新加坡期间，《星洲日报》对于考察团的大小动向都有详细报导。<sup>208</sup>《星洲日报》对于考察团的报导非常仔细，正显示了他们对此事的重视。

---

<sup>206</sup> 徐中约著，计秋枫与郑会欣译，《中国近代史》（下册），页567-570。

<sup>207</sup> 《星洲日报》，1930年6月18日，第八版；11月18日，第六版。

<sup>208</sup> 见《星洲日报》在1930年11月到12月之间的新闻。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新马地区第一场中国国货展览于 1932 年举办。这场国货展览不但是因应大世界游艺场成立一周年纪念而举办，也很有可能受到了当时的九一八事变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场国货展览全名为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其目的是希望藉由大世界周年纪念办国货展览以促进国货运动。<sup>209</sup>大世界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并非偶然，大世界游艺场自开办以来就有在其场内设立国货介绍所，展览国货。<sup>210</sup>此外，大世界游艺场经理林建邦的个人因素很有可能也有所影响。林建邦是一位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并且也因为曾经任职于陈嘉庚公司与华侨银行，因此与新加坡华商之间有一定的关系。<sup>211</sup>因此，在大世界游艺场的长期展览与经理林建邦的影响之下，大世界于周年纪念时举办国货展览来推动有利中国的国货运动并从中促进商业发展，并非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1931 年在中国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导致了海内外华人小区的爱国情绪高涨，新马地区也不例外。<sup>212</sup>除了抵制日货运动再度发生之外，呼吁购买国货以帮助中国强大也出现，并且中国商家们也趁此良机纷纷推出相对的商品，使得国货运动再度被炒热。<sup>213</sup>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举办一场国货展览不但有利于增加大世界游艺场的参观人数，而且也有利于中国商家与促进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利益。此外，大世界游艺场在国货展览之前也因为九一八事变而举办了筹赈会，为灾民筹款，<sup>214</sup>这无形中为后来的国货展览炒热了场子，而且商人们也可能从中发现这种类型的商品展览与销售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市场。

此外，当时全球正经历世界经济大恐慌，只有部分国家能够幸免于难。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试图摆脱经济不景气的现象，因此提倡国货，并鼓励国民购买本国

---

<sup>209</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19 日，第七页。

<sup>210</sup> 《星洲日报》，1931 年 5 月 25 日，第八版。

<sup>211</sup> 林建邦，福建思明人。童年在菲律宾渡过，十七岁返回中国于南京暨南学校受教育，毕业后回返菲律宾接受大学教育并于毕业后担任教师。二十四岁南来新加坡，曾于陈嘉庚公司分行、华侨银行与群进公司（此公司为十六家树胶华商所合资创办的树胶公司）就职，群进公司倒闭后转任大世界经理，对于国货展览会出力甚多。曾经担任复建会馆与青年励志社等社团的会员与董事，并且对于妇女与教育等公共事业非常热心，曾多次为此而撰文。南洋文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五，页 86-87。

<sup>212</sup> 从当时新马地区的中文报纸来看，当时的报纸在报导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时，文字皆具有强烈的偏向中国的立场，并且也认同中国为自己的国家。

<sup>213</sup> 从 1931 年到 1932 年之间报纸上的广告来看，当时许多中国商品都标上了爱国口号，其中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张裕葡萄酒的广告为最，其中文字多把爱国与消费其商品挂钩。

<sup>214</sup> 《星洲日报》，1932 年 4 月 18 日，第六版；4 月 19 日，第七版；4 月 22 日，第七版。

商品成为众多方法中的一种。例如就曾经在新加坡的新世界游艺场举办了英国国货展览，要求新加坡的英国籍人士购买英国商品。<sup>215</sup>在这样的情境中，购买国货成为了当时流行的口号之一，政府与一般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善本国经济不景气的局面。在如此的世界局势之下，中国国货运动也不免受到影响。当时许多中国国货运动的支持者都以他国也积极推动国货运动为理由，来加强中国国货运动的正当性。再加上中国的经济实力始终不及他国，并且强调国家强盛的基础在于经济的想法日渐深入人心，因此被人们视为能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中国国货运动也日渐重要。

从 1932 年的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之中可以看出，新马地区华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宣传手法有所提升。在国货展览开幕之前，就派人在大街小巷张贴国货运动的广告，并且也在“日间雇用大罗厘车一辆，满布美术广告，及五色电灯，于黄昏之际，游行驰聘于大小坡各市区之间”，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sup>216</sup>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刊登国货展览的的广告的宣传手法也再次出现。同之前一样，有国货展览的广告出现在报纸上。但这次不同的是，参与国货展览的一些厂商也自行刊登广告，并且告诉读者他们的摊位与相关的促销活动等信息。<sup>217</sup>另一方面，这次的广告之中有一则是以当时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陈长乐的名义发出，<sup>218</sup>与 1928 年的国货展览相比较，这显示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国民政府更进一步参与了海外的中国国货运动。

另一方面，从这次的国货展览中也可以发现参与群体也有所扩大。除了上一段提到了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进一步参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外，也可以发现更多的商人和一般群众也参与了国货运动。同上次相比较，这次的国货展览吸引了更多的商家参与，根据当时的新闻报导，这次的参与商家多达八十余家。<sup>219</sup>除此之外，也可以发现这次有更多的新马著名华商如陈嘉庚与胡文虎也加入国货展览

---

<sup>215</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18 日，第六页；5 月 19 日，第六页。

<sup>216</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6 月 2 日，第六页。

<sup>217</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6 月 6 日，第三与第七页；6 月 8 日，第十八页；6 月 13 日，第四、第七与第十八页；《星洲日报》，1932 年 6 月 1 日，第三、第六与第七版；6 月 5 日，第十二版。

<sup>218</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25 日，第六页。

<sup>219</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6 月 2 日，第六与第八页。

的行列，显示了这次的展览得到新马商人们更密切的观注。<sup>220</sup>此外，这次的国货展览也吸引了许多群众的参观，有报导指出某日参观人数甚至多达一万人。<sup>221</sup>也因此，这刺激了国货展览决定延长展览期限以吸引更多人的参观。<sup>222</sup>人数之所以达到如此空前之多，与展览的一些条例与规定有关。为了吸引群众参观，不但为参观者提供了交通服务，以吸引更多参观，<sup>223</sup>并且也有鉴于家庭中最具有购买力者为女性，因此让女性能够免费参观国货展览。<sup>224</sup>此外，也在特定时间内允许学生免费入场。<sup>225</sup>这些政策无形中增加了参观人数，也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国货，进而支持国货运动。

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在当时的文章中被认为受到了中国本土的国货展览的影响，<sup>226</sup>但是实际上这次的国货展览同时在很多方面也承接了 1928 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首先在展览时间方面，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延续了 1928 年的国货展览。中国本土的国货展览的主要活动时间是从白天到晚上，并没有特别把活动集中在晚上<sup>227</sup>。但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展览则是在集中在晚上，例如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时间主要是从傍晚六点到午夜十二点。<sup>228</sup>

另一个可以看出延续之前的国货展览的部份是参与此次国货展览的商人。同 1928 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类似，这次参与的厂商主要是来自新马本地的商人，而且新马本地的色彩更加浓厚。根据《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特刊》中所收录的五十四家厂商之中，其中 27 家是新马本地的制造业或者针对中国国货进行加工的行业，另有 20 家为本地的国货代理商，纯粹是中国本土商家的分行只

---

<sup>220</sup> 〈介绍国货商及其货品之略历〉，收录于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1932）。

<sup>221</sup> 《星洲日报》，1932 年 6 月 12 日，第七版。

<sup>222</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6 月 13 日，第七页。

<sup>223</sup> 《星洲日报》，1932 年 6 月 1 日，第四版。

<sup>224</sup> 《星洲日报》，1932 年 6 月 5 日，第七版。

<sup>225</sup> 《星洲日报》，1932 年 6 月 1 日，第四版。

<sup>226</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25 日，第六页。

<sup>227</sup> 潘公展，《中华国货展览会 湖洲日特刊》（湖社出版部，民国 17 年），页 1-3。

<sup>228</sup> 《南洋商报》，1932 年 5 月 27 日。

占了五家，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sup>229</sup>这两点都分别指出了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形式上有别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

在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结束之后，大世界继续兴办国货夜市。由于这次的国货展览反应良好，因此使得大世界的管理者愿意把原有的临时建筑拆掉后，并改以永久性建筑代替，继续兴办国货夜市以方便商人与消费者能够在晚间售卖与购买中国商品。这获得不少商家的支持，更有些原本没有参与这次的国货展览的商人也加入国货夜市的行列。<sup>230</sup>国货夜市这种作法不曾见于中国国货运动之中，也为新马地区所特有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进行方式。

此外，在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之后，槟城与怡保都分别传出了开办国货展览的消息。其中槟城的国货展览的地点也是在游艺场，并且也是因应游艺场开幕而开办。另一方面，怡保的国货展览也是在游艺场举办。<sup>231</sup>这都与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的相似之处甚多，并且也恰巧是在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结束之后不久，因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大世界国货展览的影响。

在 1935 年和 1936 年，在大世界中分别举行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与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在这两次的国货展览之中，可以看出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目标上更为清晰。以往在新马地区谈及国货运动的时候，大多数把焦点放在强调购买国货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中国富强，但是却没有提及应该实现这目的的具体方式。在 1935 和 1936 年举办国货展览的时候，除了强调购买国货的重要性之外，也进一步讨论要如何塑造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以提高国货的销售额。其目标有二：第一是要求中国国民政府给予国货厂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例如降低关税；第二是要求中国厂商与南洋商人合作以开辟南洋市场。林庆年在两届的国货展览会上的开幕词，恰好证明了这种转变。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展览会上，林庆年在开幕词中除了像往常提到提倡国货能够使得中国富强之外，同时也在讲词之中指出，新加坡国货展览的目的是在于促进中国厂商与南洋推销商之间通力合作，以开辟南洋华人的广大市场。此外，也要求中国国民政府能够进一步降低或

---

<sup>229</sup> 〈介绍国货商及其货品之略历〉，收录于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

<sup>230</sup> 《星洲日报》，1932年6月27日，第六版。

<sup>231</sup> 《星洲日报》，1932年6月19日，第七版。

者取消对国货征课的出口税，并且要求政府在运输与资金上给予中国国货厂商协助。<sup>232</sup>在第二届国货展览大会时，林庆年虽然没有再度强调中国国民政府必须给予国货厂商一些帮助，但是却再度提到第一届国货展览中的说词：

国货要推销于南洋，须国内的厂家和南洋的华侨，通力合作，才有希望，在厂家方面，要晓得南洋的气候，住民的习尚，社会的需要，外货与国货，式样与货料等方面，须综合研究，夫然候可以造出适合南洋畅销的货物…<sup>233</sup>

这正好显示了当时呼吁中国厂商应该要与南洋推销商合作以开辟南洋华人市场的要求依旧存在，并希望藉此提高国货的销售额。

此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所主办的两届国货展览之中，都暗藏了反抗日本的目的。尤其是第二届的国货展览，此意图更加明显。当时中日关系日益紧张，两国之间自清末起就一直交恶，并且日本在 1931 年的九一八事件中占领东北之后，便开始把触角伸入华北，使得两国之间的冲突日益白热化。<sup>234</sup>从当时报纸上与国货相关的报导中可以发现，中国商品在南洋市场上最大的竞争者是日本，并且把日本当成是假想敌。<sup>235</sup>当时日货在南洋的销路非常好，并且日本商人也积极开辟南洋市场。这不但影响了中国商品的销路，也使得许多本地的华人厂商的商品销路受到了影响。<sup>236</sup>因此，以推广国货来对抗日本商品的倾销成为当时国货商人们的主要应变方法。<sup>237</sup>这不但符合当时要求爱国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商人们自己在商业上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次的国货展览不但吸引了更多不同的群体参与，并且原先参加的组织也更加积极参与国货运动。首先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参与程度更加深入。在 1932 年的大世界国货展览会之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并非主办单位。即使是在

---

<sup>232</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展览推销大会文书股，1935），戊四-七。

<sup>233</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6），F 三-四。

<sup>234</sup>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741-752 页。

<sup>235</sup>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页 446-450；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页 178-179。《南洋商报》，1935 年 10 月 6 日，第四版，1936 年 9 月 22 日，第五与第十二版；10 月 15 日，第七版。

<sup>236</sup> Zheng Liren,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 pp. 340-347.

<sup>237</sup> 克曼，〈国难中提倡国货的我见〉，《南洋商报国展特刊》，《南洋商报》，1936 年 10 月 2 日。

1928年的国货展览筹赈会之中，中华总商会也只是借出场地。因此，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之前的两次国货展览之中只是扮演了协办的角色。但是在1935年和1936年的两次国货展览会之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摇身一变成为主办单位，并且这两次的国货展览的筹委会名单之中，有许多人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的会员或者理事，例如筹委会中的正副主席林文田和林庆年都分别是当时中华总商会的正副会长，这都显示了中华总商会与这两次的国货展览关系匪浅。<sup>238</sup>在这个过程之中，可以发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对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是越来越积极的。集合了新加坡重要华裔的中华总商会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不但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是中国华侨并且认为自己应该为国家尽一份力，也因为他们也可以从国货运动之中获得一些商业上的利益。林庆年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林庆年除了担任此二届国货展览会主席之外，同时也是此两次国货展览的参展商号林金泰茶庄的拥有人。根据其生平事迹，他不但热心参与新加坡华人社会活动之外，也在许多救济中国的活动上出钱出力，这都一再显示他是一位关心中国事务的爱国华侨。<sup>239</sup>另一方面，他同时也参与了此二次的国货展览，通过这两次的国货展览以获得更多人的注意力并拓展林金泰的商品销路。

第二是这次的国货展览的参与厂商的数量增加了。在前几次的国货展览之中，参展的商号大多是新马本地的华人厂商。例如在1932年的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中，有一半的参展商号是来自本地的商号，并且百分之三十七的参展商是本地的代理商。<sup>240</sup>但是从1935年和1936年的国货展览中的参展商人的来源地来看，可以发现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逐渐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厂商加入，并且把这个比例扭转过来。在1935年，参与国货展览的商人主要来自本地（英属马来

---

<sup>238</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己五-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G四-五。

<sup>239</sup> 林庆年（1893-1968），福建省安溪人。早年就读于福州省工学院，后到北京大学就读。1924年南来英属马来亚，于父亲所开设的林金泰茶庄中任职并且扩大了茶庄业务。后于茶庄中增设民信汇款部，办理侨汇业务。此外，也曾同友人创设《南洋商报》，以及担任华商银行董事与促成和丰、华商和华侨银行合并成华侨银行。曾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安溪会馆、茶商公会、华侨中学、南洋女中等社会与商业团体担任要职。同时也热心于中国事务，曾于1936年代表马来亚华侨出席国民政府的国民大会，并且也是新加坡筹赈会等团体的活跃人物。见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五，页166-167；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123。

<sup>240</sup> 〈介绍国货商及其货品之略历〉，收录于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

亚)、香港和上海,其中有多达六成是来自香港和上海的商号。<sup>241</sup>在 1936 年第二届国货展览之中,参与的厂商除了上述三个地区之外,广州、厦门、汕头和天津的厂商也加入,并且高达百分之八十一的厂商是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sup>242</sup>这两次的国货展览能够都吸引许多中国厂商参展,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了东北这块重要的工业原料产地、重工业中心与市场。<sup>243</sup>这导致了中国必须从其它地方来弥补这项缺失,以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与制造业等方面的表现不会随之滑落。因此,积极开发海外华人市场成为当时的解决办法之一,而参与南洋的国货展览是达成此一目标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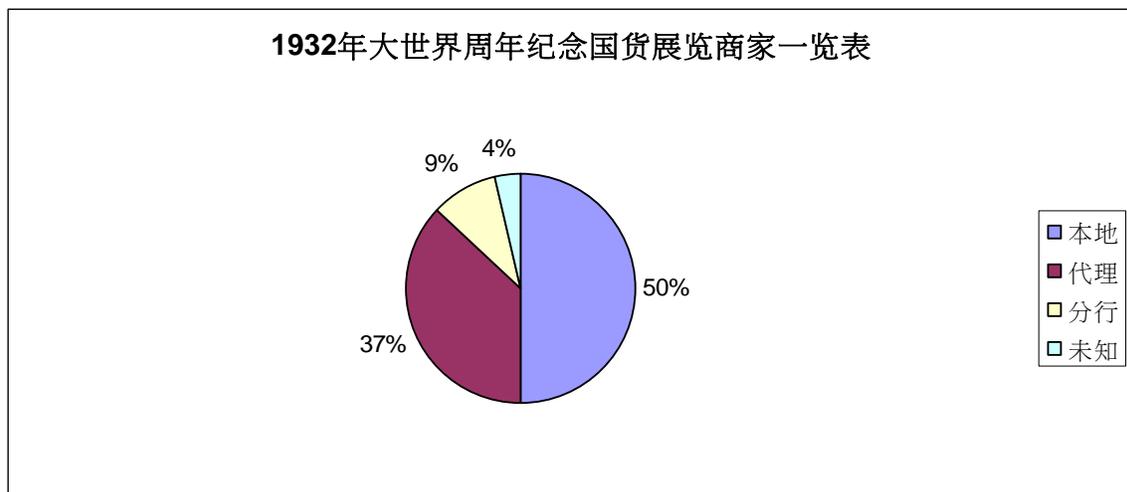


图 1：1932 年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商家一览表（来源：〈介绍国货商及其货品之略历〉，《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1932））

<sup>241</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辛一-卅七。

<sup>242</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H 一-十四。

<sup>243</sup> 徐中约著，计秋枫与郑会欣译，《中国近代史》（下册），569-57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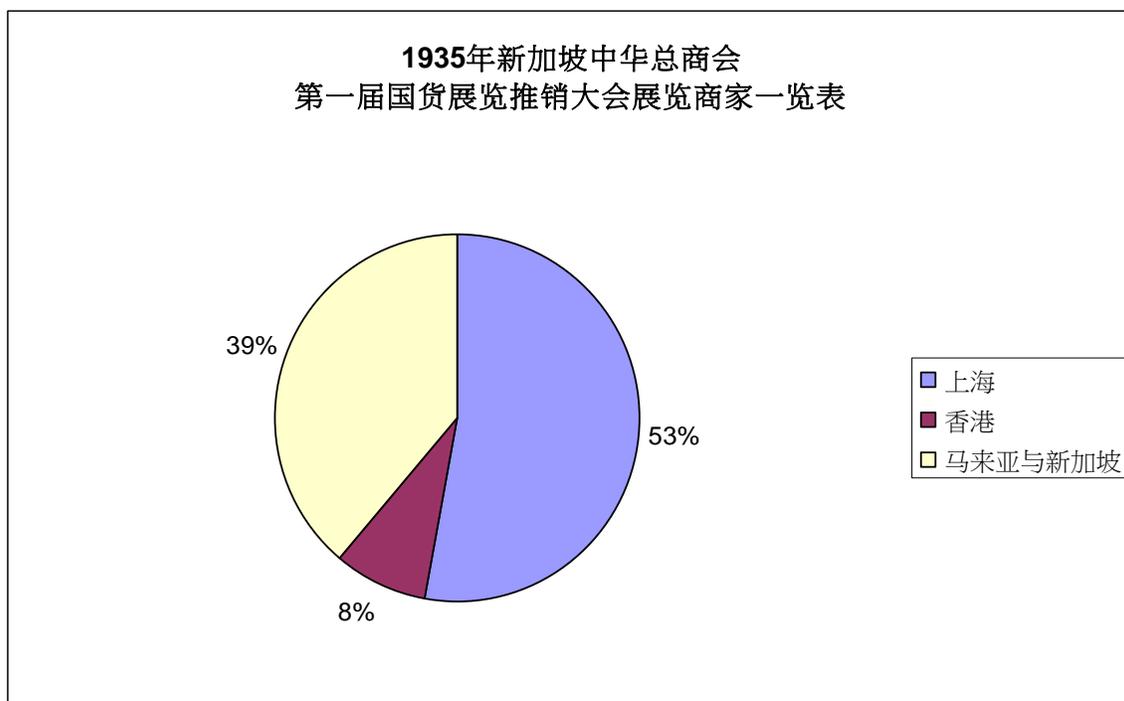


图 2：1935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展览商家一览表（来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展览推销大会文书股，1935）》，辛一— 卅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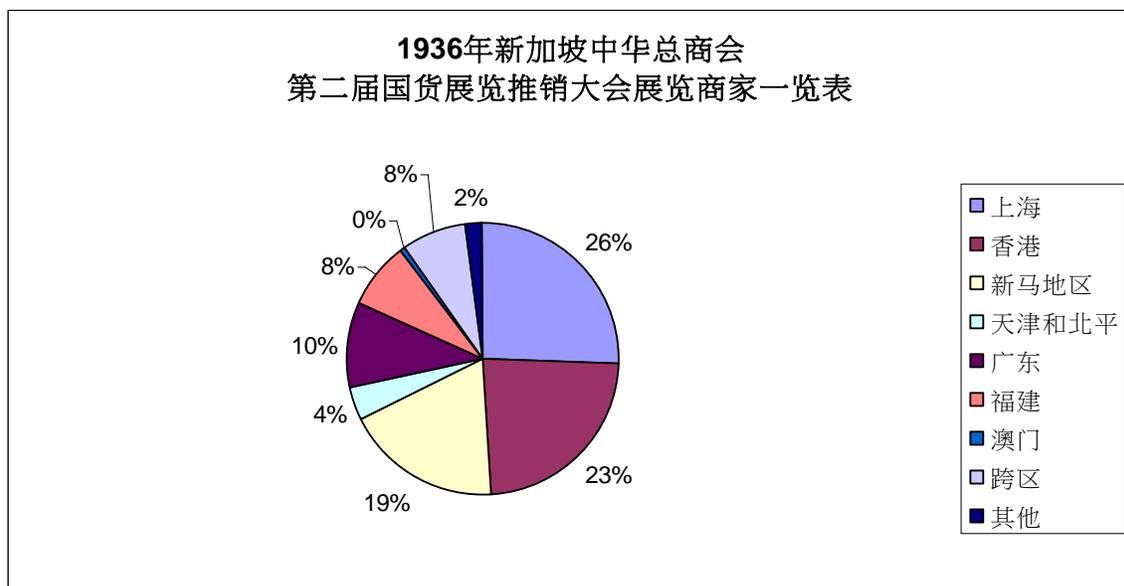


图 3：1936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展览商家一览表（来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6），H 一— 十四）

第三是这次的国货运动不但在新马本地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也影响了南洋其它华人聚居地。当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宣布举办第一届国货展览会时，就吸引了其它南洋华人聚居地领袖的注意。当时马来亚的文德甲和霹雳的商会得知此消息时，都宣布将派代表参观，<sup>244</sup>甚至马六甲中华总商会特别组团前来新加坡参观国货展览会。<sup>245</sup>此外，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日的雅加达）和越南商会也邀请参与第一届国货展览的厂商在展览结束之后，前往巴达维亚和越南举行国货展览。<sup>246</sup>

此外，这次大众也热烈参与了这两次的国货展览。根据当时的报导，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的总参观人数在展览的十三天内达到二十万人次，并且销售额也多达二十万元叻币。<sup>247</sup>但是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相比较，第二届在平均参观人数和平均销售额方面显得较为逊色。第一届共总参观人数不但超过二十万人次，并且展览天数只有十二天。<sup>248</sup>因此，第一届的平均每次参观人数比第二届来得多一些。此外，虽然第一届销售额只有十万元叻币，但是按照每单位货物的售价来计算，第一届的获利比第二届来得大。<sup>249</sup>之所以有如此现象，可能与南洋考察团<sup>250</sup>在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举办前的一个月曾到新加坡举办一个国货展览有关。<sup>251</sup>由于这两次的国货展览之间的时间差距不到一个月，让新马华人产生了弹性疲乏，无法连续支持两次的国货展览。

另一方面，女性与学生也是这两次国货展览的主要招揽对象，这两者在参观者之中占了多数。在两届国货展览会之中，都在延长展览期间给予女性免费参观的优惠，<sup>252</sup>甚至在第二届国货展览会上，多达四分之三的参观群众为女性。<sup>253</sup>有关学

---

<sup>244</sup> 《南洋商报》，1935年9月18日，第三版；9月24日，第五版。

<sup>245</sup> 《南洋商报》，1935年10月9日，第九版。

<sup>246</sup> 《南洋商报》，1935年9月24日，第五版；10月2日，第五版。

<sup>247</sup> 《南洋商报》，1936年10月15日，第六版。

<sup>248</sup> 《南洋商报》，1935年10月17日，第五版。

<sup>249</sup> 《南洋商报》，1935年10月17日，第五版；1936年10月15日，第六版。

<sup>250</sup> 后文将对南洋考察团进行叙述，见页64。

<sup>251</sup> 南洋考察团在1936年9到10月之间来新马进行国货巡回展览。《星洲日报》，1936年9月14日，第六版；9月15日，第七与第九版；9月16日，第六版；9月17日，第五版；9月18日，第六版；9月19日，第六版；9月21日，第六、第七与第十二版；9月22日，第六版；9月23日，第五版；9月24日，第六版；9月25日，第六版；9月26日，第十二版；9月27日，第五版；9月28日，第九版；9月29日，第七版；9月30日，第八版；10月1日，第七版；10月2日，第十二版。

<sup>252</sup> 《南洋商报》，1935年10月14日，第五版；1936年10月13日，第六版。

生方面，可以从第一届的国货展览会的代表团联席会议中，主席黄曼士<sup>254</sup>所宣告的十条主要事项中的第五条看出：

十月六日与与十三日两天为星期日，本大会订为招待学生参观，以作进[一]步之宣传，使一般小学生，知用国货，但开门之时系提前在下午三时以前，开门以招待学生参观，将来之效果，必然更佳。<sup>255</sup>

这不但延续了国货展览案筹賑会所开的先例，并且这也显示了当时的新马华人已经发现必须对学生灌输使用国货的观念，以达到拓展市场与培植爱国思想的目的。甚至在第二届国货展览期间，曾有人建议应该把提倡国货的理念编入教科书中，以此教育学生爱用国货。<sup>256</sup>

这两次的国货展览的宣传与动员方式除了延续之前的国货展览所用的方式之外，在报纸宣传、举办日期与动员方式上有了一些变化。对于这两次的国货展览，当时的报纸都花了不少的篇幅报导。当时《南洋商报》对此不但用了许多版面来报导，甚至在第二届国货展览期间特别为此开设特辑，专门报导国货展览会的种种消息，从国货展览的盛况到国货展览的参与厂商的详细介绍皆具备。当时另一份主要中文报刊《星洲日报》则相对较少，但是仍然有许多与国货相关的报导出现。另一方面，英文报纸上也出现了国货展览的相关报导。当时的《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上在中国国货展览期间出现了国货展览的广告，并且在国货展览开幕之前有报导哪些厂商参与国货展览的新闻。<sup>257</sup>

另一方面，第一届与第二届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的动员方法有所变化。第一届国货展览中，曾经把国货门票交由马来亚铁道局代为售卖，这无形中可以吸引更多的马来半岛上的华人来新加坡参观昂时的国货展览会。<sup>258</sup>在第二届国货展览之中，国货展览筹委会不但有提供载送服务，把欲前往参观的

---

<sup>253</sup> 《南洋商报》，1936年10月15日，第六版。

<sup>254</sup> 黄曼士（1890-1963），原名黄琮，福建省福州市人。新加坡著名书画收藏家，其收藏中以中国折扇最有名。曾经任职于厦门石码水警署署长与南洋兄弟烟草新加坡分公司经理，并且热心于各种社会与文化活动。见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页181。

<sup>255</sup> 《南洋商报》，1935年9月29日，第五版。

<sup>256</sup> 巴玲，〈提倡国货应从儿童入手〉，《南洋商报国展特刊》，《南洋商报》，第一版。

<sup>257</sup> *Straits Times*, 4<sup>th</sup> October, 1935, p. 2, 12; 1<sup>st</sup> October, 1936, p. 5, 13.

<sup>258</sup> 《南洋商报》，1935年9月15日，第六版。

群众从集合地点送往会场之外，也聘请乐团当场演奏以为助兴。<sup>259</sup>这些方法无疑都为国货展览带来了一些观众。

在日期的选择之上，也可以见到中华总商会的用心。这两次的国货展览都选择在十月上旬举办，并且都恰逢中华民国国庆节。<sup>260</sup>这样的安排容易让参与的群众把国家和国货联想在一起，并且也因为当时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爱国和救国的呼声也随之增强，使得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加强，并且让人们更容易接受购买和提倡国货以拯救中国于火热之中的想法，同时也身体力行去实践这些建议。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所主办的两次国货展览会虽然盛大，但是其中也暗藏了当时新马华商之中的内斗，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胡文虎和陈嘉庚之间的纷争。陈嘉庚和胡文虎之间一直有冲突，并且两人之间的斗争一直连续不断，甚至也展现于国货展览会之中。以第一届国货展览会为例，当时《星洲日报》对此的报导不但不比《南洋商报》来得多，甚至有些报导暗示着第一届的国货展览会有问题，对人们并不友善。<sup>261</sup>此外，当时的《南洋商报》也有时评认为国货运动的重要性大于运动会，<sup>262</sup>似乎也暗示着当时率领新马代表团到中国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的胡文虎的举动的重要性并不大。

无论如何，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所主办的两次国货展览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这两届国货展览会代表着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发展颠峰。虽然这段时期之内，新马的国货运动大多是延续以往的方式，并无多大创新，但是新马华商和中国本土厂商之间在这个时候的互动最为频密，为中国商品在新马地区的销路打下了基础，并且也为中国商品在 1937 年之后能够在新马地区继续获得支持埋下了伏笔。另一个代表性是刺激了新加坡华商决定扩大自己原有的国货陈列馆。虽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 1926 年就设立了国货陈列馆，<sup>263</sup>但是一直并没有受到重视。<sup>264</sup>由

---

<sup>259</sup> 《南洋商报》，1936年9月30日，第一与第八版。

<sup>260</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的举办日期是从1935年10月5日至16日，第二届则从1936年10月2日至14日。

<sup>261</sup> 《星洲日报》（夜报），1935年10月16日，第四版；《星洲日报》，1935年10月17日，第四版。

<sup>262</sup> 小我，〈体育与国货〉，《南洋商报》，1935年10月13日。

<sup>263</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V一。

<sup>264</sup> 从当时新马的报纸和有关国货运动的刊物之中，对于设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所内的国货陈列馆甚少提及，因此可以判断说此国货陈列所并不为人所熟知。

于受到了这波国货运动的影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决定按照中国国民政府所制定的规格，扩大原有的国货陈列馆以符合中国国民政府的规定。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除了在大世界所举办的三次国货展览会（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之外，南洋考察团前来南洋考察和报纸上的大力宣传都值得注意。南洋考察团是由中国本土的商人所组成的考察队，曾在三十年代好几次组团前来南洋进行商业考察。考察团除了主办小规模国货展览向南洋华侨大众推销自己所生产的商品之外，也希望了解并按照南洋人民所需来改良产品，以符合南洋的需要。<sup>265</sup>其中南来最令人瞩目的一次是在193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之前，这一次除了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所展览之外，也在檳城进行展览，这一次的展览也被视为是檳城第一次举办的国货展览会。<sup>266</sup>

当时报上对于国货运动的报导也越来越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星洲日报》每逢星期日的〈国货专栏〉。从1932年1月3日开始，《星洲日报》出现了〈国货专栏〉，内容除了介绍国货之外，也通过评论告诉新马华人为什么要使用中国国货。<sup>267</sup>有可能因为新马地区的大部分国货厂商与商品的资料很快地被介绍完毕，如果依旧持续每逢星期日刊出〈国货专栏〉，不但显得重复并且浪费资源。因此〈国货专栏〉在2月28日之后就不再在每个星期日出现，演变成偶尔出现在星期日的《星洲日报》上，但是它的出现也宣告了当时中国国货运动已经成为了当时新马地区中常见的事物之一。

---

<sup>265</sup> 南洋考察团来新马一带进行商业考察主要有两次，分别在1930年11月到12月，和1936年9月到10月。见《星洲日报》，1930年11月20日，第六版；11月26日，第八版；12月3日，第十六版；12月13日，第十六版；12月15日，第十六版；12月16日，第十六版；《星洲日报》，1936年9月14日，第六版；9月15日，第七与第九版；9月16日，第六版；9月17日，第五版；9月18日，第六版；9月19日，第六版；9月21日，第六、第七与第十二版；9月22日，第六版；9月23日，第五版；9月24日，第六版；9月25日，第六版；9月26日，第十二版；9月27日，第五版；9月28日，第九版；9月29日，第七版；9月30日，第八版；10月1日，第七版；10月2日，第十二版。

<sup>266</sup> 《星洲日报》，1936年9月21日，第十二版；10月5日，第十二版；10月7日，第十二版；10月9日，第十二版。

<sup>267</sup> 《星洲日报》，1932年1月3日，第十三版；1月10日，第十三版；1月17日，第十三版；1月24日，第十三版；1月31日，第十三版；2月7日，第十三版；2月14日，第十三版；2月21日，第十三版，3月13日，第十三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中日战争爆发。这不但使得新马地区的爱国与抗日情绪高昂，而且也制造了十分有利于中国国货运动在新马壮大的环境。但是，同此时时期早期相比，此时段末期的国货运动在质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有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当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目标上同以往比较并没有新的变化，在参与群众方面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并且在动员和宣传手法上也没有进一步的创新。

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是有三件事情与当时国货运动有所关联。首先是当时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条规之中，注明了提倡国货是他们的成立的目的之一。<sup>268</sup>很显然的，这表示了当时认为救国存亡必须从提倡国货开始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第二是依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当时中国商品在新马的销售额也创新高，并且大大超越了日货在新马地区的销售额。<sup>269</sup>这不但显示了以往国货运动所做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并且也与当时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有关。<sup>27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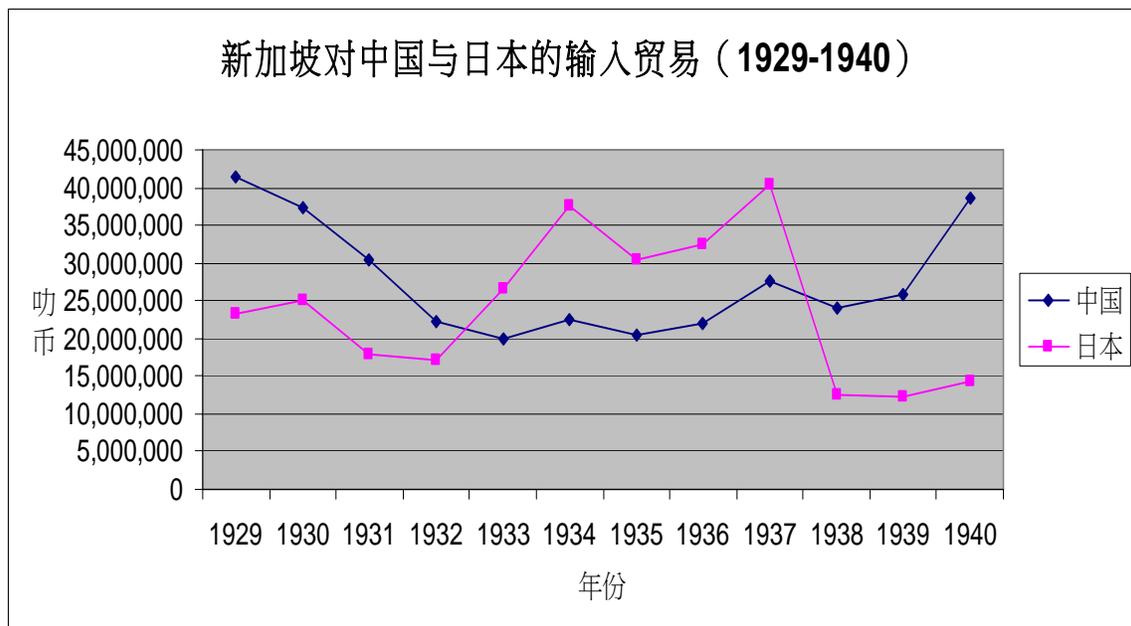


图 4：新加坡对中国与日本的输入贸易 (1929-1940) (来源：《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页 987-988)

<sup>268</sup>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987-988。

<sup>269</sup> 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p. 148, table 11.

<sup>270</sup> 有关当时的抵制日货运动，见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页 198-199。

最后一件事情是当时一些中国厂商直接在本地开设国货商店。例如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不通过与新加坡代理商合作的方式在新加坡开业，而直接在新加坡设立中国国货公司。<sup>271</sup>这是由于中日战争的关系，中国商品的生产不但遭受打击，原有的中国国内市场也因为战争而缩小。有鉴于此，一部分的中国国货商人把市场焦点转移到海外华人人口众多的南洋，希望通过南洋市场的开发来弥补因战争所导致的损失。

#### 第四节 小结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目标到 1937 年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除了希望通过提倡国货来振兴中国经济，以达到中国富强的目标之外，也希望藉由中国商品的畅销来抵制在市场上销路大好的日货，以通过经济打击作为中国对手的日本。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目标进一步清晰化，为了达成目标，人们列出如何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例如改善中国的工商业环境与降低关税等等方法。

在参与民众方面，国货运动的参与人数与群体有增无减。从 1928 年开始，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馆就有了参与国货展览的纪录，这代表着中国国民政府开始参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国国民政府并没有退出国货运动，在屡次的国货展览之中，驻新加坡总领事都是坐上嘉宾。此外，参与的商人也是有增无减。从三次的国货展览之中，可以看见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的厂商参与了国货展览，其中以当时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上海——的公司占大多数。另一方面，许多新马当地的厂商也开始留意到参与国货展览的好处，不少的新马华商参与了历次的国货展览，例如胡文虎的永安堂就不曾缺席过国货展览。最后更重要的是当时新马地区的民众的参与。在 1928 年所举办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中，第一天的人数多达两千人，但是在八年之后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上，每日参观人数平均却多达两万人。此外，其中也有不少马来半岛和南洋其它地区的华人

---

<sup>271</sup> 益丁，〈国货运动与南洋市场——南洋侨胞与国货运动的若干史实〉，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378。

特地从其居住地前往参观。从中可见，新马华人不但热烈支持国货运动，也吸引了不少南洋其它地区的华人的支持。

在宣传与动员方式方面，国货展览与报纸是最重要的宣传与动员工具。在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之中，国货展览不但是观测国货运动成功与否的指标，同时也通过国货展览告诉人们什么是国货并且灌输了提倡国货的重要性。在报纸上，除了可以阅读到国货展览相关的新闻报报导之外，它也直接通过刊登和国货运动相关的报导和广告，以此来宣传国货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货的相关报导与广告所占的版面越来越多，并且不但在当时的中文报纸上出现，也开始在英文报章上出现了国货展览的广告与报导。此外，为了更有效的动员大家参观国货展览，甚至有几次的国货展览为大众提供了交通工具，接送参观者到会场参观；并且也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内妇女和学生可以免付门票参观国货展览，无形中吸引了更多人到场参观。这些宣传与动员方式，都为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增加了不少的支持者。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发起虽然具有新马本地的因素，例如新马华商因商业利益而投入，但始终都深受中国的政治局势以及新马华人具有中国国民身分等因素的影响。例如 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8 年的济南惨案和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都推动了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发展。到了三十年代，更因为日本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强，再加上日货在新马地区的畅销影响了许多新马本地华商与中国商人的商业利益，使得中国国货运动在本地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另一方面，许多新马华人在民国建立之后到中日战争爆发这段时期间，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多数的新马华人认为自己并非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英属马来亚这块土地只有社群认同<sup>272</sup>而没有政治认同，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并且也应该为自己所隶属的国家尽其身为国民之义务。

虽然中国本土和新马地区都有中国国货运动，二者不但有所关联，并且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受到了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影响，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些

---

<sup>272</sup> 社群认同为笔者在本文中特别使用的名词。在这里，社群认同与政治认同具有相对的意义，社群认同指的是个人对于自己所隶属的社群的认同感，例如自认为是中国国民的新马华人认同于新马华人社会中偏向认同中国的社群。政治认同则是指个人的自己立场。

不同之处。有关中国本土的如何影响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将在下一章中说明。

## 第四章 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比较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除了具有共同点之外，也拥有许多相异之处。本章节的目的在于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异同点，同时也指出这些异同点是为何形成并且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本章节将从新马华人和中国分别对于国货的定义、新马地区的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在目标、参与团体、宣传和动员方式与国家/民族认同上的异同点等五方面来展开。

### 第一节 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对于国货的定义

中国对于国货的定义经历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不用“国货”而使用“土货”一词来指代中国生产的商品。使用这个词汇主要是因为这是指中国本土出产的商品之外，也用来区分西方人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洋货）和中国本土以手工制造的商品。后来中国商人也开始模仿西方人使用机器来生产商品，并以“国货”一词来指代其生产的商品，以示与西方生产的“洋货”与本土手工业制造的“土货”有所不同。后来“国货”一词逐渐普及，土货业不但被归类为国货，“土货”与“国货”二词也成为同义词，都指称中国所生产的商品，并且也不分为机器生产或者手工制造。<sup>273</sup>

在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之中，一些国货团体和后来的中国国民政府对何者可以称之为国货进行界定，并且发行刊物——也就是《国货调查录》——告诉国民何者为国货。在各个团体与国民政府为国货下定义的过程中，可看出国货的定义逐渐清晰。最初国货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中国各地的国货团体各行其是，自行界定何者为国货，但基本上只要是在中国生产并且由中国人所掌控的企业所生产的商品皆可称为国货。为了把哪些商品为国货的信息散播出去，许多地方也各自发行《国货调查录》来教育民众，例如天津与江苏地区都各自出版了《国货调查录》。<sup>274</sup>

<sup>273</sup> 潘君祥，〈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1-2。

<sup>274</sup> 从天津与浙江所发行的《国货调查录》之中，可以发现两本调查录所收录的商品有所出入。天津所出版的收录了较多天津地区的产品，浙江则收录了较多的上海商品，这证明了两者在界定何者

但是到了 1928 年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介入国货运动之后，国民政府从资本、管理、原料和劳工四方面来判断是否为国货，并且这种标准也随着统一的政府而通行中国全国各地。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国货最基本的特色是由中国人经营与中国人工作的工厂所制造，至于资本、技术与原料则可以由外国引进，但是能够使用中国自身的原料、技术与资本为佳。并且根据这种思维，把国货划分为七个等级。<sup>275</sup>此外，国民政府也模仿了之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方法，对于查实为国货的商家颁发国货证明书，以证明此中国商品为国货。<sup>276</sup>

但是在海外华人地区，国货的区分方式则有所不同。由于新马华人在新马地区所生产的商品并不符合中国本土对于国货的定义，因此新马华人对于中国国货的定义有些不同于中国本土人士对于中国国货的定义。新马华人认为，不论是在中国本土或者新马制造，只要是华人经营投资的工厂所生产的商品就是中国国货。<sup>277</sup>新马华人可以如此主观的判定，主要是因为 1928 年之前没有一个可供新马华人遵循的国货标准，因此新马华人可以自行判断新马华人所生产的商品是否为国货。即使当时上海总商会与中华国货维持会等组织已经推出了国货证明书，并且在中国地区受到认可，但是这种由某个机构进行国货认证的方式并没有在海外华人地区广泛施行，因此新马两地的华人制造商可以自由承认自己的商品为国货。即使在国民政府所制定的国货标准在 1928 年面世后，也没有指出中国国货一定要在中国本土生产才算中国国货，并且国民政府的这套认证标准也只局限于中国本土，因此新马商人仍然可以自认自己所生产的商品为中国国货，而且也不违反了国民政府所界定的国货标准。<sup>278</sup>

---

为国货的时候受到了地理上的限制，主要以当地生产的商品为主。见周荣生，范尧生，《中华国货调查录》，第一期(浙江：浙江省城中等以上学校劝用国货联合会，民国 9 年)；天津国货调查会，《天津国货调查月刊》，第一期(天津：天津国货调查会，民国 8 年)。

<sup>275</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国货证明书发给规则》，1928/6/6-1937/7/27，档号：001000006876A；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国货证明书发给暨国货购用检验规程》，民国 21 年 3 月 14 日-民国 26 年 7 月 8 日，档号：001000006682A。

<sup>276</sup> 同注 3。

<sup>277</sup> 从当时在新马发行的报纸之中，如《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叻报》等，可以看见许多由本地华商出产的商品都在广告之中声称自己是国货。

<sup>278</sup> 根据国民政府的国籍法，新马华人仍然算是中国国民。因此新马华人所生产的商品依旧可以被视为是国人生产的国货。有关中国国民政府的国籍法，参考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民 86 年)，页 121-140。

新马华人所生产的商品在新马本地虽然被视为国货，但是在其它地方是否被视为中国国货则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1928年的国货展览济案筹赈会后，新马华人所创设的华商烟草公司被上海总商会承认为国货。根据当时的新闻，华商烟草公司的商品被承认为中国国货，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华资的商业组织。<sup>279</sup>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新加坡某酒商向国民政府申请国货证明，并且也有详细证明自身是完全华人资本、华人经营、华人制造与中国原料，但却被中国国民政府拒绝承认为国货。理由是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海外华人商家申请成为国货，因此申请不被考虑。<sup>280</sup>显然，随着办理国货证明的机构不同，新马华商的物品是否被视为中国国货也将不同。因此，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认证新马华商制品是否被算入国货，是否被视为国货只能依靠当时审理国货申请的机构的标准来判定。

从以上的商品国籍的判定问题，可以看出中国民间对于国货的标准相对来的宽松，中国国民政府则较为严格，无法接受国货不在中国本土生产的现象。实际上，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国民政府在制定国货标准时出现的漏洞所产生。这个问题一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段时，国民政府才开始着手处理。国民政府首先在《海外中华国货陈列馆征品规则》之中，允许海外的中华国货陈列馆收集当地华侨商家所出产的商品。<sup>281</sup>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在1940年通过海外华侨工艺品法案。在这个法案之中，虽然海外华商所生产的商品并不列为国货，但是却享有与国货几乎相等的待遇，因此可说无形之中承认了海外华商所生产制造的商品也属于国货。<sup>282</sup>从这个法案之中，可以推测出当时国民政府的用心。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东南亚华侨为中国政府与民众积极筹款，不少的新马华商也参与其中。国民政府通过这项法案变相承认他们所生产的商品为国货，不但再度拉近了中国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并且也对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并且为战争而积极筹款的中国商人们投桃报李。

---

<sup>279</sup> 见《叻报》，1928年6月28日，第二页。

<sup>280</sup>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实业部档案，《上海合利华行请发国货证明新嘉坡桃李园酒厂请发国货证明》，1936年，档号：17-22-114-07。

<sup>281</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国货陈列馆改订暨联合营业章程》，1928/05/29-1938/09/17，典藏号：001110020006。

<sup>282</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外交部档案，《国货厂商筹设国货公司案》，民国27年9月31日-29年12月3日，档号：020000038673A，020000038674A。

此外，也有一些由新马本地华商所投资的企业虽然号称国货，但是却并没有申请成为国货的动作。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它的主要市场并非中国，而是东南亚等其它地区，因此是否被承认为中国国货对他们而言并不非常重要。例如林庆年的林金泰茶庄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是由新马本地华商所投资之外，原料、技术与工人都是华人或者来自中国，但是却没有任何申请成为国货的意图。<sup>283</sup>

简言之，不论是中国本土或新马地区，都认为中国国货必须是由中国人出资的工商业机构所生产的。但是两者不同的是，中国对于国货的界定较为严格，也具有一套标准来判别某商品是否为中国国货。可是反观新马地区，对于是否是中国国货的判定则较为宽松，许多由新马本地华商所生产的商品乃是主观判定为中国国货。虽然有些被承认为国货，但是更多的一部分并不被视为国货。但不论自己生产的商品是否被视为国货，许多新马本地华商并不在乎，因为这对于他们的生意并无影响。

## 第二节 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目标之比较

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起源有所不同。在中国本土，国货运动的最初目标与 1911 年的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成立有关，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中国的纺织业。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最早的目标是因为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所酝酿的反日情绪所导致，当时的人们认为提倡国货是对日货的一种有效的抵制方式。

后来两地的国货运动发生转变，并且其目标逐渐趋于相同。两地的国货运动的参与者认为国货运动的目标挽救中国的经济并且促使中国富强。1911 年，中华国货维持会除了强调要保护中国的纺织业之外，不久后也开始转而提倡国货，认为可以通过国货运动达成振兴中国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经过二十世纪初期连串的抵制外货运动之后，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提出了“消极抵制外货，积极提倡国货”的口号，认为抵制外货运动不能够解决中国经济不振的问题，而必须从提倡国货下手来解决这一难题。1919 年的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经历了类似的过

---

<sup>283</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K 廿九-三十。

程，发现抵制外货并无法打击敌国，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振兴中国经济，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从提倡国货开始。

两地的国货运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时候，达成目标的手段都不再只是单纯地提倡国货。要求民众购买与使用国货以及要求商人必须以售卖国货作为优先考虑的要求虽然依旧存在，但是同时也把目光放到更根本的部份，认为必须从更为基本的问题上振兴国货与中国企业。在中国地区，1927年成立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正代表了这样的转变。在它的创会宣言之中，就呼吁政府必须要改善供商业的经营环境，并且同业之间也必须合作。在新马也有同样的转变。在1935年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一届国货推销展览会中，副主席林庆年在开幕礼上的致词中曾呼吁要改善中国工商业的经营环境。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地的国货运动的目标也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抵制日货的目的。此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军事与外交上的冲突日益激烈，并且也逐渐白热化。这使得居于中国本土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民认为必须抵制日货，以克制日本的野心并且尽身为中国人民的义务。中国本土自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抵制日货运动，并且也对国货运动的发展有所帮助，但是在这段时期，抵制日货运动不但发自民间，并且政府也希望借着抵制日货运动来对抗日本在外交与军事上的角力。此外，日本商品对南洋地区大量倾销，这对新马华商在商业上的利益造成了威胁。这促使新马华商以国货运动作为对抗日本商品对南洋进行倾销的策略。这两个原因都导致了国货运动增加了抵制日货的目的。事情演变成如此，是由于国货运动与抵制外货运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深厚，并且抵制外货运动也算是国货运动的宣传与动员手法中的重要一环，因此这个时候的国货运动因应外界的环境而增加了抵制日货的目标也在意料之内。但是新马地区与中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目标有很明显的对抗日货倾向的意图，这是中国地区的国货运动所没有的。

虽然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手段的变化始终落后于中国本土地区，但是不代表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目标完全受到中国地区的国货运动的影响，而具有一定的主体性。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开始是由于新马华人不满日本对其祖国的欺压，而并非因为当时中国地区的国货运动要求要通过提倡国货来振兴中国，进而在新马地区展开国货运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虽

然也要求国民政府改善工商业的经营环境与倡导以国货运动作为抵制日货的方式，但是其中他们并非完全是呼应中国国货运动的要求，其中有部份是出于自己的目的。改善工商业的经营环境能够帮助在海外地区售卖中国商品的华人商家降低成本，无形中有利于提升他们自身的获利。以国货运动来抵制日本除了可以帮助海外华人尽其身为中国国民的义务之外，新马华商也可以此作为打击作为其商业对手的日本。

从上面的段落中可以知道，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在目标与达成目标的方法上都有相同的变化与发展轨迹。但是由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比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较迟展开，因此两者的差异在于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在目标上的演变与发展显得比中国本土的较为缓慢。可是，这不代表新马地区完全模仿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目标，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目标中也包含了自己的意图。

### 第三节 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在非正式网络上的比较

#### 宣传与动员方式上的比较

如第二章所展示的，中国在国货运动的宣传与动员上可以分为六个部份：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这六个部份对于国货运动的发展与推动都有不少的贡献。但是在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中，国货展览与广告比较重要，抵制外货运动则次之，至于宣传刊物、国货陈列所与国货商场并不是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主要的宣传与动员工具。

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受惠于抵制外货运动，抵制外货运动都推动了两地的中国国货运动的萌芽与发展。中国本土地区常常爆发抵制外货运动，并且抵制外货运动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就如第二章所提及的，抵制外货运动常因为外交或政治事件而引发，许多国货商人趁机开拓市场，也吸引了一些中国人转而支持国货，并且越来越多的人也在抵制运动之中开始意识到必须通过提倡与使用国货来达到富强中国的目的。1937 年之前新马地区也发起抵制外货运动，但是规模并不大，主要的抵制外货运动是在 1937 年的卢沟桥事件之后所发起抵制日货的风潮。抵制外货运动在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促发了

国货运动的萌芽，1937 年之后抵制外货运动也间接推动了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发展，但是那个时候的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基本上已经定调，抵制外货运动主要是间接推动国货销售量的增加。

虽然两个地区的国货运动都受惠于抵制运动，但是命运却不大相同。在中国，政府对于抵制外货运动多采取暧昧态度，对于抵制外货运动并不多加干涉。但是在新马地区，抵制外货运动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限制，因此不可以公然进行。例如在新马地区的报纸上，许多广告并不公然说进行抵制，而是含糊其辞。此外，新马地区在抵制外货运动上的成绩也差强人意。日货虽然是新马华人的主要抵制对象，但是根据当时的调查统计，输入马来亚的日本商品的数量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却大大超过了中国商品，直到 1937 年之后中国商品的输入额才凌驾在日本商品输入额之上。<sup>284</sup>这也并非完全新马华人抵制外货上没有尽力，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商品在质量与价格上都胜中国商品一筹，因此吸引了许多低收入的新马华人转而购买日货。<sup>285</sup>

国货广告除了告诉人们有关国货商品的信息之外，也告诉了人们何时何地有与国货运动相关的活动。虽然两者都分别在中国与新马的中国国货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待遇却有所不同。中国国民政府免除了国货商品的广告税，但是国货广告在新马地区却没有享受到同样的福利。其中的原因很显然的是因为中国国民政府被认为有义务扶持自己本身所生产的商品，但是英国殖民地政府却没有这个义务。

另一种同广告性质类似的是《国货调查录》、《国货运动月刊》等宣传刊物。在中国，这类型的小册子甚多，并且也广为人知；但是在新马地区，这类型的小册子几乎不存在。现今唯一可知曾经在新马地区传播过的《国货调查录》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所在 1931 年所出版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刊》中以附录的形式出现。<sup>286</sup>其它与国货运动相关的刊物并没有在新马地区广为流传。

---

<sup>284</sup>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页 987-988；Yoji Akashi, *The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 pp. 148, table 11.

<sup>285</sup> Zheng Liren,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sup>286</sup>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1）。

虽然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商场在中国本土到处都有设立，但是在新马地区似乎并不流行。虽然有许多新马华人商家从事国货的买卖，但是其中许多商家的经营方式似乎与一般的商家并无多大差别，并没有像中国的国货商场一样，以类似今日的百货公司的展览方式来贩卖商品。例如像第二章所提及的上海蓬莱市场的国货商场的销售形式，就未曾出现在新马地区。但是新马地区曾经出现比较近似于九一八国货商场的短期国货贩卖场所的方式，例如在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之后，大世界内曾出现过短期的国货夜市。

中国国民政府通过法案，规定在中国各地都必须设有国货陈列馆，并且也规定海外地区也需要设立国货展览馆<sup>287</sup>。在当时，檳城和新加坡都有国货陈列馆，但是它们在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并且也并未完全按照中国国民政府的规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中的国货展览馆是一个能够证明国货展览馆在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没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案例。虽然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1926年就已经设立了国货展览馆，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在许多国货运动的相关活动中也甚少提及。另一方面，当时新加坡除了中华总商会的国货展览馆之外，在大世界游艺场也有另一个国货展览馆。但是根据中国国民政府的规定，在同一地区出现两个展览馆是不被允许的。即使如此，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也对此不加干涉，甚至新马华商梁燊南曾经提议在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再设立多一个国货展览馆。<sup>288</sup>从中可知，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虽然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所设下的规定也并非完全跟随，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最值得注意的是，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国货展览上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在目标上两者都以向群众推广国货为首要目标，因此基本上方向一致。此外，两者的主要参与者都是以当地的平民百姓与华人商人为主，不同的是中国本土地区的国货展览有较多的政治人物涉入。例如上海工商部中华国货维持会的时候，就曾邀请到当时中国的党国要人蒋中正等举行开幕典礼。

---

<sup>287</sup> 台湾台北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国货陈列馆改订暨联合营业章程》，1928/5/29-1938/9/17，档号：001000006681A。

<sup>288</sup> 《南洋商报》，1936年9月21日，第五版。

但是，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国货展览在展览时间、场所与主办单位却有些不同。以 1928 年在上海举办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与新马地区在 1928 年到 1937 年之间的四次国货展览会比较，可以发现新马的国货展览会的主要展览时间是在晚上，大多从傍晚时分开始，直到接近凌晨时分才结束。但是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的主要展览时间从中午开始，直到晚上才结束。<sup>289</sup>如此原因，很有可能是南洋地区地处热带，所以中午时分天气过于炎热，因此选择在傍晚时分才开始进行展览。另一方面，两者在地点的选择也有些不同。在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的举办地点是在一栋独立的大楼之内，但是除了 1928 年的国货展览是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所内进行之外，其它的都是在大世界游艺场内举行。这样所带来的风貌与上海的国货展览会有些不同，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会带有一种娱乐的气息，而非认真严肃的样子，这无形中使得国货在推销上显得平易近人。虽然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也有些表演等余兴节目，<sup>290</sup>但在气氛与感觉上始终有所不同。另一个不同点在于主办的单位。上海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的主办者为工商部，但是新马地区则大多数是中华总商会等与商业相关的机构所办理。虽然可以从中推测出当时中国的国货展览可能带有较多的政治色彩，但是必须要留意的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可以被视为是最高层的领导组织，并且与中国政府关系良好，具有半官方的地位。此外，在多次的国货展览中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都有参与，并且国货运动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与国家色彩，因此，不能够就此说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所带有政治意味不比中国本土的国货展览来得低。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发现，各种宣传方式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即使是同样的宣传方式，在细节上也有所不同。在中国，以上六种宣传与动员方式——抵制外货运动、国货广告、宣传刊物、国货商场、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展览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在新马则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形。在新马地区，国货商场、国货陈列馆和国货运动刊物则较为不常见，抵制外货运动的贡献也比较小，其中只有广告与国货展览占有比较重要的角色。

---

<sup>289</sup> 有关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展览时间，见潘公展，《中华国货展览会 湖州日特刊》。

<sup>290</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p. 273-275.

## 参与团体与参与者的比较

在参与者身分方面，新马地区的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都有些相似。除了一般的大众之外，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中有许多参与者是团体，如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和上海中华国货产销会，以及一些小型的国货团体，如十人团等。此外，到了 1928 年之后，国民政府也成为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新马地区，除了新马华人群众为国货运动中的主要参与者之外，参与者还包括了各地的中华总商会、新马地区的华商与中国驻新马地区的领事。

第二个相同之处是，两地的国货运动都吸引了许多的群众参与。在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群众之中的学生都是国货运动中最希望被纳入参与者行列中的人。因此，在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国货展览常常鼓励学生到场参观，并且给予免费或者团体折扣的入门票，甚至在中国本土还举办过学生国货年，以吸引学生参与国货运动。另一方面，妇女也是两地国货运动之中最想吸纳的参与者之一。两地的国货运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妇女是重要的消费者，因此国货运动必须纳入女性。在这样的考虑之下，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之中曾经主办了妇女国货年，在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之中则在一些特定的时间中给予妇女免费参观的招待。

第三个相同之处在于参与两地的国货运动的商人的来源都是以当地商人为主。如同在第三章所提到的，在新马地区有不少的新马华商参与国货展览，并且占了参展商人总数中很大的比例。另一方面，在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之中，各地的国货运动的参与商人皆有所不同，主要是以当地的国货商人为主（但是做为当时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却似乎不限于此项限制），这可从不同的地方所出版的《国货调查录》皆以当地国货商人为主的倾向之中得知。

但是两者之间的参与者所涉入国货运动的程度各有不同。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国民政府在这两个地方的国货运动的参与程度。在中国本土，中国国民政府是国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除了积极推广国货运动之外，在政府的政策上还给予国货特别的待遇，例如免除他们的广告税与政府部门优先采用国货等。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的国民政府代表是为驻新马地区的领事，由于新马地区的统治者为英国殖民地政府而不是国民政府，因此中国领事并不能够给予国货商人任何经济与税务上的优惠。

第二个不同点是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的参与团体较中国地区的少很多。中国除了大型的国货团体如中华国货维持会之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国货团体。但是新马地区从未出现过类似的国货团体，反而新马各地的中华总商会是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最常见的团体。例如新加坡、霹雳、马六甲等地的中华总商会在国货展览会举办的时候都会派出代表参与，或者由他们来主办国货展览等国货运动。

简言之，新马地区与中国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在参与者上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吸引了许多群众参与、以妇女与学生作为主要的吸纳对象之一以及参与的商人都以当地商人为主。但是他们也有两处不相同的地方，在中国国民政府的涉入程度以及参与团体的多寡方面都有些不同。

#### 第四节 新马地区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中的集体意识与认同之比较

不论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还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它们的参与者的集体意识与认同都是中国民族主义。他们的中国民族主义都拥有同样的源头，即清末的维新派与革命派份子所塑造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自清末起，中国革命派与维新派都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都为了维护各自的政治立场进而塑造了不同于对方的中国民族主义论述。这些论述不论是在中国本土还是海外华人地区都有流传并且也影响中国本土与海外华人，促使中国本土的与海外地区的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萌芽，进而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虽然拥有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因此中国本土的中国人所构想的与新马华人所构想的民族主义有所不同。虽然中国拥有一套主流的民族主义论述，并且获得政府的支持，但是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因此各地所构想的民族主义有所不一样，甚至有可能地方认同或者种族认同较民族认同来得更为强大。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广东与湖南地区，虽然当地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并且也具有民族认同意识，但是他们同时也强调地方认同，认为应该实行联省自治，否定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作法。此外，同时中国境内的各个少数民族即使认同汉族应该是民族认

同的主体，但是在细节上却有可能不同于国家所拥护的民族主义主流论述。<sup>291</sup>虽然新马地区较为单一，但是内部的民族认同仍然有分支。根据王赓武的说法，自民国成立起，新马地区中的民族主义认同可以分为三种，即：认同中国者、认同新马本土者和中间派。<sup>292</sup>这些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内部纷歧也反映在中国本土的和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上。这导致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除了具有国家主流的民族主义论述与认同之外，同时也夹杂了地方与种族认同等次认同元素。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促使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具有地方认同之外，其参与者大多是认同中国与中间派的中国民族主义份子。

简言之，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参与者的集体意识与认同皆是中国民族主义，但同时也受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国货运动之中出现了地方认同，导致两者在集体意识与认同上有所不同。

## 第五节 小结

通过以上四项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本土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虽然有共同点，但是不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在中国国货的定义上，中国对于何者为国货具有非常严谨的定义，并且也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才可成为国货；新马地区对于何者为中国国货的定义则较为宽松，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与要求。但是两者也都具有共同的标准，即中国国货至少必须是由中国人出资进行生产，以及生产机构必须由中国人所掌控。

在目标上，虽然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具有相同的发展过程，但是两者的速度却是一前一后，并异步。在非正式网络方面，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六种宣传与动员方式——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国货商场、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的表现都平分秋色；但是在新马地区，这六种宣传与动员方式却有不同层度的表现。此外，在集体意识与认同上，虽然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是中国民族主义，但因为环境等外在因素而有所不一致。

---

<sup>291</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pp.177-204.

<sup>292</sup>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Jul. -Sep., 1970), pp. 1-30.

从这些比较之中可以发现，虽然不论是中国本土的还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同属于同样一个中国国货运动，并且拥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在许多细节上却具有不一样的特色。

## 第五章 结论

本章为本论文的结论，并且将解答在前言中所提到的三个问题：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差异为何、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是否是国货运动、以及中国国货运动与国家和民族认同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 第一节 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差异为何？

在第四章中，此一问题的大部分疑难已经解答，本节将承接第四章的论述，并且试图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的同异之处。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虽然都具有相同的目标，并且在实践目标的具体方法上也类似，但是他们两者的目标的形成与转变却并非同时发生，基本上，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目标形成与转变都稍早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是其它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领头羊，并且对中国的工商业与政治的信息与动态最为了解。虽然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起步较晚，但在初期也出现了同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相似的起步，并且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变，两地的国货运动的目标与发展方向一致。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与新马两地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参与者接收有关中国的消息及其对消息的反应的速度相差并不十分巨大。

在非正式网络方面，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在宣传与动员方面，虽然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使用了六种主要宣传与动员方式——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国货展览、国货广告、宣传刊物与抵制外货运动，但是在实际使用上却有所不同。在中国本土，这六种方式的使用率平均，并无其中一种方式使用较多。但是在新马地区中，国货广告与国货展览的使用率较其它方式为高，次为抵制外货运动，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与宣传刊物再次之。促成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在环境所导致。在新马地区，由于政府法规、商业经营环境、社会大众的文化水平与天气气候都不同，使得新马地区的抵制外货

运动、国货陈列馆、国货商场、宣传刊物、国货广告与国货展览都有了不同于中国本土的情况。

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虽然都吸引了许多民众与当地华人厂商参与；但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的参与层度较高，以及较多团体出现于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虽然两者都认为国货运动要成功都必须诉诸于青少年（学生）与女性，但是由于新马地区并非国民政府的领土，并且新马华人的社会与政治意识较为单薄，因此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中国国民政府的参与层度较低，并且新马华人也较少组成国货运动团体。

此外，在集体意识与认同方面，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虽然都以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号召，但是两者因为各自的环境等因素，促成二者在许多地方都不尽相同。例如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中夹杂了地方认同，新马华人的国货运动则非全体新马华人都参与的活动。<sup>293</sup>

从以上比较之中，可以发现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有许多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地方，并且有其原因。但同时，在相同之处方面，是否可说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对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有所影响？在这方面虽然没有非常明显的证据证明，但是从当时的报纸上的论调与这段时期之中人们对于中国国货运动的看法，可以发现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或多或少受到了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的影响。例如积极向学生和女性灌输爱用国货的思想、国货运动的目标以及各种宣传与动员方式的使用，都可看出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受到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影响。但是无法否认的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始终有自己的特色，并非单纯地完全接受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影响。因此，不妨把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视为原型，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除了模仿这个原型之外，同时也在过程之中加入了自己的元素，甚至自行开创新的局势，并不完全受到原型的影响。

## 第二节 中国国货运动是否可以视为是社会运动？

---

<sup>293</sup> 有关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集体意识与认同的差异，将于本章第三节阐明。

中国国货运动也具有社会运动所必须具备的目标、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网络、宣传与动员、以及集体的身分认同与集体意识。但是与当时存在于中国城市的社会运动相比较，国货运动显得较为平和，它并没有像工人与学生运动一般举行罢工罢课来达到而是通过展览等较为和平的方法展示自己的诉求来达成目标。因此，国货运动是否可被视为是社会运动？下文将会从目标、非正式网络和集体认同与意识三方面来论证中国国货运动是否可以被视为是社会运动的一种。

如同前文所提及的，中国国货运动最初以“通过振兴中国的经济来强大中国”作为国货运动的目标，并且后来也进一步具体化达到此目标的手段，例如呼吁政府免除关税与辅助运输费用等。后来也要求中国人必须以中国商品来替代畅销于市场的外国商品。从这些内容之中，可以知道国货运动具有清楚的目标。与民国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相比较，可以发现学生运动的诉求往往与国家利益相关。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运动的目标是避免他国践踏中国的国家利益，1931年的学生运动则是因为抗议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爆发。<sup>294</sup>这在背后都可以看见学生运动的目标与国家利益相关，与中国国货运动的诉求常与国家相关的倾向一致。工人运动常为了提高工资与工作环境等和个人利益较为关切的事情而展开，例如1925年五卅惨案期间，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最后在公司同意增加工资与改善工作环境而停止罢工。<sup>295</sup>国货运动中的部分商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而加入国货运动，这种从私人利益角度而选择参与的倾向，都同时存在于工人运动与国货运动之中。

为了达到目标，中国国货运动通过了非正式网络进行宣传与动员。不论上海、天津或者新加坡，可以见到国货展览、国货商场、国货陈列馆、国货广告、宣传册子与抵制外货运动这六种主要的宣传与动员方式。在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中，有多个国货团体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例如中华国货维持会与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在新马地区，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人际网络对宣传与动员有很大的功效。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非团体，并没有如中国本土那般具有许多国货运动团体如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与十人团等进行动员。但是从参与国货运动的知名人士之中，可以发现他们有好些是中华总商会

---

<sup>294</sup>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pp. 172-173.

<sup>295</sup>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p.148-149.

的会员，或者是商界中的朋友。例如曾经参与国货展览的胡文虎与林秉祥之间具有良好的关系（胡文虎曾经在报纸上为林秉祥的和丰肥皂背书）。在工人运动之中，可以发现会馆与工会在组织工人运动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sup>296</sup>在学生运动中，则可发现许多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出自同一个活动团体，或者是同乡。<sup>297</sup>这都指出团体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作为中国国货运动的集体意识与认同的，无疑是民族主义。自清末起，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国家建构成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中国也因此把与中国相关的事物与中国挂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生产的商品被称为国货，也把中国人购买与使用中国商品视为是中国人所应有的行为，并且借此行为来凸现自己身为中国国民的身份。在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之中，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则是产生于共同生活和活动，以及隶属于相同的会馆和工会。

从以上的三点比较之中，可以发现中国国货运动同民国时期的学生和工人运动这两个社会运动一样，具有社会运动的性质。但是不同的是，国货运动并不通过罢课罢工等较为激烈的手段来展现自己的诉求和目的，因此它是否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上的少数派与没有投票权的民众同二十世纪的美国民权运动一样，积极争取政治参与权利。在这过程之中，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册子与庆祝晚会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sup>298</sup>民国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之中，除了罢课较为激烈之外，也并没有特别采用暴力手段来争取诉求。<sup>299</sup>从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发现不论手段平和或激烈，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运动。因此中国国货运动并不因为手段激烈与否不算是社会运动。

此外，中国国货运动也与其他的社会运动有所联系。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之中，通过了各种以五卅作为商标的商品来作为宣传工具，这不但与国货运动通过某

---

<sup>296</sup>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pp. 17- 38.

<sup>297</sup>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pp.136-145.

<sup>298</sup> Harry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Methuen, 1979).

<sup>299</sup>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pp. 9-13.

种与政治事件相关的商标来推销商品的的手法相同，<sup>300</sup>并且也可发现国货运动与学生运动在宣传上重叠了。另一方面，国货运动与学生运动的目标皆强调救国，都希望中国能够强盛以抵抗列强的侵扰。在进一步，可以发现两者都身处于清末到民国之间，中国民间强烈民族主义的氛围之中，并且两者的产生都与此环境相关。

从以上的论证中可以知道中国国货运动虽有一些地方不同于一般对于社会运动的定义，但是这些只是细节上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国货运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运动。

### 第三节 国货运动与国家 / 民族认同

自清末以来，由于中国的革命派、保皇派与清政府在中国本土与海外华人地区的活动而推动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并且中国民族主义与随之而来的国家认同在之后的中国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马华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也因为中国的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新马的活跃而被激发，这股民族主义的气息自清末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都弥漫于新马地区之中，并且也因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事件如二十一条、五四运动、九一八事件与中日战争等而不断被加温。中国国货运动也因为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受惠，被新马华人视为这是肯定自己是中国国民与表现自己的爱国之心的管道，因此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也可视为是展现新马华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

中国国货运动中的国家与民族认同具有两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区性的，以个人长期居住的地区为认同对象，例如上海人以上海作为自己的认同对象或者新马华人以新马地区作为自己的认同对象。反映在国货运动中，即为各地的《国货调查录》中主要收录当地所生产的商品为主，例如前文提及的天津与浙江地区所出版的《国货调查录》；以及各地所办的国货展览会以当地出产的商品为主要的展览品，例如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之中就有不少是新马地区的华商所生产的商品。第二个层次则是国家与民族的，以个人所属的国家与民族作为认同对象，因此当时的中

---

<sup>300</sup> Jeffrey N.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pp. 208-209.

国人以中国作为认同对象。不论是上海、天津或居住在远离中国的新马华人，大部分认为自己是中国的国民以及同属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反映在国货运动之中，则可发现不论在上海、天津还是新马地区的国货展览，虽然展览品以当地的商品为主，但是仍然自认这些展览品仍然是属于中国生产与华人制造的商品。

这两个层次的认同不互相排斥，并呈现出平行与混合的现象。这种现象就如杜赞奇在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中所指出的，国家认同并不完全与民族认同相吻合，并且地方认同也并不同国家和民族认同相冲突。<sup>301</sup>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英国人对国家 / 民族与地区认同上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现象。在英国，一个伦敦人不但认同自己是伦敦人，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英格兰人（English）与英国人（British），这几种认同同时存在并且不相驳。<sup>302</sup>与此相同的多元认同现象也出现在中国国货运动之中，天津人、浙江人和新马华人不但都认同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并且同时也认同自己是中国国民与隶属中华民族。这些认同都同时存在，不但互不影响，甚至两者呈现混合的现象。例如 1928 年在上海举办的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中，部份展览场地按照产品的产地来划分，<sup>303</sup>并且也允许各地区代表在国货展览期间的某一天举办特展与宣传，例如湖洲日与北平日。<sup>304</sup>这些都显示了地区认同不但与国家 / 民族认同平行，并且地区认同也混合于国家 / 民族认同之中。<sup>305</sup>

国货运动不但具有国家 / 民族认同，并且也帮助塑造此认同。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提及了共同媒介对于民族认同的塑造的重要性。<sup>306</sup>此外，Karl Gerth 也在《中国制造》中也运用了此观点，阐述了视觉如何塑造了集体记忆，并且通过集体记忆来打造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在当时，中国本土的国货运动通过广告、宣传小册子、国货展览、国货商场、国货陈列馆、抵制

---

<sup>301</sup>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sup>302</sup> Hugh F. Kearney,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9.

<sup>303</sup> 伍麟思，〈1928 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实〉，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页 408。

<sup>304</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 275; 潘公展，《中华国货展览会 湖洲日特刊》。

<sup>305</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p. 275.

<sup>306</sup>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外货运动等方法，通过打造共同的活动空间（藉由国货展览、国货陈列馆与国货商场的商品展示，形塑中国的空间形象）与共同的耻辱（让宣传手册、广告与抵制外货运动的内容与九一八事件等国耻挂钩）来塑造了国家与民族认同。<sup>307</sup>

这些方法与其功能并不限于中国地区的国货运动，也可见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中。当时的新马华人也通过了这些宣传手法加强了国家与民族认同。如同在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国货广告常常与九一八事件等国耻和国难挂钩，如五星啤酒在《南洋商报》上的广告诉诸于九一八事件，以及张裕葡萄酒的广告之中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sup>308</sup>又或者在国货展览之中，反复提及“祖国”、“提倡中国货”等字眼，以及通过中国商品展示来刺激人们想象中国，进而塑造国家/民族认同。

另一方面，新马华人也同中国本土的华人一样，在国货运动中也似乎展现了新马地区的华人的地方色彩。如同第三章所提及，在国货展览中有一部分的商品实际上是由新马华商在新马地区制造与贩卖的商品，并非是在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这就如同前文所提到的，在当时新马华人的观念之中，在新马地区由华人所生产的商品与在中国地区由华人生产的商品并无多大差异。从中似乎可以推测，当时的新马华人同当时的中国各地的人们一样，在国货运动之中都有特别强调自身的地方认同。

此外，从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可以发现，认同新马地区与认同中国并不相排斥，而且很有可能是同时并存的。新马华人很有可能既认同中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人民，但是同时他们也认同自己所居住地地方——英属马来亚。在他们的观念之中，中国是自己的祖国，不论身在何方都无法改变自己是中国国民的身分；新马地区在他们的概念之中则是自己长期定居的地方，并且对于自己的长期居住地拥有一份特殊的情感。因此，虽然新马地区的华人认同新马，但是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家园所在地的认同。<sup>309</sup>

---

<sup>307</sup> Karl Gerth,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sup>308</sup> 《南洋商报》，1932年4月18日，第三页；1932年4月20日，第十六页。

<sup>309</sup> 战前新马华人对于新马地区的认同主要出于家园，可参考黄贤强，〈活跃于马来亚与中国的医学博士——论伍连德的族国认同〉，张启雄编《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2005年3月），页351-367。

但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中所构成的新马华人国家 / 民族认同并非泛用于新马地区的全部华人，部分新马华人的民族主义与国货运动所展现的民族主义并不相同。王赓武在 *The Chinese in Malaya* 一文中曾经指出，新马华人民族主义可以分为三个派别，即：认同中国者、中间派与认同新马本地者。其中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马华人民族主义主要是由中间派与认同中国者所构成。因此在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之中，可以发现提倡国货运动的新马华人也主要是来自这两个派别，例如曾多次参加国货运动的华商胡文虎<sup>310</sup>、陈嘉庚<sup>311</sup>、林文田<sup>312</sup>和林庆年<sup>313</sup>等人都是认同中国政治或者中间派份子。

此外，一些参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商人也可能并不认同国货运动的民族主义。就如同前文所提及，当时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能够接受新马华商的参与，以及新马华商愿意加入国货运动的行列，很有可能是因为能够从中取得利益的因素，并非是出自于对于新马地区的地方认同。

简言之，国货运动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塑造了国家 / 民族认同之外，也在运动之中形塑了地方认同。这不但发生于中国本土地区，也发生在新马华人地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的人大多是认同中国政治的华人，并非当时的全体华人。此外，国货运动在新马地区虽然协助塑造了国家与民族认同，但是新马地区的国货运动中的新马华商参与国货运动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私利，而并非出自对于地方的认同，并且国货运动所展现的民族主义与部分新马华人所认同的民族主义并不一致。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中具有国家与民族认同，也可能出现了对新马地区的地方认同，并且两个认同之间并不如 Zheng Liren 所说的会互相排斥，而是同时并存于当时的新马地区之中。

综观全文，本论文的三个疑问获得初步的解答。中国本土的与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之间除了相同之处之外，也因为外在因素导致在集体行动的目标、非正式网络以及集体意识与认同上有许多差异之处。另一方面，不论是中国本土的还是

---

<sup>310</sup>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一，页 200。

<sup>311</sup>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一，页 199。

<sup>312</sup>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四，页 75- 76。

<sup>313</sup>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卷五，页 166- 167。

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都具有多元认同的倾向。除了认同中国民族主义之外，同时也有当地的地方认同的存在。

此外，中国国货运动符合了社会运动的基本条件，因此也可以视为是社会运动。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中国本土的中国国货运动或者是新马地区的中国国货运动，它并非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当时它们所处的环境相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海外华人地区都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认为中国国民要尽其所能，通过各种方法挽救积弱不振的中国。因此，中国国货运动无形之中成为拯救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一环，并且在中国近代史与新马华人史上留下了痕迹。

## 书目

### 报纸

南洋商报（新加坡），1923- 1941  
星洲日报（新加坡），1929- 1941  
叻报（新加坡），1881- 1932  
申报（中国上海），1872- 1949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1845- 1941

### 档案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湾台北国史馆）

- 《蒋中正电令朱培德翁文灏通令军政各机关用纸皆使用国货》，1936/04/01-1936/04/01，典藏号：002010200156003；
- 《蒋中正电翁文灏行政院各部会及市政府股科长以上人员须着中山装制服并皆用国货》，1936/03/02，典藏号：002080200419006；
- 《蒋中正电行政院军事委员会通令军政各机关印刷品纸张须用国货如再购用上等洋纸应由其主管官负责受处》，1936/04/01，典藏号：002080200420003。
- 《林耕宇呈蒋中正请设立推销国货劝导员训练班推销国货及派侦探常驻日本朝鲜台湾刺探各方情形》，1935/01/30，典藏号：002080200203064。
- 《蒋中正电陈布雷面嘱陈立夫转告上海友人或商会等多用国货》，1936/12/07-1936/12/07，典藏号：002010200170044。
- 《蒋中正电饬阎锡山廿一师非法办国货展览会师长记大过政训处长革职》，1936/11/11-1936/11/11，典藏号：002010200167049；
- 《蒋中正电阎锡山第二十一师政训处擅自主办国货展览会殊属非分违法其师长李仙洲即记大过一次政训处长张德容革职严惩展览会勒令停闭》，1936/11/11，典藏号：002080200423033。
- 《蒋中正命薛笃弼监誓赵戴文任内政部次长职并筹备成立卫生部另参加上海中央银行及国货展览会开幕典礼致词》，典藏号：002060100015001。

国民政府档案（台湾台北国史馆）

- 《国货陈列馆改订暨联合营业章程》，1928/05/29-1938/09/17，典藏号：001110020006。
- 《行政院呈通过修正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及国货暂订标准》，1928/06/06-1937/07/27，典藏号：001114240002；
- 《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修正、中国国货暂订标准、国货审查委员会规则、国产检验委员会暂行规程草案及购用国货办法》，1932/03/14-1937/07/08，典藏号：001110020007。
- 《国货证明书发给规则》，1928/6/6- 1937/7/27，档号：001000006876A；

《国货证明书发给暨国货购用检验规程》，民国 21 年 3 月 14 日- 民国 26 年 7 月 8 日，档号：001000006682A。

《国货陈列馆改订暨联合营业章程》，1928/5/29- 1938/9/17，档号：001000006681A。

外交部档案（台湾台北国史馆）

《国货厂商筹设国货公司案》，民国 27 年 9 月 31 日- 29 年 12 月 3 日，档号：020000038673A，020000038674A。

实业部档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上海合利华行请发国货证明新嘉坡桃李园酒厂请发国货证明》，1936 年，档号：17-22-114-07。

《国货月报》，第 1 卷第 2 期，1934 年 6 月。

## 中文书目

小野信尔着，殷叙彝，张允侯译，《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

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十年来之机联会》（上海：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民国 26 年），。

天津国货调查会，《天津国货调查月刊》，第一期（天津：天津国货调查会，民国 8 年）。

王季深，〈开拓南洋国货市场的高事恒〉，收入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386-390。

文正宜，〈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宜昌〉，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444- 451。

〈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章程〉，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502- 505。

〈中国国货公司介绍所、全国联合办事处章程〉，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519- 521。

马炳荣，〈铅笔谱下的国货颂歌〉，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25- 232。

Zygmunt Bauman 着，朱道凯译，《社会学动动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2）。

伍麟思，〈1928 年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实〉，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403- 411。

孙慧荣，〈抗日战争时期东南亚华侨的抵制日货运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1988）页 47-50。

关楚璞主编，《星洲十年》（新加坡：星洲日报社，1940）。

- 纪华，〈国货售品所始末〉，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38- 250。
- 许德发，《近代中国之文化国家化与国家意识的形成（1890- 1928）》，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2006。
- 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3 期（民国 89 年 6 月），页 77- 158。
- 全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9 辑（1958 年），页 461- 497。
-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05）。
- 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收录于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 87 年），页 229- 258。
- 巫仁恕，〈前现代的抵制运动——明清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收录于黄贤强编，《文明抗争——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论集》（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5），页 3- 57。
- 巫仁恕，〈明末清初城市手工业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以苏州城为探讨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8 期，（民国 86 年 12 月），页 47- 88。
- 巫仁恕，〈节庆、信仰与抗争——明清城隍信仰与城市群众的集体抗议行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34 期（民国 89 年 12 月），页 145- 210。
- 李道发，〈全力参与国货运动的三友实业社〉，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65- 70。
-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民 86 年）。
- 杨承祈，〈“九·一八”商场〉，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75- 278。
- 杨承祈，〈章华毛纺厂的“九·一八”薄吡吼〉，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91- 93。
- 周荣生，范尧生，《中华国货调查录》，第一期（浙江：浙江省城中等以上学校劝用国货联合会，民国 9 年）
- 南洋民史纂修馆编辑部编，《南洋名人集传》（槟城：出版社不祥，1922- 1941），卷一至卷五。
- 柯木林主编，《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新加坡：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1995）。
- 项泽南，〈献身国货事业的项松茂〉，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149- 159。
- 高屋，〈为提倡国货出力的上海蓬莱市场〉，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63- 265。

- 高屋，〈天字号系统产品与外货的斗争〉，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118-121。
- 益丁，〈国货运动与南洋市场——南洋侨胞参与国货运动的若干史实〉，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376-385。
-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1999）。
- 徐中约着，计秋枫与郑会欣译，《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 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台北：晓园出版社，1994）。
- 黄贤强，〈新马华人之文明抵制——20 世纪初的宣传与抗争〉，收录于黄贤强编，《文明抗争——近代中国与海外华人论集》（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5），页 163-189。
- 黄贤强，〈活跃于马来亚与中国的医学博士——论伍连德的族国认同〉，张启雄编《时代变局与海外华人的族国认同》（台北：海外华人研究学会，2005 年 3 月），页 351-367。
- 黄贤强 <1905 年抵制美货运动与新马华人社会>，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 1 期(1997)，页 17-32。
- 黄贤强，〈海外華人與近代中國：1905 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4 期（2004 年 6 月），页 31-62。
- 黄贤强，〈马来西亚华人近代史的分期刍议〉，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社会与政治》（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47-62。
- 黄贤强，〈二十五年来新加坡的华人研究概况〉，文平强主编《乘风破浪济沧海：华社研究中心二十周年(1985-2005) 纪念特刊》（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81-87。
- 黄贤强，《海外华人的抗争：对美抵制运动史实与史料》（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1）。
- 黄汉民，〈国货运动中的荣家企业〉，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54-65。
-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
- 程守中、周节之，〈国货运动中的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458-467。
- 傅无闷主编，《南洋年鉴》（新加坡：南洋商报出版部，1939）。
- 新嘉坡茶阳会馆与百年大庆筹委会出版委员会，《新嘉坡茶阳会馆百年纪念刊》（新加坡：新嘉坡茶阳会馆，1959）。
- 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大世界周年纪念国货展览会特刊编辑部，1932）。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扩大展览推销大会文书股，1935）。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二届国货展览推销大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6）。
-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特刊》（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31）。
-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是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楼德型，〈华成烟公司在国货运动中发展壮大〉，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13-219。
- 潘公展，《中华国货展览会 湖洲日特刊》（湖社出版部，民国 17 年）。
- 潘君祥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 潘君祥，〈辛亥革命与中国国货运动的产生〉，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1-21。
- 潘君祥，〈20 年代中国国货运动的蓬勃开展〉，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22-36。
- 潘君祥，〈国货运动大事记（1905-1952 年）〉，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531-577。
- 潘君祥，〈三四十年代国货运动的持续发展和严重挫折〉，收录于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页 37-54。
- 颜清湟，〈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对 1928 年济南惨案的反响〉，收录于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协会，1992），页 123-147。
- 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新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营出版事业，1982。

## 英文书目

- Akashi, Yoji,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1937-1941*(sole distributors in the U.S.A. & Canada: Paragon Book Gallery, 1970).
-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Burke, Peter,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second edition.
- Burke, Peter,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in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pp. 183-212.
- Cochran, Sherm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 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 193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Cochran, Sherm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Dickinson, Harry. T.,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Methuen, 1979).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Della Porta, Donatella and Diani, Mario, *Social Movements: An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second edition.
- Fernandez, Roberto and Mcadam, Doug,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Recruitment to Social Movements", in B. Klandermans ed., *Organizing for Change*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89), pp. 315- 344.
- Gellner, Ernest,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Gerth, Karl, *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arrison, Henrietta,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 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Hevia, James L., *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2003).
- Hou Chi-m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Jansen, Marius B.,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 1972*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 Kearney, Hugh F., *The British Isles: a History of Four Nation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Kenneth Pomeranz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Present* (Armonk, N.Y. : M.E. Sharpe, Inc., 2006)
- Kuhn, Philip A.,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 Li, Lillian M., *China's Silk Trade: 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 1842-1937*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Mcadam, Doug,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986), pp. 64-90.
- Mullins, Patrick, "Community and Urban Movements", *Sociological Review*, 35 (1987), pp 347-369; Oliver, Pamela, "'If You Don't Do It, Nobody Else Will': Active and Token Contributors to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1984), pp. 601- 610.
- Passy, Florence, "Social Networks Matter. But How?" In Mario Diani and Doug Mcadam ed.,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 48.
-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urcell, Victor, *The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Remer, C. F., and Palmer, William B.,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 Ruggiero, Vincenzo, and Montagna, Nicola ed., *Social Movements: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Skinner, G. William,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14-278.
- Snow, David A., Zurcher, Louis A., and Ekland-Olson, Sheldon,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1980), pp. 787- 801.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second edition.
- Stark, Rodney and Bainbridge, William S., "Networks of Faith: Interpersonal Bonds and Recruitment to Cults and S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5 (1980), pp. 1376- 1395.
- Wang Gungwu, "The Limits of Nanyang Chinese Nationalism, 1912-1937". In C.D. Cowan and O.w. Wolters eds.,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Essays presented to D. G. E. Hall*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405- 423.
- Wang Gungwu,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43.(Jul. –Sep., 1970), pp. 1-30.
- Wasserstrom, Jeffrey N.,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asserstrom, Jeffrey N., *Global Shanghai, 1850-2010: A History in Fragment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Wong, Sin Kiong,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Boycott: The Origins of the 1905 Anti-American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 6, no. 2(1999), pp. 123-148.
- Wong, Sin Kiong, "Die for the Boycott and Nation: Martyrdom and the 1905 Anti-American Movement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Univ. Press), vol. 35, part 3 (Jul. 2001): 565-588.
- Wong, Sin Kiong, "The Chinese Boycott: A Social Movemen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vol. 36, no.2 (Sept. 1998), pp. 230-253.
- Wong, Sin Kiong, "The 1905 Anti-American Boycott in China: A Study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Taipei), vol. 27, no. 2 (Summer, 1999), pp. 7-18.
- Wong, Sin Kiong, "The Tatsu Maru Incident and the Anti-Japanese Boycott of 1908: A Study of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Chinese Culture* (Taipei), vol. 34, no.3 (1993), pp. 77-92.
- Yen Ching-Hwa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77-1912". In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6, No.3.(1982), pp. 397-425.
- Zheng Liren,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British Malaya, 1894-1941." Ph. 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